

目 录

序 言	1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	5
非常法令颁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17
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29
创办非法的党报	36
李希特尔的年鉴	49
《社会民主党人报》	55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和红色邮政局长	76
一八七九年的国会会议	84
一宗失去的遗产	87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90
关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的集会说几句话	102
地下工作	105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会议	114
维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117
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130
伦敦的卡诺沙之行	134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139
莱比锡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144
我的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	150
一八八一年秋季的国会普选	152

德累斯顿国会选举的一个余波	160
死耗的误传	165
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二年在萨克森邦议会	168
一八八一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最高法院的第一件 叛国案	173
意见分歧	177
苏黎世的八月会议	191
休息的日子	192
人名索引	197



序 言

5

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倍倍尔由苏黎世给我一封信，信里首先对我当时进行的笔战表示很感兴趣，随后接着说：

“我立了个遗嘱，希望你能同意，即如果我在《我的一生》第三卷完成前竟然去世，那末你可以就已准备好付印的稿子出版。我还要做的不多了，这一卷写到一八八二年就完了。往后可以快些进行了。

但要预先说定，稿子除文笔上的修改以外不能有其他变动。事实上只有发现我所举的事实是错误的，而我必须改正的时候，才可以有所变动。特别是，我所提到的还在世的人们的名字，只要我自己原稿上没有略去或缩写，翻印时它们也应当不被略去或缩写。……因为我沒有有意地错待任何人，而历史真实性也不容给涂上色彩，所以也没有理由把写好的东西加以改动。

这一卷若在我死前未能完成，我认为决不要由你或其他人来续写……

请把这信谨慎保存，以便作为证件。”

在这个嘱托之后，倍倍尔在信里又写到夏季的计划和家庭琐事，说他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还谈到几个议会党团人物，随后用这话来结束这封信：

“我现在从事第三卷的写作，是逐段做到可以付印的程度并把其余的稿子附在后面。”

这封信的整个精神表示出，他还希望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回忆录，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事，而他指定我为出版人，只是个预防措施

1

施。就是七月二十九日他给我的下一封信，也十分关心于现代和当时由于议会党团对关税案的态度而引起的笔战。他所讲的同摩尔肯布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宣读的那封信相仿。他虽然抱怨他的“无力工作”，但把这情形描写为“意欲进攻却在斗争面前被吓回来的怪现象”。他因无力战斗而愁闷，他把无力战斗同无力工作同等看待。战斗和工作在他有同样意义。但紧接着他在那封信里也提到第三卷的工作，这工作他只中断几个星期。对于我促使他注意一八七六年考查出来的事，他回答说：

“你所写的关于《柏林自由报》上的声明和攻击的事，我不知道，或者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我全忘记了。我忘记了多少东西，我研究第三卷的有关文件时每天都体会到了。”

这是倍倍尔关于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最后告诉我的话。这表示他正在从事完成他的工作。两个星期后，他就逝世了，离开了每个工作、每个斗争。他安安静静地长眠了，未受到长时间对死搏斗的痛苦；这是永别的无限悲痛中的唯一安慰，这种悲痛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抑郁，即使是沒有幸运同倍倍尔本人作朋友的人；只要是关心我们伟大事业因倍倍尔的死亡而失去了它最有力的和最忠诚的先鋒战士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倍倍尔遗留下来的写作材料一到我的手里，我立即开始执行我的亡友的遗嘱。

我的工作，如倍倍尔所已指出，是不大的；基本上只是编辑的整理工作。文字上不够流畅的地方加以修整，同时也务求尽量保持作者的个性。引文和日期都尽可能与原件核对。送去付印的信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因简便起见只写了开头的字母。凡是不言而喻的名字，我就把它的全称写出来。如果只是很有可能，则在脚注中注明原名。有少数几个名字，我不能确有把握来断定，所以只好仍旧只用开头字母。

自然，倍倍尔有意要諱用全名的地方，則仍用开头字母。

相反地，我却沒有仅仅暗示或完全隱諱一个完全写出的名字。

倍倍尔在这一点上的严格規定使我有點失措。看起来，他像是迫于毫无顾虑地热爱真理，不得不从事使許多有声望的同志陷于窘境的揭露。使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未发見起了这种作用的东西。也許那些会使几个名字感到痛苦的实情，要到后面才提出，而現在却永远埋沒了。

我只把准备好付印的稿子拿来发表。倍倍尔搜集了超出这部著作的广泛的材料。书信、公文、剪报、摘要、传单和許多这类东西。材料直到一八九〇年，对于編党史的人提供許多有价值的指示。

我想在这里轉录一段給施吕特尔的信。这封信有关爱北斐特案件。我在文德尔的倍倍尔传的評論里曾提到，他好像把这案件和倍倍尔对此案的作用几乎忘記了。文德尔沒有提这个訟案。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上他确乎补足了这个遺漏。虽然如此，讀一下在审訊期間倍倍尔自己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所写的东西，也会感到兴趣的，

“案件是件空前未有的丑事，是檢察署和警察局的耻辱。

他們不会梦想到，把我个人拉进公訴里去，就是为他們准备好了悲慘的失敗。檢察官在第二天就已經暗地里說：这个人弄坏我的整个案件，往后还更要精些。我希望案件对最大多数的被告都能一切順利。他們有一部分吃了本地的历史和他們对苏黎世以至伦敦的关系的亏了。

令人煩惱的是这将耗費大量時間。但是想到，如果我不在那里，被告們非常可能像羊似地遭人宰割，因为他們沒有掌握这类材料，那么，有所牺牲，我也是不后悔的。

我想，这是他們在德国上演的最后一次大規模秘密勾結的案件。”

这确是这类案件的最后一次。不久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取消了。

同时我也发见一系列短短笔记，但这些笔记不过是以少数字句确定日期而已。个别部分没有说明，即使是零碎的说明也没有。除这里发表的稿子以外，我没有能发现任何可以作为倍倍尔的《回忆录》来发表的东西。要在这个准备好付印的稿子里加入任何东西，就会是此卷的续作，这是作者所不许的，也当然不许，因为所有这类的加添，哪怕是无可非议的，总不能认为是倍倍尔的回忆录。

我决不续加。但因为这个著作是骤然中断的，我只可以给加上一个用以结束的后记。这里我发表几封倍倍尔同恩格斯的往来信件，时间是属于遗稿的最后部分的。

这样，我作为编者的工作并不很大。但是它所给我的享受却大得多，单就它允许我重温一道意味着我们党的英雄时代的那些时期来说，这享受就已经很大了。凡是能够参与那时期党的工作的人，在记忆它时，没有不感到自豪的。年轻的一代却可以从对那些胜利的艰苦的考验的回忆中为他们面前的伟大斗争吸取勇气和力量。因为最艰苦的事情还在我们面前；夺取政权。

倍倍尔想在这个斗争中作我们的前导这个最热烈的希望不能实现了。但是我们伟大的先驱者的不朽的东西，继续生存在我们中间并将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和凯旋！

一九一四年一月。

卡·考茨基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討論

9

新选出的国会在王宫的白厅里开幕了。人們期待着，皇儲会来代替还在养伤的皇帝宣讀御前演說。但是既不見皇儲也不見首相到来。这项职务却由首相的代理人施透耳堡—維尼該罗德的奥托伯爵来执行。

这件事引起了热烈的公众議論。人們由此所得的結論是，皇儲不同意非常法令，因而拒絕为国会揭幕。而另一方面俾斯麦却又因皇儲拒絕揭幕而憤然不来，所以由其代理人荣膺此职。

在最高集团中的蛙鼠之爭总是有趣得很，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更；因为非常法令草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过，这根据选举結果和大部分报纸的論調看来，已經毫无疑问了。

这議案胜过五月的那一个之处，在于它比那一个經過更彻底得多的加工。但是所持的理由却极不充分。議案中說，由于行刺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許多侮辱君主罪行，联邦政府确信，在广大社会內充滿着蔑視一切道德教訓和法律条例的思想，这对国家和社会有巨大危險。所以有必要制定反对作为那个危險的代表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法令。

接着是簡短而且很肤浅地描述一下自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八六三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八六四年）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种貧乏的历史性叙述以后，接着是轉录国际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爱森納赫綱領和哥达綱領以及一八七七年的根特宣言。国际章程中有这句话：

10

“第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和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①

这句美丽的无可爭辯而只有贊揚的話現在却用作实施一个非常法令的理由。接着又摘录了党在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那些都是公开的文件，每个从事于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人們現在必須用这些辞句作为希望把社会民主党烧掉的火葬柴堆。

九月十六日在馮·傅尔肯貝克主持之下开始討論这議案。首相代理人的发言揭开了辯論之幕，他的发言内容非常簡陋，几乎用不了五分钟。首相沒有参加討論。国会多数派既有坚决意志为他取得一个如意法令，他又何必多費言詞呢？

議会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中央党的代表，議員彼得·賴欣斯波格（欧尔貝）。那时候虽說文化斗争已被粉碎，可是中央党还觉得周身疼痛。一个非常法令，虽是对付它所痛恨的党的，它由結果看来，却也是可疑的。它的信徒到了自己也处在非常法令之下以后，还不了解这种态度。所以賴欣斯波格声明“暂时”反对通过和修改法令草案。

保守党的冒失鬼之一，議員馮·海尔多夫（伯第拉）却不这样。他干脆明显地表示拥护法令草案，还提出詢問說，单是非常法令是否就够了，是否宜于按这个意思来修改国会选举法，以保证更成熟的年齡和更长的定居期，并且是否适合把国会的立法期加以延长，以期掃除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不安。

他最后的心願在九年后如願以償了。

继海尔多夫之后，我作为党团的第一个发言人講話。党团一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十六頁。——譯者

致认为，要坚决反抗这个法令的全部和各个细节，为了这个目的给各种不同的内容指定了发言人。瓦尔特希和凯泽尔都未能参加辩论，他们那时候正在监狱里。

按照我那攻击是最好的掩护的原则，我以二小时的发言对议案和先发言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首先叙述法令草案的来历，由此证明官方的陈述与真实情况有很多的矛盾。接着我攻击警察局的恣意胡为和在行刑期间法院残酷的判决，这些都属于德意志近代史上最悲惨和最可耻的事件，是德意志帝国的污点和耻辱。（呼喊守秩序。）随后我谈到党的历史。我指出了，俾斯麦在他一八六二年九月进入普鲁士内阁后立即企图通过他的代理人来影响运动，指出了他与拉萨尔进行谈判，指出了他的枢密参议洛塔尔·布赫尔努力拉卡尔·马克思做《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指出了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充任的角色等等。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俾斯麦的动机决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宁可说他为一种愤恨所驱使，他恨党证明了他的那些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成为他的政策的最激烈的敌人，这促使他用按正理决不能加在我们身上的暗杀案作压制我们的非常法令的借口。

我继续说，但是用这个法令，却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法令之下并且通过这个法令才正好获得信徒。对党的兴趣将会增长，失败者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人们应该把这个法令草案丢到它应去的地方——字纸篓，在对我们的斗争中，不能依靠虚假的控告和空话，而要凭着事实和证据，而这是至今还没有被提出来的。 12

我继续阐述，我们将如何根据一切预料，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为传播我们的思想而努力，而警察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如何把禁书的传播范围扩大到以往所没有的程度。在将来会表明，这个法令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

我的发言，如继我之后的发言人的讲话所证明，达到了所希望的作用，国内国外一切党派的报纸也都为此忙碌起来。继我发言的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欧伦堡伯爵，他和他的同僚司透耳堡—维尼格罗特伯爵一样，讲话很短。他满足于由我的一篇著作中引证几句话，用以证明党是暴力颠覆者的一个信徒。此外，他否认社会民主党同政府代表之间有关系，或者只在党不是现在的党的时期有关系。他绝不知道有像我所叙述的那种协定或联系，在把他在各个细节上都能答辩的事实引证出来之前，他就必须最坚定地否认这些勾结企图。民族自由党议员班伯格博士却不这样，他在简短发言中企图说明社会主义学说的危险性，但是也以不愉快的心情讲述，统治集团对于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贯持反对态度，这由俾斯麦对于拉萨爾的关系就可以证明。他说，至于我所说的那些话，一部分是人所共知，一部分却是新的。但是斯托克尔、托特牧师及其伙伴所创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报》所代表的观点，是以我们为掩护，它所起的作用却更危险得多。他建议，设立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法令需要深入和仔细地加以审查，因为我的发言使他深信，为了保护社会使之不受我向他们提示的危险，应不惜任何努力。班伯格以往在巴黎作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政治亡命者，现在才由我的发言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天，俾斯麦出席，为的是对我进行辩驳。他请原谅他因健康关系一直未能出席会议。但他现在所以出席，是为了来反驳那种由我作喉舌所编排的故事，免得使这故事成为历史。俾斯麦反对我的讲话的实质，我在第一卷（参看第五十等页）已叙述过。这里我请你们去参看。他在发言结尾时保证：他由我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一八七一年五月）才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真实性质，并且从那时起成了我们坚决的敌人。他也一再尝试过，如议会所熟知，想通过立法措施把我们当作国家和社会的敌人加以取缔，但是这

个他没有能在议会中得到贯彻。社会主义报纸曾威胁并高喊“给予警告”。“警告你们了。警告的是什么？却不是别的，而是虚无主义的刀子和诺比林的猎枪。是的，我的先生们，如果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则任何生活都失去其价值。”（右派鼓掌）。现在是保护皇帝的时候了。“至于说在这种时候我们中间也许有几个人成为暗杀的牺牲品，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每个遭到这事的都会被人纪念，说他是为祖国的利益，为祖国的巨大利益而阵亡在光荣的战场上。”右派听了这句话之后爆发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我们抗议，我要求作议事规程的发言，因为首相侮辱我们，要求喊他守秩序。但是议长已经让那个保守党的老煽惑者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言，这个人就以一个为他的阶级特权而斗争的普鲁士基督教正统派容克那种完全狂热的态度咒骂我们。他把我们在报纸上和集会中的整个活动都说成图谋叛国的行为。我们的歌成为战歌，我们的整个活动都是备战。我们夺去了人民的宗教，结果人民在今生就已经不仅要求同等权利，而且要求同等享受。他结束他的痛骂时，诉说广大群众的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忘恩负义和危害着基督教的道德堕落。 14

我现在作议事规程的发言，要求不仅对首相，也对诬蔑我们图谋叛国的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出守秩序的警告。议长否认前面发言人的讲话有我所说的意思。他必须对于每个干涉他的领导工作的尝试加以驳斥。

白拉克接着发言，与这个辩论所采取的激昂性质相反，他说得非常安详。对于内政部长和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从我们的著作中所引的话，他引用资产阶级作家著作中的话来回答，其中一部分来自文化斗争时代，其尖锐超过人们所能援引来反对我们的一切东西。对于班伯格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他用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来答复。他也声明，我们的敌人制定非常法

令并不能制服我們。

继白拉克之后，阿尔薩斯的厂主道尔夫斯发言，他設法证明，他們在米尔好森的所謂福利設備是一个对付社会民主党的密訣。但是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之前，米尔好森就改由社会民主党人作他們国会中的代表了。继那个阿尔薩斯人之后的是一个波兰人发言，他亲身体驗到普魯士制定非常法是对付波兰人的。他激烈地反对这議案。这促使接着发言的馮·卡尔多尔夫先生更热心拥护这个法令。在欧仁·李希特尔一个較长的发言之后（他在发言中特別同首相取得諒解），就由多数派決議結束总辯論，因而我要答复首相的講話的发言被打消了。我只有在私人講話中反駁他那些針對我而发的謬言和謬論。

- 15 議會決議照班伯格的建議，把議案移交給二十一人委員會。按說既然对于被告的党要有所決定，就應容納該党一个黨員參加这委員會，使它能夠发言和答辯，并作確有必要的更正，才是正理，也是議会的义务。議會中一部分人也有这种傾向。問我們党團要選舉誰到委員會時，党團建議選舉我。反对我的陰謀立即发动起来，所以我落选了。

在委員會中进行了热烈辯論。民族自由党左翼在拉斯克尔領導下又想做絕不可能的事。尽管是关于非常法的問題，他們却要設法尽可能来限制警察的任意胡为。他們想借此防止社会民主党的所謂合法要求（即后来称做我們努力的“正当核心”）受到法令的打击。还有另外的在資產階級集团內与社会主义革新运动有連帶关系的努力也不要受到打击。委員會右派的意見却是相反，他們认为，人們必須做全部工作；必須剝奪社会民主党以无害的形式进行它的有害企图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就必須信任管理机关，不要用不清楚的和模稜两可的法律規定来掣它的肘。由于贊成一切緩和建议而反对这个議案者的帮助，拉斯克尔及其伙伴胜利了。当然，

經驗給予的教訓是，这个不彻底的決定只是一根不能限制管理机关的細綫；它們正是随心所欲地解釋法令。

由委員會，繼而由全體會議所通過的主要修改如次：法令草案中說，協會、各種聯合、以及合作金庫、集會、印刷品、募捐，一旦發覺是為破壞現有國家秩序或社會秩序而努力的，就應禁止或鎮壓。按委員會以至全體會議的決議，這句話如下，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或是共產主義的顛覆現有的國家秩序或社會秩序的企圖，一旦顯示出危害治安，特別是危害各階級人民的和睦時，就應加以禁止或鎮壓。

16

一個字眼上的爭執。鰻魚是炒着吃或者燉着吃，對它是無關輕重的。

此外，根據草案，應設立一個七人的常務委員會，由聯邦議會內部推選，凡對下級各機關所判決的處分有不服的，可向該委員會提起最後的上訴。委員會和國會決定，設立一個九人委員會，由聯邦議會內部推選四人。其他五人由帝國的或各個邦的最高法院人員中按人數分擔。國會相信，由此可以取得較大的保證，使人不至於太粗魯地解釋這個條例。而實踐證明，它在這裏又錯了。這個申訴委員會的判決却是這樣的反動，以致我們一八八〇年在萊比錫黨領導機關里決議，因為沒有用處，今後不再向它提出任何申訴。

草案第二〇條，即後來法令的第二八條，是關於所謂小戒嚴的規定，在一個地區里如果社會主義的活動企圖威脅了治安，則所有的集會都須報請警察廳批准。委員會和國會決議，國會或者邦議會的選舉集會不受這個規定的限制。漢堡市政府却規避了這個規定，它根據地方法令的規定，連這樣的集會也禁止了。所以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整個有效期間，除開一八九〇年二月的國會選舉時期（當時業已確定該法令到九月底就要取消了），社會民主黨在那裏沒有舉行過一次選舉集會。漢堡市政府這種手段對它毫無益

处；因为在法令統治之下，三个选区全部落于社会民主党之手，并为它所保有。

17 第二〇条即相当于第二八条的另一个修改(也是一个改善)是这样的，凡是根据所說的这一条发出的指示，必須立即或酌在下次會議上向国会說明它发布指示的理由。通过这个決議固然从沒有阻擋住小戒严的宣布，但使我們有可能，年复一年地在談論这样措施时来批判执行法令的情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辯論因此成为照例的事情。

草案的第二次討論开始于十月九日的全体會議。中央党由其領袖口头声明，它将投票反对法令草案。声明中說，它虽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堅决敌人，也不能贊成这样一个非常法令，这个法令使国民的权利保障发生問題，把所排斥的和允許的企图都一概打击了，并且用警察的揣測代替了法庭的判決。一个普通法令，面对着国内日益增加的危險，是可以要的，它在有关出版、結社和集会的越規行为方面可作刑法的补充。也期望現在采取积极措施，借以消除經濟和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工人階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而且传布很广的不良状况，“以便使正义、敬神和和平，特別也是国家一教会方面的和平，在帝国取得完全的統治地位”。

根本說来，中央党所要的，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供給它的还要多些；它要法令普遍严厉化，要普遍反动。

拥护議案的第一个发言人是議員馬歇尔·馮·比貝施太因男爵，他后来是外事局局长，末后是駐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的公使。馬歇尔，一个魁梧威严的人物，那时候是曼海姆的檢察官，他在那里也曾一再充当控訴我党同志的公訴人，被控者中間有弗兰茨·約瑟夫·艾尔哈特。这次公訴引起了一个有趣的插曲。艾尔哈特的被控是因为他曾撰拟一个公告，向曼海姆选区的选民推荐我为曼海姆的党员候选人，說我是个孚众望的人，因为爭取人民自由和人

民权利而被判要塞監禁二年。这是关于一八七七年一月的国会选举。馮·馬歇爾先生以檢察官的身份把这个說法看成是一种歪曲事实，由于这种歪曲事实，上級的命令遭到了昧着良心的蔑視。他根据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三一条控告艾尔哈特，并建議把这个血气方剛的罪犯判处徒刑以示儆戒。至于我，則并不是因为我为爭取政治自由，而是因为图謀叛国才被判罪。首席法官已經要就此結束审讯，这时艾尔哈特請求发言，說他虽是被告却也有几句话要說。他得到发言机会，在那簡短的、用最純粹的普法尔茨方言所作的答辯里是用这句话来結束的：“我的法官先生，您們不要相信上面坐的那个人（檢察官），他会把小虱子說成一个大象。”馬歇爾赶快抓起報紙遮在面前，免得被人看到笑容。但是法庭相信檢察官，把艾尔哈特送进監獄三个月。他后来的态度同刑法对他起了教育作用的說法相反。

馮·馬歇爾先生和他那些同党的煽动家相反，是一个温和分子。他贊成人們很可以达到預期目的的短期的法令。继他之后发言的是宗納曼，他声明反对这法令。俾斯麥还在一八六六年战争时期与宗納曼不睦，对他作了回答。

我怀疑俾斯麥个人对誰怀恨更深，是对欧仁·李希特尔还是对宗納曼。我相信是对宗納曼，因为欧仁·李希特尔，尽管他的一切反抗，总还是个好普魯士人，但他痛恨宗納曼这个南德意志的反对普魯士的人，这个“共和主义者”，他认为他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对法兰西共和国較之对德意志帝国更同情。所以才有在一八八四年国会选举，宗納曼同我們的候选人沙保尔进入复选，法兰克福的民族自由党向俾斯麥請示應該选举誰的时候，他叫人回答说：“侯爵願要沙保尔。”于是沙保尔当选了。

俾斯麥有一种习惯，他一旦怀着斗志（他上述的那一天就有这种战斗情緒），很少固定在当前所討論的問題上。他为宜泄胸中的

19 憤慨，他会从这一事件跳到另一事件，向擋他路的敌人猛攻。議長时常弄得无可奈何，既不敢打断他的話，而又不便阻止被攻击者的自卫，因而使辯論扯得远远超出本題范围。这次也是如此。

他同宗納曼爭吵以后，又向我們猛攻。先前曾以法国为社会主义的試驗場；巴黎公社被打倒后德国成了試驗場。随后他抱怨說：德国人是天生的批評家，他們以誹謗官厅和制度为乐事。這話特别适用于进步党，它在各大城市为我們掘松土地；它是“社会民主党的早熟果实”。接着他又重新攻击我們，譴責我們的鼓动方式和我們把群众誘进圈套的手段。接着，他抱怨我們刑法的温和、法官的慈善、迁徙自由、大城市的娱乐对群众的誘惑。他的发言是个发自容克及其伙伴心灵深处的哀歌。但是这个发言絲毫沒有政治家对于資產階級世界的本质和活动的了解，而資產階級世界的本质和活动却是他所抱怨的一切和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他必須顧到的社会生活一个必然現象的根源所在。

他继而抱怨資產階級各党派的分裂，抱怨資產階級党派方面缺乏信任和迁就。他在結束发言时要求結成各部分互相信任的紧密队伍，以便使帝国經得起一切风暴，并能有效地抵抗风暴。这些要求，根据俾斯麦自己在各党派互相斗法之中和在这次发言中为达到他的目的而努力的結果看来，对于議會却是要求过奢。他的話結束时沒有任何喝采的表示。

次日，哈赛尔曼得到机会来答复俾斯麦的攻击和挑撥。他在他的大部分发言中做得确是巧妙。但在結束时他自己却陷于挑釁。对于俾斯麦前一次攻击我的发言，哈赛尔曼答复他說：我們不磨匕首来对付俾斯麦侯爵，我們鄙視用匕首从背后刺人；我們如果战斗，我們就面对面地战斗，但是如果有人鑄彈磨刀来对付我們，那么我們也要說：“如果我們應該生活在上述这样的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于是會場中起了騷动。議長因为所謂挑起吵鬧

20

向哈賽爾曼喊守秩序。哈賽爾曼繼續說：“挑畔者並不是我，我已充分說過，我寧願走和平的途徑（大笑），是的，我寧願這樣；但是我也準備好放棄生命。俾斯麥侯爵也可以想一下三月十八日^①。”

勒維（卡爾倍）繼哈賽爾曼之後發言說：我謝謝發言人先生，他為捍衛自己的事業離開了倍倍爾體系而率直地把話說出來。馮·本尼格森先生現在也來發言，要想用冗長的講話來掩蓋掉他在霍德爾行刺後的第一次討論非常法案時所持的合理立場。他現在說：天父，宥我。

在第二讀時，爭辯越來越激烈。全體資產階級黨派付出全部力量，來捍衛它們的立場。我們這方面發言的是白拉克、弗里茨舍、哈賽爾曼、李卜克內西、賴因德斯和我，我們大半都發言數次。在討論該案第四條，即後來法令的第八條時，白拉克引起了激烈的爭吵，這一條涉及解散協會，有協會被封閉的申訴過期無效的規定。白拉克在短短的發言中，特別尖銳地反對這一規定。後來他忽然離開發言稿，在大廳中高呼：“我的先生們，我願意告訴您們，我們瞧不起整個法令！”

我們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而議會中絕大部分都是怒氣沖沖，議長向白拉克喊了一聲遵守秩序；但是在外邊，在全國，黨為這樣強烈表示我們對法令的態度而歡呼。

十月十八日，法令草案的第三讀開始。馮·朔列麥爾（阿爾斯特）議員以中央黨的名義又聲明一次堅決反對草案：誰要是像我們這樣處在這些非常法令之下，則現在而且永遠也不能投票贊成非常法令。這話講得很漂亮。但是在後來討論延長該法令的時候，²¹ 却又是另一個樣子；就在中央黨中贊成法令的也越來越多了，再不然就不參加表決會議，這就保證了多數贊成延長。

^① 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革命。——譯者

我們这方面又由李卜克内西作一次发言，以最坚决的方式对法令作斗争，固然知道，像他在发言的开始就说的，事已决定。他发言只为尽责任。他用这句话来结束：“会有一天德意志人民谴责这次侵犯他们的福利、自由、荣誉的罪行。”十月十九日举行了两次会议；议员们急于要回家。第一次是十点半，第二次是二点十五分开始。第二次会议专为名义上的表决。表决时寂静无声。随后议长宣布结果。出席会议的议员三百七十人（全院共三百九十七人），其中赞成者二百二十一票，反对者一百四十九票。即赞成者多七十二票。随后俾斯麦起立，宣读皇帝的诏书来结束会议。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向议会致辞。他洋洋得意地说，不管在讨论开始时表现出多大的意见分歧，却有一个使一切赞成人士感到满意的解决。如果这个法令在其有效期间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则联邦政府又将以信任的心情请国会考虑哪一种办法好些，是把这法令严厉化或是修改一般立法。于是联邦政府抱有希望，在它忠实执行法令不辜负国会的信任以后，国会将根据需要不吝予以帮助和支持。

忠实执行法令这种保证，活像一句讽刺话。一个为官署开一切方便之门的法令是一张任意胡为的许可证。这很快就会表现出来。并且对于每个蛮横暴行，只要是对付我们的，俾斯麦就是它的第一个保卫者和辩护人。

在他随后宣布国会闭幕以后，议长照例高呼吾皇万岁。在这中间我们已走出大厅，并且我们虽然是失败者，仍神色自若地离开会场，希望会有一天到来，即使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时期，我们将作为胜利者回到这里。我不諱言，当我起程回家时满腔愤恨。我当时立下决心，只要是力所能及，就尽一切力量来破坏这个法令的效用，并且我信守了我的誓词。

我们的敌人赶快干起来。第二天就公布了这个法令。从十月二十一日起这个法令生效。

非常法令頒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当国会在九月十七日結束第一讀并将法令草案移送委员会討論时，議會党团即往汉堡，以便在那里同党的常务委员会商討，一旦法令生效，应采取何种对策。常务委员会中的情緒絕不是愉快的。自从奥艾尔由汉堡迁往柏林加入《自由报》編輯部那时起，奥古斯特·盖布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中唯一重要的人了。盖布因而觉得自己孤立，并且在战斗中沒有他现在所期望的真正支持者。而且盖布虽然是一个才华过人、无可訾議的正直和具有专门知識的人，能以冷靜和安詳的态度处理业务，但是生来就沒有斗争性。对敌人发威风，不择手段地击败敌人，这是他本性所没有的东西。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当时我們并不知道，但可說明他的态度。盖布有心臟病，这由他不久即死亡可見，我并且在一次搜查他家时被迫作证，也觉察到这个情况。但是使我們大家非常惊讶的是，在他死后才发现，他的經濟情况并不像我們所估計的那样。他似乎是个小康之人，有个可以使他过好生活的生意（图书出租处）。他那得共妻协助建立起来的舒适的家和他的好客支持着这种想法。但这是个誤会。比如說，他若在宣布汉堡—阿尔托那小戒严时还活着，而首先被驅逐出去，那末，他在經濟上就会破产，这对于这个特别敏感的人将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像的。这样一来，盖布对于工作負担也会难以胜任，这負担在非常法令之下，即使他不再担任常务委员会正式委員，也会日益增加。对于薪金，同样也不用想。

这一切盖布当然很清楚，于是他声明，无论如何要辞职，并且认为，在法令生效之前應該把党解散，以免被警察解散，这使我們不愉快地大吃一惊。但是，盖布一辞职，汉堡将来不可能仍做党中

央所在地。

我們和盖布之間发生一次激烈爭辯。为了減輕他的工作，人們曾做各种各样的建議。但是他毫不回心轉意。因此我說明，党不再有同志們困难时來請教求助的中心是不行的。如果汉堡拒絕了，我提議萊比錫，而且我准备继任盖布的职位做司庫，面临着即將到來的牺牲去筹集款項，我現在看作是最重要的活动。就这样作出决定。于是盖布把金庫剩余的最后一千馬克交給我。这是我将来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作财政部长的基金。

盖布催促立即宣布把党解散，因为他不願再执行他的职务，我們也只好让步；因为在引頸受刑之前的几个星期時間若再組織一个临时常务委员会等到警察來解散，那会是个笑話了。于是決議，发出通告，声明把党解散。但是在做法上却引起了不滿。因为沒有由常务委员会或中央选举委员会（这是常务委员会自从台森多尔夫在普魯士实行禁止党組織以来的名称）以一道宣言向党声明解散組織，并提出它的关于以后工作的建議和鼓舞它的勇气，而是由秘书德罗席在《前进报》上发表一个通告，語調的乾燥无味，內容的軟弱无力，几乎是无以复加。由于我們的抗議，說秘书的通告是不够的，应由常务委员会并由其成員签署声明解散組織，才又在《前进报》上发表一篇这样的声明，日期是十月十五日，登載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前进报》上。但是这篇通告並沒有把情緒改善。委员会声明，已向警察局呈报解散，所以从现在起已沒有中央集权的党組織存在，也就再沒有正式組織了。于是正式組織消灭。汇款也不再有用。不应再汇款給盖布。不仅如此，人們还要求，無論哪里还有党的分支存在，都要立即解散。通告結尾說：在策略上要一致，在艰苦时期也要这样，这就是一个更为美好的将来的保证。

在汉堡會議上一致认为，靜候法令公布后对党进行打击，听凭处置。無論如何决不許自願地退出陣地。事先已經料到，党和职

工会的机关报要首先遭到封闭。那时期共有政治性机关报二十三种，每星期出版六次者八种，出版三次者八种，出版二次者四种，出版一次者三种。另外还有《新世界报》，是一个消遣性的附刊。此外出版的还有十四种职工会报纸。这些报刊多数是在十六家印刷合作社印制。

人们预料，这些机关报如果被封闭，就会有大批人员，如编辑、发行人、零售者、管理人员、排字工人、各色帮工立即生活无着。为了尽可能救济这些失业人员，必须试图创设力求迁就这个法令的新报刊来代替被封闭的报刊。拉斯克尔和委员会报告人在非常法令讨论会上却声明过，各种报刊只要改变态度，就可以不予封闭。²⁵但是这些诺言是不会兑现的。除新创设报刊之外还应当致力于写作一般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有人建议创办报纸，因为这可以成为我党同志之间保持联系的一种最方便而且最无害的方式。如果用这样或那样形式都无济于事，则很多领导人员不得不流亡到国外，这对党说来是个巨大损失。他们既然被打上社会主义者的印记，鉴于雇主集团的心情，他们是找不到位置的，而且由于经济危机之故，已有大批劳动力供雇主支配。

至于人们不久也必须计算到，有大批人员因为党的关系被逐出境，从而他们的家属陷于困苦，这个我们起初却还没有想到。根据当时讨论小戒严时权威人士的声明，我们起初认为不会宣布小戒严。我们错了。还在十一月底以前，柏林就宣布了小戒严。在一八八〇年继之而来的有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此后有哈尔堡，一八八一年六月底有莱比锡的城市和行政区等地都宣布了小戒严。不管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采取哪种手段，在宣布小戒严时，都证明所谓“忠实”执行法令乃是欺人之谈。

法令一经公布并生效后，打击就密如冰雹而来。在几天内全部党报，除《欧芬巴赫日报》和纽伦堡的《弗兰克每日邮报》外，都被

封閉了。職工會的報刊除印刷工人聯合會機關報《通訊員》而外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印刷工人聯合會也是如此，只有希爾施—邓克尔聯合會是唯一暫免解散的職工會組織。一切其他組織都成了法令的犧牲品。還有很多地方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協會也同樣被解散，還有教育協會、歌詠協會和體育協會，因為它們的領導人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就被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協會，在那裏面，如法令的條文所說，顯露出“以危害公共治安，特別是以危害各民眾階級的和睦的方式進行社會民主主義的、顛覆現有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嘗試”。

誰在今天讀到這條文，誰就情不自禁地搖頭，也許不由自主地發笑。但在當日這條文卻是嚴肅無比。警察用筆一划，就毀滅掉多年以種種辛苦和犧牲所建設起來的事業。

不是按期出刊的作品也被禁止，被摧殘者的範圍因而更加擴大。柏林警察總局公布一系列的禁令。在第一批八十四種禁書名單上，好像是諷刺似地把列奧波特·雅可比的《黎明》列為第一。一些與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作品也成為這種狂熱的禁令的犧牲品。例如奧古斯特·羅克爾的《薩克森起義和瓦爾特亥姆監獄》和威廉·斯賓德勒的各種《協調的和不一調的事物》。甚至奧地利的前部長沙夫萊教授的著作《社會主義精華》也被禁止，後因提起申訴，該項禁令才又取消。

至於要想代替被封閉的報紙來創辦新報紙的企圖，則因必須根據情況萬分小心地編輯，所以在第一年幾乎全歸失敗。人們曾嘗試在《自由報》被封閉以後，在柏林以《柏林每日郵報》的名稱創辦一個沒有色彩的報紙，但被視為《柏林自由報》的後身而立即被禁止了。其發行人因此被判高額罰金。與萊比錫的《前進報》一同作了法令的犧牲品的還有一系列的該省出版的報紙：《阿爾登堡人民報》、《薩克森第十四選區人民報》、《木爾登谷的人民之友》、《格

罗采一貝泉人民报》和《孚格特兰自由报》等。同样，《中德意志报》、《自由报》和《新莱比錫报》都遭禁止。一八七九年，繼續被禁止的有《莱比錫观察家》、《德意志周刊》和《漫游者》，一八八一年最后被封閉的报纸是《国民报》，在先还有一个小滑稽报《小灯儿》也遭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給它造成的命运。这时我們在莱比錫經年累月致力于創設一种报纸的各种嘗試。我們所得的經驗是，报纸訂閱情况一达到自給的程度就被禁止了。由于这种情况和其他各种怀疑的观察，我們发现，我們有一个坐在事务所里的警察間諜作发行人員，我們自然立即用必要的道义上的步驟把他驅逐出去。我們随后还試行同一个資產階級出版家，在他的商号共同出版一种报纸。但为时不久即发生意見不合，于是我們放弃这个企图。因为几乎到处都采取像柏林和莱比錫那样的措施来对付我們，所以我們有好几个月要維持几百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各方面都向莱比錫我們这里来求援，对于他們，我們就是竭尽全力，也只能使极小一部分人滿意。

27

那些当时不參預事件的或者甚至在国外有了可靠保护的我党同志，后来认为必須严厉批評領導人員的“不活动”。那些好人、但是坏乐师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毫不知情，这些情况我們原不能公开地大喊大叫使人周知。这些批評家中有的人是根据維登代表大会記錄来作判断的，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个記錄是騙人的。这是篡改过的，完全像后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記錄必須加以篡改一样，我們不願自相攻訐和控告。所以在这些記錄中虽然发表了对于党領導的攻击，而对于党領導為他們自己辯白的話和所要报告的全部重要东西，却尽量保持緘默或者只輕描淡写地复述一下。这也是用以欺瞞官署的。

在我的回忆录第一卷中我写着，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一这几年曾是我生平工作最多的时期，而在一八七八年秋季到一八八一年

秋季这三年中可以說是我生平最不舒服的时期，因为这是我生平最煩惱的时期。并且工作也是过多。在这期间，我因为有我的生意，
28 不至于有物质上的煩惱，而奥艾尔、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麦·凱泽尔、李卜克内西、莫特勒和其他許多人則相反，他們多少总有时候一貧如洗，那么，还有比党务重担，特别是筹措款項的麻煩首先落在我身上，更是理所当然的嗎？于是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对我成为定例。

在从事外部事务之前，首先要把家里整理就緒。所以我們(李卜克内西和我)把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不久有人願供給我們款項在国外出版报纸的提議暫予拒絕。为了避免发生錯誤的揣測，我附帶說明，對我們作这种建議的不是卡尔·赫希柏格。赫希柏格和在萊比錫的奥托·夫賴塔格以及少数当时靠近党或属于党的富裕的人都曾捐獻款項，我們以此解决了最迫切的困难。因为通过党来募捐起初是渐渐流行起来的，而且也是应到处流浪的流亡者的要求而起的。需要救济的人数在第一年就特別大，而且在不断增加。

在这样情况下，党必須从近处着手。最要紧的首先是巩固立足之地，重新集合那些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陣風暴之下潰散的群众，并为他們撑腰。如果說当时领导人头脑昏乱，党必須由群众来拯救，这也是錯誤的。群众和领导是互相依賴的，沒有那一方，这一方也就不能有什么作用。在领导(就广义而言)中間也許有多得使我們不愉快的匪徒和懦夫，可是我們因为他們大多数有物质困难而多加原諒。但在群众中，尤其在中、小地区，也充滿着重重的灰心丧气和停止活动。这就需要多次的秘密會議和集会以及有力的鼓动，使这些失去勇气的人們振作起来，促使他們再行活动。这一点成功了。关于这些辛苦的、絕對必要的活动，不能也不許让参与者圈外的人有所見和有所聞，否則要遭到告发自己的處罰。

当我们这样全力活动，要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迄今给我们造成的废墟中，拯救出还可能拯救的东西的时候，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个消息使我们大吃一惊，消息说：头一天晚间，《帝国通报》上发表了一个内阁公告，宣布柏林小戒严。继这个突如其来的凶讯之后，第二天就有个布告，把我党最著名的同志六十七人驱逐出境，其中有伊·奥艾尔、亨利希·拉考夫、F. W. 弗里茨舍，除一人外全都是家长。有几个还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其他多半是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少数几个宽限为三天以内。宣布柏林小戒严的消息在柏林市内外引起巨大骚动。没有一个人能明了这一暴行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报纸以至极右派都表示怀疑。

在讨论法令第二八条(小戒严)时，議員温德荷斯特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极端的手段可能容易被滥用。于是委员会报告人議員馮·施瓦采(德累斯頓)設法用声明来安慰他说：“这(关于第二八条的应用)显然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即在个县或地区内遭到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破坏，以至扰乱了市民对法律保障和法律治安的一般理解，以至人们能预料，公共治安会被某种不法的暴动所危害和破坏；以至，总而言之，用普通的、只能对付个人的手段的地方法令已不能维持法律保障和法律治安。”另一个保守党議員发表类似的意見。如果政府把委员会报告人馮·施瓦采議員的这篇声明誠实地当作宣布小戒严的基本条件，那就既不会对柏林也不会对后来遭到此事的本区内其他城市宣布小戒严了。没有一个公正人士会认为在那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存在着像馮·施瓦采議員所假设的那种认为有必要使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八条的情况。这正足以证明，在讨论非常法时为安慰疑虑情緒而作的一切解释和諾言而今都成为空洞的遁辞，没有丝毫价值。

由于柏林的大批流放，我們在萊比錫的处境更加恶化了。現在又要为那些无以为生的失业同志找位置，为他們和他們的家属在

他們無法生活期間籌款維持生活。奧艾爾往漢堡去了，在那裡的一家新辦的《司法日報》找到位置。柏林印刷合作社的業務主任拉考夫流亡到倫敦去了。少數被驅逐的同志渡過“大池”到美國去了，多數來到萊比錫——其中有 F. W. 弗里茨舍——和漢堡。為了再籌措一筆款項，在其餘委員會成員同意之下我草擬下列通告，分送給一切我認為適當的人們。

“萊比錫，郵戳日期。

尊敬的先生！

由於一些大約您已詳知的事件，有大批的人無家可歸，無以為生，和其家屬都陷於淒慘的災難之中。

對於這些遭難的人儘可能予以救濟並幫助其改善生活，可以說是最簡單的人類義務的要求，因此我敢在我相當多的友人同意之下，懇求您對遭難人稍予資助，並請以此意義勸說貴親友。

尊款請惠予寄交下列地址：M. 考比赤先生，德累斯頓，聖母堂六號和七號；或 J. 倍倍爾夫人，霍普特曼街二號，萊比錫。

至於捐款的忠實使用，整個事件的謹慎處理，都可向您保證。

奧·倍倍爾敬啟。”

31 這通告的措辭謹慎足以表明，我們如何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必須先確定，根據這法令我們的活動範圍究竟有多大，因為募集捐款是不能持久隱瞞的。真的，幾個月以後，我家里也發生一次毫無結果的搜查，並根據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控訴我違犯募捐的禁令。但我被宣告無罪。當時法院還沒有到懲罰為被逐者募捐的程度，但在後來，當官廳明言根據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禁止這種募捐時，司法判決就是另一個樣子了。我們當時必須單為被逐者的家屬從事募捐。

我的募捐得到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成績。後來，當法令執行得越來越嚴厲並且被逐者的人數越來越多的時候，有個別國會左派

議員也從事募捐。甚至議員拉斯克爾不久因曾投票贊成法令而受到良心的譴責，也參與了這等事。

至於說為被逐者安插工作位置，在我們，如我曾說過的，是困難萬分的。經濟危機還正處於頂點。幾乎一切行業都存在着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現象。如有哪個流亡者幸運地找到個位置，警察馬上就出現並告知雇主這個可憐鬼的秘密，雇主常常是厭惡地把這個剛才錄用的工人又辭退了。于是他必須重新捆起行李，拿起旅行杖。這對於年邁的人，是個艱苦的遭遇。

不斷的驅逐和警察对被驅逐者的惡意加害，却達到我們的救國人士所沒有料到的效果。這些迫害使這些流亡者懷着無比的悲憤，從一個城市輾轉到另一城市，到處尋找伸出雙臂迎接他們的我黨同志，於是他們以一腔怒火和悲憤感染那些招待他們的主人，鼓動這些人團結一致並行動起來。因此成立了大量的地方性的秘密結合，這些若沒有流亡者的鼓動是難以實現的。這件事使人想起在紀元的最初幾百年羅馬皇帝及其爪牙對基督教徒的迫害。他們面臨迫害而逃亡到帝國最遙遠的角落，到處宣講作為他們被迫害的原因的新學說，並且這樣就最好地顛覆了那把他們當作顛覆者而害怕他們的帝國。必須指出，被逐者多半是學識淵博、具有魄力的人，當時對黨貢獻最大，他們對黨的報答比黨為他們提供的財政上的犧牲多一倍和二倍。這漸漸被我們的敵人覺到了。各小城市的市長和地方官署不斷向上級法院呈遞被逐者在他們地區惹禍的訴狀。所以自從一八八六年起，至少在柏林，驅逐出境只是極其例外的事。人們對那些在犯禁的道路上被捕的人，當他們服刑以後，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驅逐你們出去，到外面你們就煽動，但在这里我們嚴厲監視你們，使你們不能展其伎倆。

我用什麼眼光判斷一八七八年年底，即在法令生效兩個多月之後的局勢，可以由下面十二月十二日給福爾馬爾的一封信里看

出来，他在那时期还因出版罪在茲維考監獄中服长期的徒刑。

“如果說我让您为我这几行信等久了，那我就必須重复老調來請您原諒，工作过忙。懲罰、驅逐等等給我带来了大堆工作，这是在制定法令时我没有想到的。不但不是很安靜，我現在的工作却比以前全年的还要多，幸而我长期未离开这里，才使我能把我平常所不可能办完的事都办完了。我們現在都非常忙碌，为了給无以为生、无家可归的人筹措必需品。結果倒也使我滿意。虽在悲慘的时期(因为生意普遍极不景气，并且至今我們总处于最近几年来最不利的冬天)同志們还是尽力捐獻，这就足以羞煞那些可悲的小人和現在在报刊上表现出最无耻的样子的可怜的无賴汉。

33 您很难想像，这几个月以来自由主义报刊这群走狗怎样不断地、并且甚至当現在我們的嘴已被封住的时候仍用謾罵和攻訐向我們襲击。这是播种的一粒恶种子，它不会带来好果实。

您的被逐我們自然是曉得的，您当然要上訴，但也当然同样无結果。現在人們对社会民主党人可以為所欲為，对于我們沒有公理与法律。

最可笑的是国家高級委员会对于鎮压手段的申訴的判決；它較之警察还胜一筹。有了柏林最近的这些事件，其余更不待言。

凱泽尔这星期也在这里，他还是很倒霉；他想到布勒斯劳去。

如有任何需我效劳之处，即請函告，不要客气；只要是可能做到的，即应照办。此外，請您表现出必要的曠达宁靜。即使您現在在‘自由’中，那您也会感到极其憤怒和厌恶，对于我們說來，德国在今天只是監獄。

衷心的致候。

您的奧·倍倍尔。”

我应加說明，福尔馬尔一离开監獄就遭到驅逐，是根据一个古老的薩克森法令，凡是坐过牢的人都可以由其居住地被驅逐出去。

人們在那时期就广泛应用这法令来对付曾被判刑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特别是麦克斯·凱泽尔和威廉·烏佛特是被追逐的人，他們被迫赶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走遍半个王国。

关于国家申訴委员会的效用，我以前曾作过說明，现在再由已故教育部长包塞的日記中摘录一段加以补充，它說明，这个申訴委员会不作别的事。它的組織性质本就是为这。包塞在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写道：

“俾斯麦首先提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联邦議會一通过，立即呈送皇儲，以便最快公布……认为最高法院委員馮·格瑞維尼茨、克勞爾茨、汉恩和德利烏斯充任申訴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成員，实际上十分可靠。司法部长还推荐最高法院參議馮·霍莱本，并且想借此（在我看来并不見得圓通和巧妙）把普魯士全体法官都标榜为实际可靠。俾斯麦侯爵认为，如果普魯士法律家都像檢察官台森多尔夫那样，那么，上訴法院就会很需要他們；但是普魯士的檢察官們大半自以为并不是政府官吏，而是独立自主的法官。他把巴登首席檢察官奇菲尔称为示徽的榜样。所以人們不用想使巴登法官进入委员会。”

五个月以后，一八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給福尔馬尔的第二封信里写我們的处境說：

“我收到了本月二十三日来信。我若不是不断过分劳累于极其矛盾的而且也常是最不舒服的工作，因而渐渐趋于憤激，而这种憤激也就使我的情况絕不可喜的話，早就給您写信了。如果一个人被各方面請求策划和帮助，他也认为这事完全必要，但很少能做到，这是最使人难过的。我記得在几个月前曾写信告訴您，經濟危机給我們的物质方面的摧毁較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大得多，如今仍是如此而且范围較以往更大。各个企业到处都經常难以維持，如果这样繼續下去，那就可以像数学那样准确地計算出它

們什么时候停止营业。至于在这样情况下，尤其是到处基金有限，想要减少劳动力的必然远远多于想增加劳动力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35 我們的老熟人中間莫特勒和凱澤尔完全失业，維麥尔着手用芦苇制造笔杆，瓦尔特希，因为最近人們强迫他离开此地（他以前住在这里是没有登記的），想在开姆尼茨从事鞋业，独臂的賽菲尔特想試作一下沿街贩卖书报的生意，凱澤尔、哈森克莱維尔和李卜克内西不得不仍留此地，至于能留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說，因为《新世界》报的訂戶显著减少而瀕于亏蝕，并且其他企业也只是不好不坏地掙扎着。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給您找个合适的位置，我以至上的善意也无法知道。或許可以做点翻譯工作，印成小册子的形式銷售，但当然不准冒犯禁的危險。这里的合作社或可接受出版；但由此所能获得的补助仍然微不足道。我想同李卜克内西談一下，看是否能找个外埠通訊的职务。我担心您不能接近S., S. 非常小心，小心到了胆怯的程度。

我适才想到，您或許可以来做庫尔第和呂格在苏黎世四月一日所創刊的《苏黎世邮报》的通訊員。当我在耶穌复活节后不久在那里时，他們对报纸的情况是滿意的。他們自然也不能多所作为。庫尔第以往是《法兰克福报》的編輯人之一，您可以直接写信給他，信总归是寄到报館，您若不认得他，您可以提到我。”

所以我們的困难不小，但是必須把它們克服，而且也克服了。說党好像是耐心忍受一切，是錯誤的。这种貌似恭順的态度完全不与首相相投合，他还是最乐意看到我們情不自禁地实行暴动。至于地下工作，他是想不到的。那时有人听到他說：“必須这样长期激怒和窘迫社会民主党，直到它动起手来，以便把它彻底消灭。”直到法令将取消时，即当威廉二世由于国际保护工人會議的召开和人所周知的一八九〇年的二月公告而开始走入其他道路的时候，

他还是持同样的理解。就是在其他权威人士中，尤其在军界，传布着这种信念，社会民主党对于非常法的公布将报之以公开暴动，但竟没有这回事，使人很诧异。人们只把这看做是我们胆怯的明证。一八八〇年春季，哲学家马因兰德的姐妹就这样告诉我，我认识她本人，她不久以前到柏林访问了几个星期（这位夫人是在欧芬巴赫住家），她在这期间参与了也有很多警卫队军官在场的大宴会。晚間谈话也提到了社会民主党，那些军官所表示的对我们的憎恨，使她吃了一惊。其中一人这样说：“这些家伙如果胆敢动起手来，我们就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深及踝骨。”

但也为了在老皇帝那里日益煽起反对我们的相应情绪，人们向他谈论关于我们的所谓计划的最恶毒的鬼话。只有这样，才可能当这位老皇帝出外几个月后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柏林宣布小戒严后九天）又回到那里时，对向他致敬的市参议员们说道：“业已证实了，有分支广泛的联合，以打倒国家的元首为其直言不讳的原则。”人们用这样的故事来恐吓威廉一世，正像后来费利赤内閣用相同的故事使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害怕社会民主党那样。而且人们试图对威廉二世用同样的手段。访问过皇宫的熟人曾一再对我说，威廉一世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放着对于我党最恶毒的挑拨和诽谤文件。要达到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先生们一如对于其他的世人，他们认为可以欺骗人，而他們被欺骗了，他们认为可以支配人，而他們被支配了。

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人们多次认为，我们完全死去了。人总是

相信他所很希望的东西。因为我们表面上所表现的生存征象这样少，有什么比我们已几乎不再生存更可能呢？但是我们生存着。当一八七九年二月间在布勒斯劳西部举行补充选举时，我党也起而应战，即使它未获胜利，并且集中在其候选人身上的选票虽较一八七七八年主要选举时少些，但与资产阶级诸党比较，我们损失最少。布勒斯劳的第二个事件表现得更加清楚，党还是生存着。五月二十二日，布勒斯劳东部的議員克劳斯·彼得·賴因德斯同志患无产者病而死。賴因德斯直到最后一息都是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对于他，党高于一切，所以他举行了布勒斯劳空前未有的盛大葬礼。他的补充选举的结果超出我们最大胆的期望。虽则警察以迄今未有的野蛮手段干涉竞选，例如他们禁止一切选举集会，以致哈森克莱维尔（他被推为候选人）和麦克斯·凱泽尔（他在竞选中支持他）都只能在自由地区的一次集会上讲话。七月八日的选举结果是哈森克莱维尔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之间的复选，在复选中哈森克莱维尔以多一千二百票而获胜。敌人遭到惨败，所以党更满意地庆祝胜利。这证明了，即使处在反社会党人法之下，不管一切诡计和暴力，党也能胜利。

继布勒斯劳的胜利之后，党遭到一个重大损失。八月一日，奥古斯特·盖布在卧病不久以后因心臟猝中而逝世。可以这样说，这个外表这么强壮、具有雄壮的男子头额和长髯的人在三十八岁的年纪竟作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者。若不是这个法令的刺激、凌辱和苦恼，他还会话许多年。在党的謀士中间，这个人始终站在最前列，并且是最优秀者之一，对他的十分爱戴和尊敬，在他安葬的时候表现出来。有三万多工人跟在他的灵柩后面。汉堡，党的最足以自豪的堡垒，后来证明了，盖布作为播种人所共同播下的种子长起来了。因为他的死亡，当时已患重病的白拉克的妻子写信给我妻说：

“不伦瑞克，一八七九年八月二日。

我亲爱的珠丽！

我迫不及待地今天写信给你。在接到这信的时候，你必定已知道盖布先生昨天因心臟猝中逝世。这使我们非常遗憾，他是一个杰出的人，并且在为社会民主党服务方面是一个勇猛的战斗。我的丈夫今天早晨为内心情感所支配，眼里含着泪珠，我对于可怜的盖布夫人也感到无限同情。他们没有小孩，所以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一切。唉！在世上受了一个这么不幸的打击，真令人不胜感伤，她的生活必然成为一片悲惨的荒漠。昨天我们还很高兴，看见你亲爱的丈夫在我们这里。我们还坐车到树林中远足，因为遗憾的是我的丈夫仍行动不便。他的脚好像麻痺了，它已没有生机。你的丈夫回头来会向你叙述的。这种情况究竟给我造成多少恐惧和烦恼，我不必向你尽述。看不到有什么起色，使人沮丧失望。每当我想到，在先他是多么健步，又看看他现在的衰弱，就感到悲痛异常。每想到他的状况也许会同一个老爷爷一样，我就无法排遣，但是他却还是那么年轻，一个年轻的人遭到这样的命运，要比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人苦恼得多。再过八天我的丈夫将到巴登—巴登去治疗。我的弟弟正到汉堡去参加盖布的葬礼。希望他也能在那里遇到你的丈夫。我的丈夫曾往汉诺威打电报给你的丈夫。他也会为这消息吃惊的，我们当时还谈到盖布的疾病。对于你的友好的邀请十分感谢，我本会多么高兴到莱比锡去一趟，但这是难以想像的。然而，你的丈夫曾答应我，在这个秋季你同夫利达到我们这里来。这对我来说，是愉快无比的。关于这，我们以后再通信。今天就此搁笔，我须下楼去准备晚餐。祝你好，盼你不久再来封信。衷心致候并向夫利达致以诚心的爱。

你的艾蜜丽·白拉克。”

当白拉克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她没有料到，还不到一年，她

也成为寡妇。

39 继奥古斯特·盖布逝世所加于我们的重大损失之后，又有些成功。一八七九年八月在薩克森举行邦議會补充选举，根据法令只有三分之一选区参加选举。在其中一个选区——莱比錫乡区选区，李卜克内西获胜，在茲維考乡区，律师普特里希获胜。我们在德累斯頓乡区之一和在开姆尼茨市的一个选区所得的票数都比以往有显著的增加。在开姆尼茨市，警察胡作非为，有如发瘋一般。他們竟在选举日之前不久逮捕了二十名折叠传单和选举票的我党同志，把他們用一条绳子綁得像一捆雪茄烟似地带到警察局去了。在那里，大多数的被捕者又被释放，却把党的候选人尤利烏斯·瓦尔特希和其他几个人不顾公理与法律地禁閉許多天。提起控訴是不能的。这种办法的目的在于破坏我們的选举宣传。这个目的，由于开姆尼茨警察所犯的卑鄙违法罪行，也达到了。

爱尔福特和馬格德堡的国会补缺选举，党进行得很順利。这次的成功使敌方报纸非常懊丧，以至它們一部分現在倡議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到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后去。一八八〇年一月初，白拉克认为有必要把他的第十七薩克森国会选区格老紹—美拉內—荷亨斯坦的委任辞去。这次辞去委任，引起敌方报纸各种各样的愚蠢的曲解和造謠。白拉克之所以辞去委任，是因为他既不能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取得諒解，也不能同李卜克内西和我意見一致。此外，业务上的顾虑也促使他退出公众生活。白拉克在此在一八八〇年四月八日第十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回答說：

“我声明，第一，我的健康状况不幸是这样可悲，还在耶穌聖誕节前，我的医师、医学博士奥托·穆勒在几个月来呈現的好轉后对我說，他抱着很严重的忧虑。就是現在我仍患有周期性的、非常严重的感冒，只此就足以迫使我静止勿动；还患有一种风湿性关节炎，竟然时常使我在室內如无人扶持就行动艰难；还患有一种神經

性病，对于这种病，每个較大的紧张和兴奋，即使不是致命的，也都显得危险。如果说在不伦瑞克无人相信这种病症的话，那就必定大多数居民在一夜之间都变成禽兽或天使。第二：业务的‘照顾’，像一般物质利益那样，在我一生中沒有妨碍我为我的信念尽我的责任。至于趁我现在不得已而引退的机会所作的相反的断言，则是极端肤浅和粗暴的侮辱。‘对于一批贵族大地主’，我迄今未尝加以‘照顾’，幸而现在也不加以照顾。迄今与我往来的那些先生们显然是欣赏我的业务原则，并不问我的政治立场，那些胆敢究问我的政治立场的人最好远远离开我（白拉克经营父亲的生意：粮食和面粉买卖。——奥·倍·）。第三：我诚然是对每个强暴行为表示遗憾；但是历史表明，每次来自上面的暴行总产生来自下面的暴行。所以我也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以及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因此，即使我暂时确属于全残废之列，也谈不上是他们所谓的一个‘损失’。”

这个声明是白拉克在公共生活中的末次露面。此后仅仅两星期，四月二十七日晚上八点钟，他就因严重呕血而逝世，年仅三十八岁。一颗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一个最可爱的人不在世上了。党失去了一个具有高度才智、永不厌倦、甘愿牺牲自己的同志，他的妻和他的儿女失去了热爱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他的年老的双亲（他的父亲也已患病多年）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我们同他本人接近的人们失去了一个总是乐观的可爱的朋友和伙伴，“一个你找不到的更好的人了”。

星期天，五月二日，在非常多的人参加下举行了白拉克的葬礼。这时警察又一次表现出他们的全部野蛮性和无耻的卑鄙行为；他们禁止在队伍中佩带志哀标记和在坟墓前演讲。但这并无损于仪式的隆重。不伦瑞克的我党同志自己动手罐土封墓，他们的妻用鲜花撒满墓丘，围绕它筑成一座花圈和棕榈枝的小山。

几十年来，不伦瑞克的同志，每逢他们难忘的领袖的忌日，都在他的墓前举行纪念，已成惯例。

白拉克辞去委任以后，伊格纳茨·奥艾尔被提为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候选人，为了他的竞选，我在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号召募捐。三月二日，奥艾尔以八千二百二十五票超过他那得了七千二百五十六票的对手。参加选举的人不多，奥艾尔的票数超出的也不多。但这与他无干。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的冬季，尤其是在当时比较多的手工纺织工中间，困苦已达极点，结果是普遍的沮丧。特别在所谓穆尔森格隆德的各纺织村的手工纺织工中间，困苦如此严重，我认为应当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查，并且为了促起世人的注意，发表了一本题名《我们的纺织工怎样生活》的小册子，共出了两版。在整理资料时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究竟怎样还能活下去？

另一种对参加选举起不利作用的情况是，官厅对旅馆主人规定不准供给会场开会。当奥艾尔设法补救，辗转各地，在旅馆里叫人把人们召集来举行私人谈话时，宪兵就奉到命令，步步跟着他。当时萨克森的各机关，上自最高首脑，下至最低级宪兵都醉心于这种愚昧的救国办法，但如结果所示，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在这里也简单提一下当时一伙汉堡同志在汉堡对奥艾尔所显示的不可言状的卑鄙行为，莫斯特在《自由》报上还为他们帮忙。他们指责奥艾尔和拉考夫等，说他们在柏林宣布小戒严后要求的钱比他们所应得的多。有某一个克兰斯托维尔是这次责难的主要发言人，而资产阶级报纸欣喜欲狂地把这种责难加以传播并相应地加以注解。奥艾尔和拉考夫对克兰斯托维尔提起诉讼。这案件没有丝毫不污损他们二人的荣誉。关于这个诉讼，汉堡报纸的报道也非常客观，只有柏林《邮报》，在当时同如今一样是属于党的最恶毒而又最不公平的敌人的，对奥艾尔攻击得最凶狠。这促使我公开地对

克兰斯托维尔及其伙伴說，他們由于怨恨奧艾爾而对他作此恶作剧。但因那时屢次发生这种互相謾罵的爭吵，而且最可注意的是，那不正当的一方总是倒向莫斯特陣营，所以我在一八八〇年的第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激烈的文章，我在文內說道：

“这原是敌方报纸以往的策略，把个别社会党人之間所发生的分歧故意扩大并加以挑撥，希望以此在党内造成猜忌和分裂。新近又屢次重演这种策略。与社会党人为敌的报纸希望現在能够导致一个有更大效果的分裂，因为非常法取締了德国的党报和集会权，使我們不可能駁斥攻击和誣蔑，并适当地揭露敌方的策略。所以每个党员同志更有責任，在同志的圈子里反对传播那些可恨的說法，若有不充分明白的地方，可以詢問他知道了解得更多的同志而获得解释。在社会主义政党存在的期間，任何时候沒有像現在这样感觉到大家团结的必要。这种感觉如果削弱，或者因为个别人对这个和那个怀有私怨，或者由于天生好議論和吹毛求疵的恶习，作了恶毒控訴的話筒，而破坏了这种感觉，这样，党就不再是現在这样，它将成为一个集团，最后，真诚为事业的人由于讨厌而退出，相反地，那些不能成事的无能的捣乱分子却固守陣地。”

但是那些在汉堡有組織地进行的爭吵，当时对于大多数汉堡同志沒有影响，这在汉堡第二选区的一次国会选举时显示出来了。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白拉克逝世之日，我們的候选人哈尔特曼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八票被选入国会，这就是說，以我們在这选区空前的最多票数而当选。自从那天起，这选区一直为党所保有，从未間断，这个选区的代表，自一八八一年的国会选举起是亨·迪茨同志。莫斯特始終努力反对选举，对于哈尔特曼的胜利他所加的注解如下：“汉堡俗人要想来个变換，所以不把（自由主义的）泥水匠鮑埃爾而把鞋匠哈尔特曼派往柏林。如此而已。”这样的卑鄙已成为莫斯特的习惯。

創辦非法的黨報

在国外出版的報紙，从反社会党人法立場看来是非法的，不合規定的；在外国是合法的，合規定的。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報紙被消灭后，我們国外的黨員同志首先感到需要一家社会民主主义的報紙，因为在公布反社会党人法后仍在出版的報紙絲毫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国外各大城市和比較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布魯塞尔、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等以及在美国的人数，那时非常之多。自从一八七四年起的經濟恐慌，以及在反社会党人法統治下的迫害，使成千上万的我党同志无以为生而被赶到国外。单只流亡海外的人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可见于下列数字：一八七九年由德意志帝国迁出的是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三人，一八八〇年十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九人，一八八一年二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二人，一八八二年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三人，一八八三年二十万一千三百一十四人。那些流亡者中間究竟有几千社会党人，无从确定，但他們为数众多，而且有增无已。这不仅是由于戒严地区的被逐者人数增长，而其余地区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者到处都是警察的高等猎物，并且每个打算得到嘉奖和升級或者希望上級寬容他曾犯的恶行的警察流氓（他們人数众多）都知道，充当社会党人的迫害者是值得的。若把当年警察的胡作非为和无耻行徑搜集起来，可以汇成巨册。

經過这些迫害往往被赶到国外，国外到处充滿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干部。这些协会在那些年中間成为党的主要支柱，在这期間它們推銷非法报刊和著作，并为党在国内要实现的各种目的而募捐。

就是在德国，在非常法令有效期間，一个坚持原则的报纸也是日益需要。没有这种报纸就不能活下去。首先为了作原则上的解释，国内出版的两家报纸是不能胜任的，也是不被许可的。再者，为了对警察和法庭的行为进行批判。第三，为了说明显得必要的应遵守的策略。最后第四，为的是使党员同志接到在当前情况下别无他法使他們接到的通告和建議。

在国外出版的第一家报纸，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是小报，是由卡尔·希尔施发行的《灯笼》。它的尺寸是十厘米长，七厘米宽，打算用当时常用的信封来寄发。卡尔·希尔施从一八七四年起住在巴黎，由那里被赶出来以后，往比利时的布来达，在这里出版《灯笼》。就内容来说，这小报不仅内容简陋，即其风格也不适合于读者的需要。在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期上，希尔施反对所谓在德国流行的鎮定态度。“只是为了阻止同志們支持国外报纸，甚至阻止閱讀国外报纸，就往德国各地到处写信，到处窃窃私語，到处旅行联系。”

这是悲观論調。我对于这些煽动毫无所知。他因麦克斯·凱泽尔在国会中的一次发言曾以很不好看的、侮辱的方式批評他，对此我們大家都很不贊成，尽管我們之中大部分并不同意凱泽尔那个被批評的发言。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們攻击該报的理由。至于我們的支持，当然也是沒有的，因为它以目前的形式并不能适应需要。

45

莫斯特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底在伦敦出第一期的《自由》报，情形就不同了。

莫斯特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九日由普勞岑湖被释放出来，这时就是反社会党人法生效后一个半月，柏林小戒严已十一天。所以他不能停留在柏林。他首先到不伦瑞克，白拉克在他的政治性机关报《不伦瑞克人民之友》被封閉后创办了他那非政治性的消閑报，莫斯特以为白拉克正在为这个报物色一位編輯。莫斯特一看，

位置已被人占了。他于是又到汉堡，这里自十一月十日起出版《裁判报》代替被封閉的《人民报》。但是这里既有奥艾尔、布洛斯等任事，他也同样找不到安身之处。于是他决定追随别人的先例，迁到美国去。路过伦敦时，他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被他的友人弗兰茨·艾尔哈特决定留在那里。弗兰茨·艾尔哈特也就是在《普法尔茨日历》报上倡議出版一家报纸的那个人，这个建議得到莫斯特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贊同。于是产生《自由》报。

报出版了，并没有把计划告诉我们一个字，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和請求协助。至于我們允許与否，自然是另一回事。或許提出这种条件，报纸应由我們监督而我們对于它的态度予以一定的影响。不实行这个条件，我們就既不推荐該报，也不会对它負任何責任。这是伦敦的人們也知道的。所以他們就独自进行此事。报纸在开始时編輯得还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莫斯特能长期保持理智和判断力，則莫斯特也不成其为莫斯特了。他缺乏任何責任感，天生的垂游成性，越来越为来自德国的关于官厅的日新月异的暴行的消息所激怒，他遂走到越来越激烈的迷途。

不久他也用盲目的狂热对党作斗争，特别是对那些他不了解其策略的党领导人作斗争。对他說来，没有任何事情不需要吵架一番。于是他开始在他的报上把小争执和口角大肆夸张，这种小争执在反社会党人法統治下各处較往常更易发生，因为正規化的討論的可能性沒有了。他无批判地把每句濫言閑話，特别是針對着在德国的领导人的时候，热心于整栏地登載在他的报上，并設法通过恶意中伤的注释来恶化爭端。这样，早在一八八〇年二月中旬，《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指責他說，他的报除在开始时一个短时期外，它所专心从事的敌視党和損害党远远多于进攻党的敌人。当他体会到了，党内著名和有威信的同志，起初曾祝賀他这个报纸的开办，为它撰稿并努力为它推銷，而自从《社会民主党人报》創办后，

他們越来越离开他，他就更加漫无限制地运用他那可恨的斗争方法。最后，他感到自己孤立了，并且逐渐成为他左右那些恭维他的自负并把他的激进主义煽动到最高限度的人們的牺牲品。从现在起，在激进的夸张方面簡直是沒有止境了。党的领导人在他心目中尽都墮落为正式的愚人，都可能进行一切对党的叛卖。特别是奥艾尔、李卜克内西和瓦尔特希都尝到了他这漫无节制的仇恨，他把对他們的仇恨由大陆渡海带到英国去了。他仇恨奥艾尔，是因为奥艾尔时常約束他在《柏林自由报》編輯部时的激进主义并使他感到奥艾尔精神上的压力；他仇恨李卜克内西，是因为据他看来李卜克内西爱用輕薄的嘲笑对待他那多幻想的計劃，并对他不够尊重；最后他仇恨瓦尔特希，是因为还从他在开姆尼茨时期起多年以来就认为瓦尔特希是自己的敌人，使他不能得势。就是我也不免受到激烈的攻击，但是比較起来，我在他手里还是待遇最好的。他在一八七九年秋季揭发我，說我在春季走遍德国作了个秘密的鼓动旅行，我为此給他相应的譴責，他又用遁辞道歉說，有关的新聞是在他业务忙迫时发出去的。但是此后不久，他不再觉得他对党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因为他从来就不长于知人，他很容易接近谄媚之徒，他的报纸的編輯部和发行所为柏林警察局的代理人所盘踞，他們誘他做尽一切瘋狂愚昧的事情。他对公侯帝王的謾罵带有病态性质；他开始发表制造炸弹和炸药的方法并且提倡以行动为宣传，說行动同議会里的空談比較起来，是唯一无二的适当办法。从一八八三年秋季起，他完全陷于嗜血狂；他煽惑、鼓励行刺，他的信徒若在什么地方作了这类事，他就高声喝采，誉行刺者为人类的救星。如果他的助手之一被揭露是秘密警察，像他在伦敦活动期间所常常发生的，他也只把这作为偶尔遭到的倒霉事，但这却不能喚起他的注意。在那些年代《自由》报所犯的下流无耻行为，可能有一大部分也主要是这些警探做的。例如一八八〇年年初，《自由》

47

报告发我们柏林的同志亨利希·孚格尔，说他收到由苏黎世寄给他的一箱《社会民主党人报》。孚格尔因此被驱逐出境，他的兴盛的药材店也因而垮台。对孚格尔所提起的控诉，没有一句是实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自然就要在国外出版党报。除了已说过的理由外，还可以希望在必要时，对抗莫斯特的造谣取利。在党团内，当我和李卜克内西首先提出这问题时，起初意见很不一致。党团内有不少人始终赞成敷衍因循，他们害怕由于创设这样一个报纸，官厅对党作更加严厉的处置，而他们所抱的不久撤消非常法的希望又成泡影。李卜克内西和我坚决反对这种理解。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尝试一下。报纸应在苏黎世出版，这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我们在苏黎世居住的同志们，有由柏林被逐出的保险业稽查施拉姆、卡尔·赫希柏格和他的秘书伯恩施坦，他们会支持这件事的。瑞士的同志中没有可以托付办理此事的，就是苏黎世的德意志协会中的同志也没有这种力量。但上述那些苏黎世的同志不满意这个建议。这些同志产生了特别消沉的情绪。早在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伯恩施坦就已写信给莫斯特说：“以你的写作方式，你对于我们的事业正像那时的《人民国家报》那样不会有大的益处。我早就确信，它对我们损害多而且很多，因为它给我们树立些不必要的敌人，并使我们自己的人学会那种愚昧自负的作风，觉得自己完美无缺，高于一切，对于一切不加审视，肆意谩骂。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形幸而减轻，如果你想再提倡这种作风，那么，你至少必须允许我提出反对它的抗议……”在同一日期，赫希柏格显然是答复莫斯特的一封信里说：“关于息事宁人的事情，今天我所做的不过是以往我所常做的；我相信，您还记得，我们报纸的风格，特别是莱比锡的‘中央机关报’的风格，常常使我非常不满，谁知道，在报纸和鼓动中所常常显示出的夸大，是否对反社会党人法必须负一部分责任。”这些议论幸而以后被别的议论掩盖起来（关于这

我以后还要談及)，沒有公开，否則將惹起党内同志的憤怒而供敌人以武器。

苏黎世的人們對我們的建議的回答是个反建議：发行一种用胶版复印的通訊。最后，人們声明同意我們的建議，但不大热心于实行这个建議。李卜克內西的意思是請卡尔·希尔施担任編輯，他的《灯籠》报已沒有繼續存在的希望，我开始也贊成这办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希尔施这人选也同意，但希望報紙在伦敦出版，在伦敦，報紙的存在有最大的保障，而在瑞士則不然。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怀疑苏黎世的三人团：伯恩施坦、赫希柏格、施拉姆，害怕他們对報紙的态度发生不利的影響。希尔施願意担任編輯，但要求知道是否也具有必要的基金，以保证報紙的出版。李卜克內西始終很偏愛伦敦和英国，傾向于把報紙移在那里。我則坚决反对；我們不僅要想同办報紙的人員保持通信联系，而且也要亲自往来，如此，則在苏黎世比在伦敦容易多了。此外，苏黎世是个說德語的城市，并且瑞士与南德意志各邦毗連，对于同我們同志往来有不可否认的好处。再說，由瑞士往外私运，也比由英国运出容易組織些。至于希尔施要求報紙的持續存在有个經濟保证，也很使我討厭。我們以往在創辦報紙时从未提到过这样一个問題，人們非常信任党的号召力，都沒有注意这問題。所以我最后贊成以福尔馬尔任編輯，我认为他是較合适的人选，并已同他面商。关于这件事的情形我在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写信給他說道：

“您的信沒有在柏林接到，今天才接到。关于您的职位，我可以奉告如下：我們決定，要在苏黎世（假定人們同意設在那里）出版的新報紙，預計請卡尔·希尔施或您担任編輯。所以請卡尔·希尔施，是因为他要把他的《灯籠》报停刊，在这种情况下請他担任这暂时不能有特殊待遇的編輯职位，似乎是礼节上的要求。我希望，我願意他拒絕，因为他在巴黎生活較好（希尔施的被逐出法国的命

令在这期间已撤消)；事情在最近十四天内可决定。李卜克内西先
50 往汉堡，为了在那里商得对计划的同意，而后写信到巴黎。我从另
一方面叫人写信告诉卡尔·希尔施，他应当不接受。暂时还不能
说确定的话。这报纸如果没有意外障碍，最迟应在八月中旬出版。
如果我告诉您，瓦尔特希原想在这星期开业并且已接受我应寄给
他的钱，昨天却匆匆忙忙地往不来梅去了，因为赫希柏格声明说，
若是瓦尔特希来作经理，他愿意保持那里的生意，这样您就会觉得
在波希米亚(福尔马尔那时在台沃利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会晤是
不可能的了。瓦尔特希想由不来梅往汉堡，他什么时候由那里回
来，我不能预料。李卜克内西明天往布勒斯劳，再从那里往汉堡，
星期一才回来。凯泽尔打算这星期往夫赖堡和区里去，但在本月
十八日复选时在布勒斯劳，此后何在，那我就知道了；维麦尔在
南德意志游历，我星期一要离开这里约十六天，如此则议会党团只
剩弗里茨舍一人，据我所知，他是在这里的。所以要想商定或办理
点任何共同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

被监视的事情，您的确必须向公众发表，再者，这同我们在柏
林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我们在那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仍被监视。

此致

衷心的敬礼

奥·倍倍尔。

您的徒刑一旦开始，请即通知这里(福尔马尔还要服刑三星期)。”

我在这里要说明，福尔马尔写给我的那些信都不见了，恩格斯的来信也是如此，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起恩格斯的信才又保存下来。

一八七九年春天，我们得悉，莫斯特为了给他的报纸作宣传，写了一封信给一位苏黎世的同志，其中说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那

里我已屡次作数小时之久的拜訪。那些人在《自由》报开始之前固然是因为他们以往曾有类似尝试而物质牺牲过大，所以不以为然，但是现在他们已完全同意了——他们对于报纸的态度（包括笔调）也同意，这尤其爱德（伯恩斯坦）会注意到的。与来自莱比锡和加斯达纽拉（赫希柏格和伯恩斯坦一八七九年初曾在那里停留）的那两次想劝阻我的尝试不同，那些老瑞典人和另外几百个从德国来信鼓舞我的同志是同意的。那些人绝不想对关于莱曼及其伙伴指责什么，他们答应我为新攻势尽可能多供资料，因为必须经常刺激反动派，否则他们就恢复常态，因而就没有使他们永久处于狂怒那么好的结果。”这自然无损于远离马德里的伦敦同志。我认为，莫斯特在这里所写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合乎实情的。人们必须牢记，那封信的日期是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也就是写于《自由》报编辑得较为合理的时期。但莫斯特却设法过分地并且相当夸大地永久为自己利用二老的同意。这种大话渐渐也吹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耳朵里，使他们，如下列信件所示，向白拉克询问这事的内情如何。白拉克转来问我，我于是以下面的信回答恩格斯说：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上月二十八日尊函已由白拉克寄来，您信里要求把莫斯特所说的有关您和马克思对《自由》报的态度加以说明。

就我记忆所及，我的消息来自苏黎世的伯恩斯坦，所以与另一达到您那里的通知是同一来源。

我现在可以建议您，暂时不必声明反对莫斯特，相反地，把您和马克思的意见用别的方法公之于世。

各方面都提出要求，说我们十分需要一份国外报纸，它可以自由地并且主要地以社会主义观点来写文章。一方面，为了能够保持更好的联系，其次，特别是为了对于如策略问题那样的原则间

52 題，能够毫无拘束地加以討論。報紙將在下月按照以前的《人民國家報》的篇幅和風格在蘇黎世出版，這個地方，在審慎考慮之後，認為是條件最好的地方。卡爾·希爾施應該並且願意把《燈籠》報停刊，則由他任編輯，或者由福爾馬爾充任。我們全都願意為之寫稿，並且也應盡可能為報紙組織推銷。

有了這個報紙，我們也就有了對付莫斯特的適當武器（雖然我們已決定，對《自由》報要多用不理的態度而少用直接攻擊的辦法以使其不能有何作用），並且在這報紙上您可以在倫敦通訊欄中談所認為必要的東西，我們所盼望而且也作此打算的是，您和馬克思都要做報紙的撰稿人。

為了使報紙不因德意志政府方面的干涉而難以存在，報紙就應具有一種國際性質並且在德國人編輯之外設一位瑞士籍編輯。

我毫不懷疑，這計劃會順利完成，並且也可以得到您和馬克思的贊同……

請您和馬克思原諒我這樣疏於通信，但我實在是過於忙碌；經常改頭換面，一時是商人和跑街，隨後又是黨人，對於二者都要盡量嘗到其無味的一面，使我經常處於憤懣和過勞之中。謹向您和馬克思致以最衷心的敬禮。

您的奧·倍倍爾。”

現在我先就《社會民主黨人報》事件轉錄福爾馬爾和我以及恩格斯和我之間的來往書信。並對書信中我認為為了進一步理解而有必要的地方加以注解。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我由萊比錫寫信給福爾馬爾：

“在百忙中，只寫幾行，因為我明晨即須起程，盡是工作，不知如何下手。

不要想李卜克內西遷居蘇黎世；像您所想的那種情形，把重心

完全移到国外去，我們沒有想到过。况且李卜克内西不能帶着家眷到那里去，从那里来参加国会，而其余的时间都住在国外，这会引来过多的奔忙。

我們认为每星期出版一次就完全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 53
由伦敦来信，他們竟认为十四天出版一次也就够了。誰来筹措出版多次的费用？这完全不可設想，因为每星期出版一次，每季的訂費就已經要三至四馬克，因为发行费用很貴。照信件寄发，每期邮費二十分尼。編輯同原已在苏黎世的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共同工作，足够一个委员会了。而且主要作品当然是由德国供給。关于名称，卡尔·希尔施所建議的同您一样。我們反对，因为这将給德国政府以实行干涉的第一个理由而使我們在瑞士的事业成为不可能。

关于时间，苏黎世的人們好像过于迟緩，他們想在十月一日才开始，我們反对。九月一日一定必須开始，但如果苏黎世的人們声明不能提前，我們自然不能相强。我打算在旅途中給伯恩施坦写信，并将尽可能快些写。

如果您願意并认为适当，那末最好能把您那三个星期了结了。我若处在您的地位也要如此做，因为这样一来，您就能随时为德国活动。

关于編輯，苏黎世还无任何决定，已先写信給卡尔·希尔施了。苏黎世的人們詢問，您如在外国生活，是否会失掉养老金。

恩格斯和馬克思声明对于我們的計劃大体同意。草此。
您的奥·倍倍尔。”

我因照顾生意，不得已而利用夏天作业务旅行，因而使我不能繼續从事于苏黎世的事情，不能坚决地催促那里迅速作出决定。于是我迫不得已已在八月十七日写給福尔馬尔下面的信：

“我昨晚旅行归来，在旅程中我非常匆忙，以至无暇通信。我

54 目前所知道的与三星期前相差无几。苏黎世的人们好像很疲惫和动摇不定,这样来办事,我自然感到十分不满。

由于伯恩斯坦写给希尔施的和希尔施写到伦敦的那些信,恩格斯和马克思辞去撰稿人的职务,这是我由今天看到的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发见的。原因是态度疲軟松懈,据那封信說,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忧虑的。

至于說报纸要有理性并且要适合其目的,这由我們来负责;关于編輯部的事情,要像您理当希望的那样迅速解决,在目前我不能再有作为。所以我請您在接到苏黎世复信后再作决定,我对这不能負什么責任。也請把决定通知我,以使我明了情况。

明天将写信給伯恩斯坦,我的信将是十分坚决的;此外,我现在只須再等不多几天,就有时在家,我就要尽力来解决这件事。还要提及的是,根据恩格斯来信,希尔施决定拒絕,那末,只要苏黎世的人们不願独断独行,他們就必须接受我們关于您的建議。否則将使我們这方面深成不愉快并导致分歧。草此。

您的奥·倍倍尔。”

55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职务,主要是由于希尔施的慫恿。他們也还充滿了由赫希柏格《未来》报时期遗留下来的对赫希柏格不信任的心情,他們认为他把报纸开放給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那样混杂的社会阶层,所以他們现在害怕《社会民主党人报》重演旧戏。但现在希尔施不仅把伯恩斯坦的信寄到伦敦去,这些信看来可能(我始終沒有看到这些信)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忧惧是正当的。希尔施在这期間也到苏黎世来了解一下事情状况,而后再向伦敦报告,說他在苏黎世除了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斯坦以外也遇到了萊比錫的代表辛格爾和菲勒克,并且說前三人將組成为編輯部的管理委员会和監督机构。他們的决定如有分歧,即請我們在萊比錫作最后裁决。希尔施根

本沒有把迁往苏黎世当回事，加之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上述三个人怀着滿腔的怨恨，他把这一切尽情向伦敦加以相当的說明，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辞去撰稿职务。

为此我在八月二十日写信給恩格斯：

“亲爱的恩格斯！

您对于新近要創办的报纸的理解是不对的，如果說卡尔·希尔施由于伯恩施坦信里的几句话也抱同样的理解，那末当他由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了足够的解释后，这就更不可解了。李卜克内西談到卡尔·希尔施，非常不滿，指責他說，他之所以不接受編輯职位，完全不是由于他所說的那种动机。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們所以容忍报纸的編輯部，除了由于我写信告訴您的意思以外，决沒有其他意思，至于說赫希柏格有决定性影响，那是根本談不到的。对于这，因希尔施辞謝而担任編輯的福尔馬尔，也将予以注意的。我們預料，福尔馬尔的作风宁可是太激烈、太强硬，而不是相反，而且福尔馬尔自从参加运动以来，也始終是极其热心地从事于国际运动，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生疏。此外，福尔馬尔（他目前还要服徒刑三星期）到苏黎世去之前，还要在这里同我們有一次較长的彻底的談話，这样他就詳細知道我們的意图。

所以我希望您和馬克思仍照前約为报纸撰稿，由此可以使它真正成为一德意志—国际的报纸。

請您原諒我这样迟迟奉复，我作了許多星期的业务旅行，在星期六才回来。我在旅行中所得到的关于人民情緒的印象，完全符合于您先前信里关于德国关税政策的作用所說的話。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我們还是很滿意于事情的进行。

敬候您和馬克思安好。

您的奥·倍倍尔。

附言：即使赫希柏格也用物资接济报纸（我目前还絕不知有此事），我們却絕不是单靠他来維持的。我們已可望由許多方面得到总数八百馬克，如有需要，还可更多。此外，我希望，津贴不需要很多，报纸不久即可自給。最后我必須說明，赫希柏格迄今沒有作过任何取得不正当影响的嘗試。这个人要为自己作的事已經很多，身体患很重的病，不能作这个了。担任《未来》报編輯的时候，他自然尽可能給他的观点以活动的余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部并不比任何其他著名的我党同志的票数多，他与我們相反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貫徹。”

在福尔馬尔就編輯职务之前我給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說道：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編輯問題，因而主要問題終於解决了。您和我們之間的会晤自然是很值得盼望的，并且最好能在这里举行，因为这样您往苏黎世就不要繞路了。在那时以前让一切特殊問題置而不論，因为当面谈，一切即可很快解决。

看来对苏黎世施加向左的压力，是非常适当的，而且现在这压力就應該并且将要从这里实现。那里的第一批布置得不到我們的同意，因为它们显然有軟弱无力的毛病。可見如果关系到以爱好松懈为特征的人們，感觉和精力多么容易丧失掉。

57 路費將由我負責。来时，請費神把我的书带来。您写給莫斯特的信不会有多大效果。莫斯特若听到这个計劃，他还会更恼火，因为这在他不仅有生存問題，而且也关系着一个对党的影响問題，他将又一次把反对他的最恶毒的动机轉嫁到我們身上。我没有发表过一行反对莫斯特的文章，而他却对我发动同对別人一样盲目的攻击。

已給在伦敦的恩格斯和馬克思写了信，我想，他們虽有点輕易

地受了希尔施的影响，现在却要改弦易辙。

希望您服刑的时间不长并且一切如意。祝好。

您的奥·倍倍尔。”

福尔马尔一离开监狱，德累斯顿警察局就给他一道由德累斯顿驱逐出境的命令作为祝贺他往苏黎世的礼物，而麦克斯·凯泽尔却因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二条的判决也接到驱逐令。

李希特尔的年鉴

对于我们大力促进《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的要求，苏黎世的三个同志——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斯坦——的恼怒和厌恶现在明朗化了。他们在一本由赫希柏格创办的著作《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一八七九年七月出版）发表一篇共同写作的文章，这同我们所计划的事完全不合。我们想在我们要创办的报纸上用一切力量对可耻的法令（在我们心目中指反社会党人法而言）作斗争。但是他们三人是用一种无为主义（三月间写给莫斯特的信就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把这法令看成一种对我们并非不应得的惩处，来责罚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之前那种不循规蹈矩的举动。他们还在文章的开头（文章题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党的批评性箴言》^①）解释说，党必须用反社会党人法所强加给它的十分必要的安息时期来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也就是需要一个懺悔时期。他们先责备说，人们迄今无论在市区选举或邦议会选举都没有不顾各邦现行法令而参加选举，然后他们又批判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所抱的拒绝态度。据说，

① 这篇文章的署名为箴，意指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斯坦三人。——译者

因此人們就冒犯了干練的同盟者，因而不能爭取有才智和有知識的人們，以便通過他們繼續發展。它接着說，人們片面地作為《工人黨》而行動，因而依然局限於成為少數人的精神產物，他們在黨機關報上屢次用相同的口號重復着拉薩爾的鼓動小冊子的內容。只為工人寫東西和只為工人說話，人們這樣把民眾大會的語調轉移到報紙上，並且企圖用強有力的表現方式超過它。報紙的聲調完全無助於養成一種良好趣味。如果人們想把我們報紙上出現的謾罵編成一本辭典（關於這點，拉薩爾也因在《巴斯夏—舒爾采》一文中個別語句缺乏禮貌而受了一次打擊），“即使最激烈的同志也決不會把這看作學習良好風度的模範……並且風格即其人……率直說來，這裡個別領導人的惡劣榜樣直接起了傷風敗俗的作用”。

道德說教就這樣進行下去。這種說教甚至涉及到黨員同志的衣服和外表與態度。“因工作而弄髒了，確不可恥，但在做工作以後滿身污穢，還覺得舒適，就可恥了。”

關於“社會主義思想深入知識界”，照他們三人看來，就是說：“斯托克爾和托特二牧師的舉動，甚至俾斯麥侯爵對那即使不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卻那麼堅決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人物，像樞密參議瓦蓋納和洛塔爾·布赫爾的態度，也顯然表示，新的真理是不可抗拒地得人心。”接着是竭力反對一知半解的教育，反對個別編輯人的缺乏圓通，並提出一個問題，黨對於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敗仗自己是否負有一些罪過。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59 我從這篇文章中轉載的只是簡短的、不完全的摘錄。

這篇文章對運動沒有任何高明的觀點和任何深刻的理解，我們把它看作頭等的腐儒作品，在各處黨人中，凡是讀到它的，定會引起憤怒。這樣一種舉動的時間，選擇得極為不幸。幸而這本禁書被禁止公開發行。對於俾斯麥及其伙伴來說，這篇文章就是對他們反對我們的態度表示十分滿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接到這本書

(他們比我們收到得還早),讀了那篇文章,都大為震怒。這本書還誤使他們確信,他們從這本書認為赫希柏格(沒有他出錢,不可能出這本書)是一個故意破壞黨的人。他們寫了一篇通告信,把那本書和文章加以徹底批判。恩格斯甚至於寫信給我說,像赫希柏格這樣的人,必須由黨里清洗出去。他們把意見書寄給議會黨團,我們商妥後,黨團由弗里茨舍起草答復。通告信由我們寄給白拉克,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決要求的,並且由他再寄給蘇黎世的三顆星。我為這件事寫信給恩格斯: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茲附上答復您和馬克思的通告信的回信,所以如此拘泥形式,因為它是弗里茨舍擬的稿。

我正要發出文件時,收到一卷李希特爾年鑑的一部分,其中有那篇聲名狼藉的文章。我閱讀它後,理解了您的憤慨。除了原則上的錯誤,這也是一篇我從未見過的迂腐作品。三位作者那樣神氣地把自己放在一切人之上,高高在上地用批評的眼光向下看,敗壞了同一切人的關係,卻沒有爭取得一個人或令一個人滿意。並且這個作品中還充滿矛盾。

我自然要寫信到蘇黎世提出我的意見,決不延緩。這裡其餘的人一看到文章,也就要這樣做,這事由我負責。在我必須對這一著作及其完全無益的發表,表示反對的同時,在另一方面我也勸告您不要把作者對黨內的影響估計過高。我相信這樣說並不過份,在黨內即使只是在大体上同意這文章的,不會有十二個人,並且沒有人比作者自己所受的損害更多了。 60

關於作者在黨內的影響,您的看法完全錯了。我須一再地並且特別強調地說,赫希柏格雖然在物質方面對黨有真正突出的貢獻,但向來沒有作絲毫的嘗試,來為他的貢獻要求相應的影響。據

我所知，他从沒有提过什么条件，說这个或那个报纸必須这样或那样来編排，說这个或那个編輯人必須辭退或者必須安插另一个人。每次有某方面前来向他求助（而且这事是常常有的，他为此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产），他总是詢問盖布或者我，照例詢問我們二人并且还詢問他人，他是否應該帮助，某企业或某人是否应受接济，我們的話对他是有約束性的。因为这种非常少見的毫不利己，我就寬恕了他的各种錯誤。

如果說他在《未来》报上通过他的編輯方面的活动而得到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事实上缺乏适当人員的原故。而且，我們如果认为党内已有許多原则上完全清楚的人，那就是大大的自欺。这或許是个錯誤而且令人遺憾，但也无法改变。这是因为党存在的時間还短，并且因为一种情况，即成千上万的人首先是由于极不同的原因而并无清楚的認識就参加了党，然后在党内逐漸受到必要的教育。

现在再回来談一下所提到的人物，我所見如下：

61 希尔施正像福尔馬尔那样，不必因苏黎世人們写信里有些不仔細而感到不快。福尔馬尔写信到苏黎世把他的立場說清楚了，他在这里取得他的指令，他到苏黎世后，事情进行得很順利，并无阻难。今天他嗾怨說管得太少，至少是有关业务經營方面；編輯方面还没有任何人和他接近。如果您相信，只有希尔施才可以帮助我們創辦一个独立的报纸，那您就大錯了。这里您把我們估計太低了，也把苏黎世的人估計太高了。

如果希尔施現在极其重視他詢問基金时得到滿意的答复，而您也是这样并认为他完全正确，这就是我所不解的了。

党从来没有把严格的商务經營作为党对企业的标准，否則，大多数的报纸都办不成。我們那时的《民主周刊》，从《民主周刊》产生《人民国家报》和后来的《前进》报，都是沒有錢而創辦起来的，此

外，还有許多其他报纸企业也都完全如此。

老实說来，这个问题这次也不大使我们头痛，因为我们大家以往和现在都确信，报纸在短期内不仅可以自给，而且也还可有盈余来弥补开办费用。

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打算是，万一我们筹不起款来，赫希柏格会同意预借必要的开办费和初期费用的。希尔施若是来问我，我可以照我告诉您的话来回答他，不会两样。只是我觉得，希尔施若没有几千马克的津贴作保证，他就对企业没有信心，因为他缺乏这种信心，所以没有鬼也见鬼了。

我绝不想继续就这一点发表议论。事情已了结，企业存在着，也将这样存在下去，它还要赢得您和马克思的喝采。

如果说我们在报纸的笔调上要求一定程度的审慎，那是因为，这样一来，在报纸推广后跟着来的不可避免的诉讼中，法院不致还因为内容关系而控诉被告以重罪。现在我们绝对不要这种使我们受重大金钱牺牲的判决。为大批的被逐者及其家属和其他因反社会党人法而生计无着的人们来募集必要的款项，就已很难维持；任何要我们掏腰包的新要求，都使我们十分不乐意。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我们的情况就可以好些，但是危机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咄咄逼人；我们最好的地区受它的压迫也最重。这是我们不管愿意与否必须估计到的情况。

62

关于凯泽尔的事件还说几句话。我率直奉告，像希尔施攻击凯泽尔的方式与方法使我愤恨，尽管我不同意凯泽尔的态度。对待党内同志不能用这种方法。这种攻击充满了私人仇恨；人们看出作者是欢欢喜喜地抓住机会，找凯泽尔寻衅的。

党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想法，有希尔施也参加的哥达代表大会（一八七七年）上的决议可以证明。那里所通过的决议，卡·希尔施和莫斯特都赞成的，就是我们行动的准绳。至于通过

保护关税俾斯麦是否会得到几百万，则于我们完全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见到，在目前情况下保护关税对于工业是必要的。在这个见解上我们有分歧，而且不止在一种情形下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我们议员有分歧，而且全党也有分歧。例如，奥艾尔是狂热的保护关税派，而盖布和布洛斯是同样狂热的自由贸易派。赫希柏格拥护无条件的自由贸易，而伯恩施坦拥护有条件的保护关税等。

使我们在国会中丢脸的，不是我们的表决，而是发言的内容贫乏。对于凯泽尔有关铁的关税问题的不幸的初次发言，没有人能比我们更加恼火了，他也没有少受责备。瓦尔特希本应该作总发言，而在第一次总辩论中没有能讲话，而当他在第三读发言时，他被安排得这样不幸，以至我们不得不因他未犯错误而欣喜。这是件倒霉事，我对这也不满意。

此外，使我们这次代表显得疲惫无力的是（除开各式各样的打断发言，这种打断发言单是我在粮食关税问题中就遭到二次）会期过长，这迫使我们差不多全都经较长时间才能回家并时常缺席，再就是钱财缺乏，不敷这样长期应用。您在国外完全不了解，差不多我们每个人要克服的困难。假如我有一次在选举中落选而得以闲散几年，那我将不会视为不幸。

至于您关于新机关报的态度所表示的担心，我不再深论。报纸在这里，请您评判。如果您和马克思不满足于这报纸的某个方面，就请您帮助改善，同时请您多多给它写文章。

明天我把您来的文件寄给白拉克（附带说，他因患病，几乎一切都不知道），而后由那里寄往苏黎世。

向您和马克思致以
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切上述的阻碍终于被克服了以后，报纸的第一期在九月二十八日出版，上面有一篇由报纸的出版部和编辑部署名的号召。号召首先指出，反社会党人法使一个公开代表党的原则的报纸成为不可能，不仅在德国如此，而且在奥地利也是如此，那里没有非常法令，通过没收和判决使每个代表我们原则的东西，无论如何温和，都遭到重大的困难。因此，一个机关报，既要特别顾及到德国和奥地利，又要无保留无畏忌地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和这些原则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这样一种报纸是必要的。获得的成功表明，德意志的党迄今并未具有真正的党机关报而仍能领导斗争，但是从长远看，一个以我党同志在原则上的提高和发展为任务的报纸，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刊是由一些说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来办的，他们在瑞士相会并且决定出版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德语国际机关报，作为党准备对各方面进行斗争的辩护士。报纸的态度决定以哥达的统一纲领为准绳。党今后和以往一样，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但它却最坚决地反对愚蠢的乱搞革命和乱搞暴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完全”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上，以往如此，现在仍如此”。因为一切国家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先驱者都允诺做本报的撰稿人，所以它已不是私人企业，而是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报。

以下的几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议会党团活动的总结报告。关于应遵守的策略，报告说：党的任务是：不使反动派有可能把社会民主党当作红色妖怪来利用，消除那通过无耻的诽谤而加诸我们的仇恨，并且这样办，把对主要乱政和主要缺点的仇恨转

到那些积极犯罪或消极放任而实在应该仇恨的人们。“我们过去这样，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并且我们将来还是这样。”

报告劝人不要抱幻想，不要以为反社会党人法和柏林的小戒严将要告终。反动派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中止，直到撞在不可逾越的反抗上为止。

结尾说：“同志们要到处相互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努力与整体联系！现在是考验和锻炼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最大限度地尽自己的责任，对党贡献出自己的全付力量和能力。迫切要求大家协作。谁要捣乱和制造纠纷，谁就是我们事业的敌人。对每个人不盲目信任，但也不盲目地不信任，同志们的严格批评同严格的自我批评相结合。我们认识到，反社会党人法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履行这责任。社会民主党万岁！奥·倍倍尔，威·布拉克，F. W. 弗里茨舍，麦·凯泽尔，威·李卜克内西，尤·瓦尔特希，Ph. 维麦尔。”

65 哈森克莱维尔在国会的末次会期结束以后才当选，他用一个附启声明赞成议会党团的总结报告。

我现在再录上几封信，其内容不单是有关《社会民主党人报》，但我认为，就这几封信暴露了党内迄今还毫无所知的意见分歧而言，却是极其有趣的。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回答福尔马尔的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苏黎世不能一切都那么顺利进行，我们大致已经想到，因为虽则不痛快的事，照您自己所说的，多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某些胆小怕事，可是一切事都会逐渐就绪。

如果施拉姆远远避开，赫希柏格又常常旅行在外，那末伯恩施坦就应当给我们建议两个人来为他料理业务而按时向我们报告。一个坚强和正规的发行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很希望，特别是伯恩

施坦可以多照料一下，因为他既是一个商人，必定有安排行政的才具。我也曾写信说过，适当的做法是，应考虑发行部必须发展何种业务，并应考虑发行部必须尽可能领导和组织书刊业；烏萊要全力从事于发行部工作，对于他，工作是不缺的。附件是有关发行的，請轉交烏萊。我們都有坚定的信念，报纸不久即可自给自足。各处的情绪都是有利的。收入在开始时难免困难。人們还不懂得自己去设法，而且有时候还要劝说和组织。特别要提倡的是，您处在领导地位，要大力使大家知道，报纸的订购和阅读是不犯罪的，而只有把它转给第三者才算犯罪。我只要把最急迫的工作处理过以后，就要写几篇文章，谈论我們的人受到反社会党人法处罚时的态度。人們能忍耐許許多多的东西，但不願容忍非常法令，即使申訴沒有益处，人們仍要控訴到最高法院，以便使我們那时更能毫无保留地在国会中取攻势。您对莫斯特和《自由》报的那种策略，我們完全同意，这从一开始就沒有意見分歧。莫斯特無論怎样常常写信，我們也不看它。他因此在他自己有理性的信徒面前把自己判決了。事实上，单只报纸的出版就在各地造成了最有利的印象，即使是在迄今一直完全站在莫斯特那方面的人們那里，情绪虽然没有立即转变，却已有显著的动摇。到现在为止，据我所悉，报纸的态度是人所赞成的……

請您在报头上发表一个为被驅逐者募捐的有力号召。我簡直沒有办法了，今天又有七个最近由柏林被逐出的人（全是家长）来到这里，我再也不知道应到哪里去弄錢。請您注意馬代的殘暴策略，他以深思熟虑的惡意，主要是把家长驅逐出境。这家伙显然是以挑撥为目的，願使那些被他的蛮橫行为逼得沒有办法的人們来一次暴动或一次新暗杀。此外，請您注意，这种放逐只有一个目的，即使愚人认为再宣布戒严是有理的。

还要奉告的是，我因为为被放逐的人募捐而被控，在再前一个

星期宣布无罪。紧接着就宣判了。

您可以在号召上说明，人们可以将款寄到德国已知的地址去，此外编辑部以及发行部也可以声明已为此作好准备……

我们全体致以
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上面信里所说我要写的文章，后来出版了；题名是：《我们在警察和法院之前持什么态度？》在这不仅有警官而且还有检察官和预审官都不断以严重的违法对待我们的同志的时候，这些文章中的说明是有必要的。尤其无数次的搜家，通常不尊重法律条文。
67 这样的搜家每年总有几千次。例如，德累斯顿警察竟敢做违法行为，一个月之久在橙格尔同志的家里天天搜查。这显然是滥用职权。我写的那些文章在出版后订成小册子，销售了几千份。这对党内同志是件好事。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我接到恩格斯回答我十月二十三日信的复信。他写道：

“亲爱的倍倍尔！

多谢您的以及F.和L.^①的通知，它使我们终于看清楚了实情。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决不是那么简单，由以前莱比锡的来信以及对希尔施的误会和纠纷，即可证明。如果莱比锡一开始就阻止苏黎世人所要求的审查，则误会和纠纷就不会发生。人们如果这样办并通知希尔施，则一切就绪。但是因为沒有这样办，所以我把现在的作成的和压下的通知和以往所有参与者的信件，再来作一次比较，只得出这个结论，即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苏黎世人的审查只是为希尔施而设，对于福尔马尔原是多余的，这话不无道理。

^① 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编者

关于基金的事，我不诧异您把它看得那么轻易。这事您才尝试第一次。希尔施却正从《灯笼》报得到实际经验，我们也已多次看到并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他若对于这点认为要郑重考虑，我们只能说他是正确的。《自由》报在第三季度里尽管有一切津贴，结算起来还是亏空一百镑，等于二千马克。我从不知道有哪一个在国内被禁止的德意志报没有大宗津贴而能维持。请您不要被初步成功所迷惑。私运本身的困难逐渐才会显示出来并且还要不断增加。

您所说的议员和一般党领导人对于保护关税的态度，完全证实了我信里的话。已经够糟糕的是，党自夸胜过资产阶级，而在这第一个经济考验上却同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分裂，同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不懂事，他们却至少还可为他们悲惨的崩溃辩护说，这里同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相矛盾。更糟糕的是，人们把这分裂暴露出来，行动既无把握而又摇摆不定。万一不能达到一致，那末就只有有一条道路：宣布问题为纯粹资产阶级问题（它本也就是这样），而不参加投票。最糟糕的是，人们竟允许凯泽尔发表他那不幸的发言和在第一次时投票赞成那个法令。在这次表决以后，希尔施才攻击他，并且如果凯泽尔随后在第三次时投票反对这个法令，这并不能把事情给他弄得好些而是会弄得坏些。

代表大会决议作不得借口。如果党在今天还要以代表大会在适意的和平时期所决定的一切旧决议案来约束自己，那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的党所据以活动的法律基础不仅必须是自己制造的，而且必须是随时可以修改的。因为反社会党人法使一切代表大会成为不可能，从而使修改旧的代表大会决议案，都成为不可能，所以也解除了那个决议案的约束力。一个党被弄得不可能作有约束力的决议的时候，它的规章只有在它那活的、经常变换的需要中去寻找。但如果它要使这些需要服从现在已经僵硬和

死亡的以前的決議案，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形式上的。但那个決議的内容才使它失去效用。第一，它同綱領处于矛盾地位，因为它容許批准間接稅。第二，它同党的不可拒絕的策略有矛盾，因为它允許批准向現今的国家納稅。第三，它所說的譯成清楚德語如下：

代表大会承认，对保护关税問題不够了解，不能作出贊成或反对的决定。所以它声明对这問題无权过問，同时它为了亲爱的公众之故仅仅提出几句部分地毫无意义、部分地互相矛盾或同党的綱領相矛盾的陳詞濫調，于是就以擺脫此事为乐。并且这个无权过問的声明本是在太平时期用来拖延当时純粹学院式的問題的，而在如今問題急如星火之战时，难道应当以这个声明約束全党，一直等到通过一个新的、而現在又不可能作出的決議案才算法律上有效地取消它嗎？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希尔施对凱泽尔的攻击在議員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如何，这次攻击反映了凱泽尔的不負責任态度在国外的德籍的以及非德籍的社会民主党人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并且人們毕竟应当了解，不仅要在自己的四境之内，而且要在欧洲和美洲面前保持党的声誉。

因此，我来談一下这个报告。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它对保护关税問題上的辯論的分析多么巧妙，但是在第三部分中的向德国庸人的让步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为什么要这一段完全多余的关于‘內战’的叙述？为什么要逢迎‘輿論’（这在德国总是啤酒店里的庸人的議論）？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階級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何况所有这些让步是完全无用的。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們只尊重那些威吓他們的人。但是那些想取悅于他們的人，他們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們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說，毫不尊重。現在，在

庸人們的憤怒的‘風暴’，即所謂輿論，顯然又已經平息下去，而捐稅的重担卻又直接壓在這些人的身上的時候，為什麼還要說這些甜言蜜語呢？我真希望您能知道這件事在國外產生了什麼樣的印象！黨的機關報由站在黨的中心的中心並進行着鬥爭的人來編輯，這當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國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對黨員在議會中向庸人表示的這種完全不必要的謙卑，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敗以後襲擊法國社會黨人的狂風暴雨，完全不同於德國諾比林事件後的叫喊。法國人表現得是那麼驕傲和自負啊！您能發現他們這樣軟弱，這樣恭維敵人嗎？當他們不能自由講話時，他們就沉默；他們讓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們知道，他們的時代是會再來的，而這個時代現在已經到來了。 70

您關於赫希柏格所說的那些話，我很願意相信。我完全沒有必要反對他的私人品格。我也認為，他通過社會主義者所受的迫害才明白他內心深處所想的是什麼。我力圖使他明白——可能徒勞——他所想要的是資產階級的，而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當他已經制成為一個綱領以後，我假定他不是力圖也使綱領得到贊揚，那末我對他的信任必然超過了德國庸人的軟弱。那篇文章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後的赫希柏格完全是兩個人。

我現在在第五期《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卻看到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訊，其中奧艾爾以我的信為借口來控訴我（雖未提名，但已充分暗示出來），說我‘播下對最可靠同志的不信任的種子’，就是說，我誹謗了他們（究竟在那裡我會有權利這樣做）。他還不以為滿足，還用我信中根本沒有的既愚蠢而又無耻的東西來造我的謠言。看來，奧艾爾幻想我想向黨要點什麼。但是您知道，不是我向黨，相反地，是黨向我想要點什麼。您和李卜克內西知道，我唯一向黨要求的是，請它不要打擾我，以便我能夠完成我的理論著作。您知道，十六年以來我總是不斷被請求為黨機關報寫稿；並且我也寫了

稿，我应李卜克内西的坚决的預約而写了大批的文章、整本的小册子，如《論住宅問題》和《反杜林論》。至于我为此而从党得到的隆情盛意（例如代表大会为了杜林而进行的愉快討論），我不詳述。您同样知道，在党存在的期間，馬克思和我自願地对国外敌人捍卫了党，我們为此对党只有一个要求，即它不要不忠实于自己。

71 但是如果党要求我同它的新机关报合作，則不言而喻，党至少應該照顧到，不要还在談判沒有成功的时候，由这一机关报的一个名义上的共同所有者把我当作誹謗者而加以誹謗。我从沒有见过任何文献上的或其他的荣誉规范与此相合，我相信，就是一个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也不能容忍这个。所以我必須提出質問：第一，对于这种无缘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能如何給我恢复名誉；第二，您怎样保证类似情形不再发生？

此外，我还想就奥艾尔的誹謗指出，我們在这里既沒有过低估計党在德国所必須克服的困难，也沒有过低估計尽管如此还是获得了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至今还保持着的模范行动。当然，在德国获得的每一次胜利，如同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們高兴，甚至使我們更高兴，因为德国党是一开始就依靠我們的理論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緣故，所以我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領導所发表的公开言論要符合总的理論。我們的批判当然会使許多人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們不为当地斗争的紛繁复杂的情况和枝枝节节的事情所影响，他們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論格言原則来衡量党的事件和言論，他們又向党反映这些行动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和党的領導來說，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維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敬礼。

弗·恩格斯。”

这封信中像对奥艾尔的攻击那样的进攻性语气，促使我早在十一月十八日就复信：

“亲爱的恩格斯！

虽然我的工作堆积如山，我所以这样迅速奉复，因为想尽快把您那方面的严重误会加以澄清。您把十月二十三日第五期上的通讯看成针对您的。这是误会。在那一天，奥艾尔，我可向您保证，还没有看到您的信。他是在那天以后才收到您的信的。那篇通讯我一看就知道，奥艾尔显然是指汉斯·莫斯特，而不是其他的人。即使他当时已接到您的信，我仍是这样想法，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阅读信的这个小组里谈不上‘播下对可靠的同志的不信任的种子’。如果奥艾尔把这类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为完全合法的分析（因为它是针对一切参与者的）作为一篇通讯的题材，那他也就太天真了。

72

我希望，这个解释可以使您确信，您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而您由此得出的一切推论也都是不正确的。赫希伯格如果真正作过声明，审查只是为希尔施而设，而对福尔马尔却是多余的，那我就简直不解了。根据我对于这些人的理解，赫希伯格对希尔施必然比对福尔马尔更为同情，因为福尔马尔的整个本质有点暴躁，一点也不随和。而且在当时迫切的时事问题——关税问题上，希尔施远比福尔马尔同赫希伯格接近，因为赫希伯格是个绝对的自由贸易派。

您说，在苏黎世人们企图把希尔施置于审查之下时，我们应该立即加以干涉。关于这，我必须回答说，这在希尔施正式拒绝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此外，我还可以保证，福尔马尔所愤怒的是，人们对当时处境很不安定的他迟迟不给明确的答复，因为尽管希尔施已经表示辞谢，人们仍然劝他接受，并且赫希伯格竟为这个目的去到巴黎。不过今天再把这个继续写下去，是无益的。

63

关于我們对于关税问题的态度，您的意见也不对。正因为我們不能向我們的人发表谈话，所以我們比别的时候要更多考虑到他们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关于凯泽尔，我們未能阻止他那‘不幸的发言’，因为事先我們不能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发言。他确实曾很勤奋地练习了这题目，但他在适当时刻却說不出来，被多次打断发言弄得不知所措。一件倒霉事，别的人也曾遭遇过。事后来說，他若是不发言，我們还更高兴些，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像希尔施在《灯笼》报上那样苛刻对待他。

凯泽尔也并没有在第一讀（正确的說，是第二讀，因为第一讀就是一般性辯論，所以在第一讀时沒有付表决）投票赞成法令，他只投票赞成提高铁的关税和几件别的项目。在第三讀时他也曾投票赞成提高铁的关税，但是最后却反对整个法令。

我确信，如果党能在一八七九年召开代表大会，結果它的決議将完全像两年前那样，而且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个純粹实际的问题中有各种不同的潮流在，單純的否定在选民圈子里难获同情。只要我們还参加議會，我們就不能持單純的否定态度，群众要求，在无损于明天的事的情况下，也要照顾到今天。

我承认，人們在这方面容易做得太过，但究竟准許做到何种程度，这是需要不断地、仔細地按各种情况加以討論的。在一切这些場合，很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像您們这种不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更容易如此，可是群众是人們必須首先照顾到的。

無論如何最近的馬賽代表大会^①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会上对于关税问题所作的決議同我們两年前的几乎字字相同。

現在談一談我們的总结报告。在一开始我就向您承认，这个报告原是可以比它現在更尖銳；但請您不要忘記写报告时所处的

^① 法国工人一八七九年在馬賽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議案，建立工人政党。——譯者

环境和条件。根据我們的出版法人在德国可以逮捕我們，当然，我們現今要避开这个。

我們原可以完全不要論革命的一章，只是面对着莫斯特那繼續不断的控訴和誣蔑（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講話，他就能够迷惑許多人），这样一个說明是必要的。我也不相信，由有关的一章中能够看出对啤酒店里的庸人让步，我們并不那么天真。我們原已把我們用‘輿論’字样的意义說得很够清楚了。当然，我們同时也提到小市民和农民在內，他們近几年来有大批的人追隨我們，并且在最近选举中在許多地区拯救了党的荣誉，因为雇佣工人一方面受厂主的压迫和追逼，另一方面又遭到經濟危机，常常不走近投票柜，而且有时即使心怀憤怒，而仍同意投票反对我們。 74

我不是爱好卑躬屈节的人，我近边的其他人也不是这样的人；当初我若认为，我們敌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会从我們的总结报告里看出絲毫像感伤或者退让的东西，那我也就不会署名了。您們在那里对这里的情形不能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您們用完全另一种标准加以衡量并批評在德国国内无人想要批評的东西。我們的敌人不誤会我們，我們也不誤会他們。我們生存着而且不让人把我們弄死，这使他們絕望，他們完全不了解，人們沒有高級官厅的許可而竟能生存下去。但正因为我們被禁止公开講話，相反地，我們的敌人却有无限的发言权，所以我們在講話时，就尽量小心，以免使他們得到有效的进攻机会。

这是个我认为对于我們絕對无损而益处却很多的策略。我再說一遍，我們的敌人并不誤会我們的策略，这表现在安然让人對我們做出极难置信的蛮橫行为，但是我們却使其不能繼續追逼，而在現今情况之下，这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您們的批評我們总是乐于接受的，并且也希望您們在報紙上（只要不以侮辱的方式）无拘束地实行批評。我們承认，正是現在

更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因為相屬性和一致性的感覺往常所通過的千百條管道現在都被堵塞了。總之，我覺得可以這樣說，我們了解您的立場遠勝於您們了解我們的立場，由此可見，哪方面比較困難。

75 我希望，十二月十日馬格德堡的選舉又是個小小的興奮劑。也許我們作一次新選舉以替換白拉克（他認為他不能繼續合作）。我們想把這個選舉延緩到一八八〇年

漢斯在我寫給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的信里作了几處歪曲原意的改動，我想他是故意的。

謹向您和馬克思致以
敬礼

您的奧·倍倍爾。”

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對上面這封信就寫了回信：

“親愛的倍倍爾！

當我認為奧艾爾暗示着我的時候，我有充分的理由。日期不能證明什麼。他顯然不是指莫斯特的。那麼您問一問他自己，他指的是誰，然後我們看看他說什麼。我確信誤會不在我這方面。

赫希柏格確實作了所提到的聲明。

在同希爾施協商時您多半不在場，這我知道，並且我也不想要您對這件事情負責。

關於關稅問題，您的信恰好證實了我的話。如果說意見是多種多樣的（當時情形確是如此），那末，人們如果照顧到這多種多樣的意見，人們就恰恰必須放棄投票，否則那只是照顧到了一部分人。但是為什麼保護關稅部分比自由貿易部分更值得照顧，這却令人不解。您說，您不能在議會方面抱純粹的否定態度。但是當您們大家終於投票反對法令時，您畢竟持着純粹的否定態度。我

只是說，人們在一開始就本該知道要抱什麼態度，他的行動就本該同最後表決相一致。

能使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不抱純粹否定態度的問題，是非常有限的。這一切都直接觸及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問題；工廠立法、標準工作日、僱主責任、用貨物支付工資等。此外至多還有些純粹資產階級意義的形成真實進步的改良；幣制統一、衡制統一、遷徙自由、擴大個人自由等。人們大概將暫時不用這些來麻煩您了。在其他一切經濟問題上，如保護關稅、鐵路國有化、保險業等，社會民主黨議員必須經常堅決保持一種觀點，即不同意增強同人民對立的政府權力的東西。但是當黨本身不斷發生意見分歧，從而自然引起弄權、否定，就會更容易加強同人民對立的政府的權力了。

您關於凱澤爾所說的話，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如果說他一般是為保護關稅講話，那他為什麼又投票反對呢？如果他想投票反對它，那他為什麼又為它講話呢？如果說他很努力地研究過這題目，那他怎麼會投票擁護鐵的關稅呢？若是他的研究有一分錢的價值，那他必定知道，德蘭有兩個冶金工廠，多特蒙德聯合工廠和王室與勞拉冶金工廠，它們任何一個就足以供應全國的需要；此外還有許多較小的廠子，所以在這裡，保護關稅是純粹的荒謬東西，這只能有助於占領國外市場，所以要麼是絕對的自由貿易或者是破產。鐵廠廠主只有這樣才會希望保護關稅，如果他們結合成一個集團，一個陰謀團體，它給國內市場強行定出壟斷價格，而把剩餘產品在國外廉價傾銷，就像目前已實行的那樣。凱澤爾就是為這個集團，為這個壟斷資本陰謀團體的利益講了話，並且就他投票贊成鐵的關稅而言，他也為這個集團，為這個壟斷資本陰謀團體的利益投了票，多特蒙德聯合工廠的漢塞曼和王室與勞拉冶金工廠的布萊希羅德會暗笑這個還努力地研究過這题目的愚蠢的社會民主黨人。

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获得鲁道尔夫·梅耶尔的《德国的政治投机家》。不知道这本书里所列举的近年来的欺詐、破产和政治行贿的知識，就不可能判断现在德国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宝库那时候竟没有为我们的报纸所充分利用？这本书自然是被禁的。

77 总结报告中我所指的主要是这几处：第一，把赢得舆论看得那么非常重要的一处——谁若是使这个因素反对自己，谁就会陷于瘫痪——，一个生存问题是，‘要化仇恨为同情（同情！那些刚才在恐慌时候显得像坏蛋的人们的同情！）’等。用不着费那么大力，尤其因为恐慌早已成过去了。第二，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那末也反对它自己必须进行的和无论如何要进行的战争）并以全人类普遍结为兄弟为目的（按字面说，每个党都是如此，按实际说，没有一个党如此，因为我们在资产者愿意继续作资产者的期间，也不愿同他们结为兄弟），不能致力于内战（那末，即使是在内战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不能致力于内战）——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来：一个斥责一切形式的流血的党，既不要血管放血，也不要截断患坏疽症的肢体，也不能致力于科学的活体解剖。为什么提出这样说呢？我不要求讲话要‘激烈有力’，我也不谴责报告，说它说得太少——，相反地却太多了，省略点才好。后面的好得多，幸而汉斯·莫斯特没有注意这两处，他可以从中得到资本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郑重宣布李卜克内西等在萨克森宣誓，这却是个失策。汉斯不会放过这个，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就会继续加以利用。马克思和我认为事情本身并不像，比如说，希尔施在起初心情激动时所感觉的那末危险；您们必须知道，是否‘巴黎值得一个弥撒’像亨利四世为了使法国避免一场三十年战争而成为天主教徒时所说的；是否好处这样大，值得自相矛盾地宣誓，而且这是唯一不能给人惹起伪誓诉讼的誓。但是如果宣了誓，就

必須保持緘默，等到別人嚷起來，然後有充分時間來辯護。如果沒有《社會民主黨人報》，漢斯就連一個字也不會知道。

您給著名的酒鬼和笨蛋的打擊，使我們高興得很。我們將負責把這向巴黎繼續傳播，只是法國文字怎樣才能翻譯出上述的豪邁字句，頗費躊躇。 78

此外，我們沒有忽視我們在這裡，如人們所說，好說話，並且我們的地位要比我們的困難得多。

小市民和農民的參加固然是運動突飛猛進的標志，但是如果人們忘記了，這些人是不得不來的，而且他們只因不得不來才來，那就對運動有危險。他們的參加是無產階級確實已成為領導階級的一個證明。但是因為他們是帶着小市民和農民的觀念和願望而來的，所以人們就不可忘記，如果對這些觀念和願望讓步的話，無產階級就起不了它那領導的歷史作用。

親切地致候。

您的弗·恩格斯。”

我對這封信的回信是：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奧艾爾昨天來信說，他那個通訊是指莫斯特和艾爾哈特。那末您瞧，我是對的。

附件是赫希柏格不久以前寄來的。其內容請您注意。對於保護關稅問題以及與它有關的東西，我不再談了，我看，這事我們在信上是得不到一致的。

我來談一下宣誓的事。關於這事，希爾施最近寫了一封非常憤怒的信並且懇求李卜克內西不要受‘腐敗的萊比錫環境’的影響。我不知道，希爾施意中何所指，但是我可以斷言，不需要萊比錫方面任何壓力來使李卜克內西做他迄今所做的事情。特別是對

宣誓問題，我站在另一立場。我的看法也是要宣誓，因為人們若不願舉行宣誓，那末就根本用不着選舉；但是我想，在舉行宣誓之前要說明，宣誓只被看成一種必須舉行的儀式，因為沒有這種儀式就不可能進入議會，也就不可能執行委任。宣誓並不能攪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和主義的觀點。李卜克內西反對這種觀點。我却由於顯而易見的理由不願再繼續和他爭吵。我同樣認為，如果我們的人在那議會中也像我們在國會中所一貫保持的那樣，一切親密交際（慶祝會、會長宴會、議會酒會等）概不參加，那就會好些。現在每次發生這類事，就給某些報紙提供惡意報導的材料，並且因為我們不能開口，這樣的新聞還有助於在我們自己人的隊伍里製造不愉快的爭論。在事態像這裡這樣簡單的地方，就應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分歧的事情。李卜克內西過於感情用事；誰要是對他客氣，誰就要求什麼都可以，薩克森邦議會在和藹可親方面很有修養。此外，我希望，關於這件事情您不要給他寫信，危險對他是沒有的，他惹起的只是些他能容易避免的各種小小不愉快。

馬格德堡選舉是又一次小興奮劑，並且將大大地激怒我們的敵人。在復選時我們多得二千到三千張票，一方面因為我們爭取到新因素投入戰鬥，另一方面，這時有一大部分曾投票贊成進步黨候選人的工人和小市民，現在跟着我們走了。

可惜我們在新年後的幾個月又要選舉了。白拉克因病不能再保持他的委任，將在年底把它辭去。奧艾爾將代替他參加競選，這是區受托人的決定。

敬禮和握手。

您的奧·倍倍爾。”

恩格斯却不認輸，他復信如下：

“倫敦，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親愛的倍倍爾！

我不了解，奥艾尔怎么能說是指莫斯特等而言，因为他在文中还那么清楚地把他除外。不过这我就不提了。

在第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有一篇《历史的回顾》，这必定是来自三星之一的手笔。其中說：只有与小品文学家如古茨科夫和劳柏^①相比，也就是說，与那些即使曾有政治性质，也早在一八四八年之前已把最后残余葬入坟墓的人相比，社会民主党才是可尊敬的。还有：‘一八四八年的事件必定要来，或者，如果各国政府都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就带着和平的一切幸福而来，或者（因为各国政府不这样做）除暴力革命而外可惜并无其他途径。’

有一种报纸可以合法地哀悼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打开了大門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在这种报纸上是沒有我們的地位的。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星企图把他們在《年鉴》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拿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相媲美。我不理解，在車子已經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錫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件事的。您像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我們是不能这样做的。《年鉴》上的文章斩钉截铁地把我們和他們分开了。只要这些人还认为他們和我們同属于一个党，我們就不能同他們进行談判。这里所談的各点是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甚至连討論都不可能的。在党内討論这些問題，就表示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有問題。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們最好是不要撰稿。如果我們只是提一些抗議，而过几个星期还得公开声明自己退出，这样做也于事无补。

我們很遺憾，正是在这种被压制的时候，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

① 二人都倾向“青年德国”，这是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在德国涌起的一群自由主义革命作家的名称，一八四八年后都倾向反动派。——譯者

們。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們曾經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現在，当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經公开显示出本来面目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們一旦被允許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这对我們來說，就等于这个机关报干脆已經停办了。

81 宣誓事件沒有使我們十分感动。人們也許(如您所想的)能找到一条別的道路把不愉快的外表消除一些，但那沒有很大的关系。所希望的謹言慎行，我們將注意。

馬隆的杂志会发生好的作用，因为第一，馬隆不是惹禍的人，第二，他的同事在法国人中間会設法使事情不离正軌。如果赫希柏格梦想在这里为他那小资产阶级花样弄块基地，那他将会发现，他的錢白化了。

馬格德堡的选举使我們很高兴。德国工人群众的不可动摇性是值得欽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人通訊是那上面唯一的好东西。

赫希柏格的信附此奉还。这个人已不可救药。如果我們不願参加《未来》报那一伙人，这是个人的虛荣心。但是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我們以往和現在都还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并且另有大約三分之一却是臭名远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这竟自称作为一个‘科学’杂志！赫希柏格还认为这杂志起了‘启蒙’作用；这证明他自己的那样特別清楚的头脑，这个头脑直到今日，任凭我的一切努力，还不能領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一切分歧都是‘誤会’。完全同一八四八年民主主义的叫嚣一样。否则却认为是‘过早的結論’。当然如此，因为每个从这些先生的空談中引证一定意义的結論都是过早的。他們不仅要說这些话，而且也要尽可能說相反的话。

可是，世界历史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的，它不会理会这些聪明

而溫和的庸人。在俄國，事情在幾個月內就會發展到決定性的關頭。或者是專制制度崩潰，於是，隨着這個強大的反動堡壘的崩潰，歐洲也會馬上刮起另一種風；或者是爆發歐洲戰爭，而這次戰爭也將把現在的德國黨埋葬在一切民族爭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鬥爭之中。這樣的戰爭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不幸，它可能使運動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黨終究一定會由此建立起來，它在歐洲各國也許會擺脫現在到處都阻礙着運動的各種疑慮和淺見。

致友好的敬禮。

您的弗·恩·”

在這期間，我同福爾馬爾也有書信往來，這些主要是關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我寫給他的信，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親愛的朋友！

現在是整頓發行的時候了；我們到現在只收到第七期，而且都特別晚。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不可能快點寄遞嗎？在柏林到現在還缺第四、六和七期；如果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失去這個最重要的據點。這究竟是發出地點還是收件地點的毛病，我不知道，關於這您們必須研究一下。我這一次等候國會開幕，只是以便進行鼓動……

關於報紙的態度，我建議採取最堅決的筆調；我們的人的情緒越來越左傾。不斷的懲罰和戒嚴的恢復激起了極大的憤怒，他們要求把這種憤怒表達出來。我同樣建議，拋棄法國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我的看法是，對於法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如果能把他們同激進主義者分開，那就再好沒有了。工人黨的獨立性是我們在德國始終以一切決心來維護的，我們也必須把它介紹給法國工人。再說，法國人必定知道得最清楚，他們能從激進主義者期待什麼。我不相信這些激進主義者，他們對公社的態度都是卑鄙無恥的，毫

无例外。

卡尔·希尔施马上利用您在这一点上摇摆不定的态度，在一封写给 L.^① 的信里攻击您。对于这一层，您和我们都不重视，因为希尔施现在决不是个适当的公正无私的评论者。但是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大多数同志站在他那方面，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我们的任务必须是，尽我们的影响所能及的范围，使法国人越来越向左倾，借使他们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组织……

我再请求您一次，发行部要把全付注意力放在迅速送报纸到德国各地这个工作方面。

83 向您和所有的同志致以
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一月五日。

亲爱的朋友！

今天哈森克莱维尔和 V.^② 为一方，我为另一方，发生了关于最近一期的热烈争辩。觉得它是过于猛烈，它比《自由》报还有过之，并且会连累到我们，它会引起像在汉诺威那样的诉讼。

我不能否认，在诗里亦如在文章里，有几处很可以把叛国罪加在一个被查获的报纸推销员头上。此外，《我们的节日》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是可以用来在国会里反对我们的。无论如何，您已表现出，如果愿意，您也能仿照汉斯来写作，这就使吹毛求疵的人得到安慰了。

白色的恐怖笼罩着柏林；所有我们的较著名的同志都处在严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

② V. 可能是指菲勒克，但也許是瓦尔特希。倍倍尔在 V. 那里已经写上菲勒克的名字但又把它划去。他在这点上显然不相信他的记忆了。——编者

格監視之下，沒有一個能同另一個相會。柏林暫時完全被封鎖了。傳聞要大大增強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想加進去一條，作為可以在任何未宣布戒嚴的地區把危險人物驅逐出去的根據。

如果這個傳說得到證實，計劃得到通過，那麼就會發生大規模的驅逐，首先這裡就是最合式的地方。請您暫時什麼也不要發表，此外，個人的計劃很快就會獲得實現的。總之，我勸告您，一切能使敵人驚疑的消息，應盡量避免；在目前把我們弄成比實際更有危險性是不好的。

您的奧·倍·”

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為福爾馬爾和恩格斯之間的分歧又給恩格斯寫信說：

“親愛的恩格斯！

這裡附上的文件是福爾馬爾前些時按照您的最近一封信和印刷品寄到我這裡來的，他曾著重要求我把它轉給您，我就照辦了。

我不再同您為了以往發生的事件打筆墨官司；我這樣擔負過重的工作，不想使我這絕不好的心境再為無結果的爭辯搞得更壞。我還為了別的事情感到頭昏；嚴重而持久的經濟危機使我們在物質方面極端困難，再加上許多被驅逐的人的要求只管增加，由於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有大批的人被拋在街頭，他們不知道作什麼來謀生。我成了一切控訴和請求所薈萃的中心點，您可以想像，我會逐漸發生什麼樣的情緒……

一切所說的和所寫的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的話，除開哈森克萊維爾事件沒有使我們頭痛外，都是廢話。一個分歧有時發生在兩人之間並且偶爾傳揚出去，就被敵方報紙誇張為分裂和解體的徵候，人們越被迫設法掩蓋對黨的長時期的活動的不滿，敵人就越大聲歡呼。因此，對於您們在德國報紙上遇到的一切有關這方面的事，要以最大的懷疑態度加以考查。

向您和馬克思致以
敬礼。

您的奧·倍倍尔。”

这封信开始所說的文件是福尔馬尔的解释，他在文中因为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編輯部的攻击給自己作了辯护。这封信有了实际效果，恩格斯寄給我一张十英鎊的支票交金庫。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 和紅色邮政局长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干练的发行部經理至少也与一个干练的編輯同样必要。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能管理运报纸到德意志帝国这个非常困难的运输事务和在国内推銷的組織事务，那末，就是最好的报纸对我们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他虽有不可避免的错误，却从不气馁也从不惊惶失措，而是愉快地总找到新的途径和方法来蒙混边界上那末多的看守人，报纸再好有什么用？因为报纸刚一出版，德国警察就通过他們派在苏黎世的、或者在那里用大价钱設法收买的間諜，尽最大力量来追踪正在运送大批报纸的秘密道路。并且动員了沿德意志—瑞士边界的边境看守人补瑞士的警探的不足，他們最大的野心是截获一批递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自今以后在推銷报纸的經理与德意志警察和边防軍之間所进行的十年斗争，是曾发生的这类斗争中最有趣的。它最大限度地要求攻取势者一方坚毅、謹慎、巧妙和精細，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胜利完成，于是逐渐在瑞士边境的这边和那边有相当多的又勇敢又机智的同志同苏黎世的經理机构手携手地从事这共同事业。但是

要物色这些同志并相应地加以训练，却不是件简易工作。这事还是成功了。这些同志中不仅有来自平民的，而且有在铁路上工作的，竟有做警察工作的，在运送禁物时他们加以协助。属于警察的有君士坦兹的巡警长 B.，他给我们许多帮助。例如有一天，他奉卡尔斯卢合的检察官费塞尔之命逮捕一个被追踪的同志，而这同志就是他头一天夜里让在他的住处住宿并协助其逃跑的那个人。B. 后来离职了，住在瑞士当富翁。他的财产是他在温特图尔开始做鞋生意赚来的。在德国同志中，特别是阿道夫·格克和他的兄弟卡尔，此外在欧芬堡有奥登里特和豪埃森同志，在君士坦兹有商人安诺尔德，在巴登的夫顿堡有 Fr. 豪格和在阿尔萨斯的米尔好森市的他的兄弟雅科布·豪格，在维尔根和贝西格海姆有鲁茨弟兄，在巴塞尔有古特曼和许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担任或介绍走私的工作。后来，尤其是当《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八八年夏季起在伦敦出版，汉堡成为报纸的入口，推销工作主要是威廉·石罗德和施坦因法特主持。

86

许多推销人部分地由于他的活动屡次受到监禁处罚。例如，阿道夫·格克被监禁十一个月，他的兄弟卡尔七个月，奥登里特四个月，豪埃森三个月等等。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堆存地点和运送机会有时十分奇特。报纸曾长时间存放在维尔根一个教堂的讲坛梯子下面。《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莱比锡地区的推销者克莱曼同志，在他被逐出莱比锡之前，一直把报纸保存在他充当市剧院包厢看门人时所使用的柜子里。当德皇威廉二世有一次由英国旅行归来时，他没有料到，在他乘的船舱里装有大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下级官吏和国营企业的工人阶层一旦为一个与政府敌对的政党所收揽，政府就对付不了这个政党；政府原是靠这些阶层的服役而存在的。于是政府的基础就动摇了。

当《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时，烏萊同志充当发行人，他显然是个干练的、精明的鼓动者。但不久即表现出，他不适合居这个职位，他缺乏商业才能。可是在他担任这职位的短时期，仍旧有个很有价值的收获。他收攬了鞋匠 J. 貝里同志（一个巴登的农民之子，侨居在君士坦茲附近的交界处克路茲林根），就有了一个出色的走私工作的組織人。J. 貝里把他扮演这一角色的經驗写了一本小书，名叫《紅色战地邮政及其他》，他在书中有趣地描写那些与他的活动有关联的冒险故事。烏萊的不能胜任，促使我写信給莫特勒，問他是否乐意担任这职务，但是莫特勒回答說，他非不得已不願离开德国。过一个时期以后，福尔馬尔和我又写信請他，他当时住在慕尼黑附近的尼姆芬堡，这一次他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从此我們給适当的位置找到了适当的人。

87 莫特勒作为一个商人曾在毛織工厂实习，但是他为了彻底学会业务，也曾在厂內做了較长时间的工人。所以他可以說是行伍出身。但是莫特勒却不仅是商人，而且是个具有詩人和艺术家天才的人。他是一个天資聰穎的人，一个諧趣橫生的愉快伙伴。每当萊比錫博覽会临近，他代表他所創設的克里密朝市紡織合作社来到萊比錫时，我們的妻子总是很欢喜。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幻想占着重要地位。他对世界的看法总是和我們不同，但是听他讲述，仍令人喜悅。他也是一个好演說家，能使听众不禁得到燦爛的印象。他所以特別适于担任这个新职务，是因为他有魄力和机智。他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力，有高度的牺牲精神，認真負責和可靠。他在報紙的包装方面發揮了特别的技巧，有时当信件寄，有时打包裹。誰出現在“奥林波”（这是苏黎世同志对莫特勒住处的称呼，这地方同发行部有联系，外人不能到），誰就必須在发行的那天也来工作。由于住址或地点更动、信件被扣、收件人的叛变或被監視，致使通信地址經常改变，因而引起許多工作并需要大加小心。

但是若有哪个要往德国去的同志来到“奥林波”，这个同志就必须忍受一种特殊的处理。“红色邮政局长”（这是同志们不久就给莫特勒的称呼）于是命令把这位同志脱得只剩汗衫衬裤，然后用信件把身体及四肢艺术地以多种多样形式包裹和衬垫起来。这办法总以参加者大笑为结束，然后他可以去搭车，到边界那边去把额外的负担卸在可靠人的手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次这样装备起来的同志被边界那面的守门犬抓到过。

相反地，总是由于自己人的拙笨和轻信，整批运货曾多次在边界上或在内地被抄去。每次这样消息传来，红色邮政局长也大发雷霆。那时助手贝里必须出动，另覓新路线或选任新的、善于搞报纸和著作走私的走私人员。

这里如果不提到莫特勒的妻子一下，我的记载就会有漏洞。他俩原籍在同一城市，符腾堡的艾斯林根。青春的爱慕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莫特勒夫人忠实地辅助她的丈夫。谁对她的尤利乌斯作不利的评语，谁就吃苦头。莫特勒在苏黎世狼溪上游的住宅，是这样选择出来的，他由住宅远望当时还没有建筑起来的周围地方，至感便利。因此，特别是柏林警察局经常派到苏黎世的许多警探不能乘人不备地溜到住宅跟前。如果有陌生人来到“奥林波”，请求入内，“阿姨”（莫特勒夫人由于天性好客，我们戏称她为“阿姨”）就亲自迎到门口，问他来意，同时她用最锐利的眼光把来客由头顶到脚趾打量一番。他经过对他提出的审查，而后才被允许进入圣地——发行部。如果是这一对夫妇的亲信，则被邀入至圣地——一间布置舒适的住宅。

但是，虽然有一切的预防措施和一切有充分理由的怀疑，却仍然发生过一回事，一个后来被揭穿是危险的警探和秘密诱捕者的人竟进了莫特勒的住宅，这人是前巴登炮兵上尉冯·艾伦贝克及其妻。但是我们一对这位先生发生怀疑，他和他那确是无辜的妻

子就必須退出。

我以后還要談到艾倫堡。

89 这里还可以略述一下我們苏黎世朋友的一些私人活动。苏黎世漸漸成为干练力量的一个完整參謀部。除伯恩施坦、莫特勒、福尔馬尔之外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两个排字工人理查·費雪尔和陶舍尔，莫特勒的助手德罗席，卡尔·考茨基和后来的亨利希·施吕特尔，再就是苏黎世的同志裁縫貝克和釘书工人卡尔·曼茨（在柏林的《自由报》被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摧殘之前，他曾在柏林充任該报最后的負責編輯），还有別人。一八八三年年底，当施吕特尔被逐出德累斯頓以后并且在斯图加特不能得到使他滿意的生活的时候，由于我的建議，我們邀他到苏黎世組織刊物的銷售。党的档案整理工作也归他来做，关于档案的創設我早在萊比錫的《前进报》，此后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倡議过。裁縫貝克，一个快乐的伙伴，是当时的大学生彼得·卡拉格欧維奇（后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的“宫廷裁縫”。彼得·卡拉格欧維奇常同我党同志往来，有时也參加摩尔俱乐部的欢乐座談会，他当时是个經常发生金錢恐慌的穷鬼。为了稍微解救他的恐慌，他促使裁縫貝克把他的眼上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于是彼得的眼一由其家属支付，彼得就可以由貝克那里取得超出部分。国王彼得在巴尔干战争期間对《新苏黎世报》的一个采訪記者承認說，他的青年时代在苏黎世过得多么美好，《新苏黎世报》当时为人民福利和人民幸福做的計劃多么高超。但梦幻总是要破滅的。在巴尔干还有许多政治家和高級官員在年輕时候在苏黎世成为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并且拥护国际。但不应当因此責备他們。我对他們比对任何普魯士的容克子孙（其中有几个出自老贵族）都更加敬重，这些容克子孙当年也是在苏黎世讀書，但是他們回家时仍同往苏黎世去时一样愚昧。

在苏黎世有时日子过得非常愉快，虽则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們也不是黯然寡欢。国内丑事和暴行的消息經常由多方面传到苏黎世，再加上被逐和亡命到苏黎世来的人的叙述补充，固然增高了我們的同志对于这些情况的憤慨（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上可以觉察到），但也仍有时刻，人們感到自己与其說是党人，不如說是人而纵情欢乐。照例在摩尔俱乐部（这是紀念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前在柏林成立的同名組織，自称是我党同志的联合会），如果我們来到苏黎世（这每年总有許多次），那就特别熱鬧。于是人們特别虔誠地唱起著名的《齐希^①市长歌》，他在四十年代行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結局相当奇怪。爱德华·伯恩施坦于是領唱，合唱团唱重叠句。继这个歌之后唱同样著名的《煤油歌》和类似的諷刺德国情况的歌曲。或者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当时他們二人是不可分离的）来个二部合唱，能使頑石軟化、肝腸寸断。或者作些其他无聊事，使我們笑个不停。在摩尔俱乐部的底层开会的房子里，著名的苏黎世詩人哥特弗利德·愷勒尔住过一个短时期。有一天夜晚，保尔·海塞来拜訪他，底层的吵鬧特别厉害。海塞問愷勒尔，是誰在吵鬧，愷勒尔用苏黎世方言回答說，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海塞以滑稽的激昂声調朗诵：“在門檻下面那里地獄在沸騰。”但是这些和善的喧嘩者，在把一个被揭露的間諜狠狠地挨一頓或者給他指出，“巴特罗从哪里取得果汁^②”的时候也会成为非常不和善的。例如，对薩克森間諜施米特就是这样，据悉，施米特是一个下流罪犯，德累斯頓警察局用国家的錢資助他。在被揭露后施米特回到德累斯頓时，被依法起訴，并被判处五年監禁。

① 亨利希·路德維希·齐希（一七八九——一八四四年），民主派，曾任斯托科夫市长，一八四四年謀刺威廉四世未成，被处死刑。——譯者

② 意指掌握了詳細情况。——譯者

莫特勒一到苏黎世就职，我們之間就展开了活跃的通信。这些信件虽然内容有趣，我却只能轉录极小一部分，否則我这著作篇幅就太大了。轉录我同馬克思、恩格斯、福尔馬尔和其他人的通信时，也必須采取同样的审慎态度。由于莫特勒的参加管理，《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大改观。事业有了推动力，并且讀者人数增长很快。一八七九年年底，即成立后三个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銷路已达三千六百份，考虑到私运到德国去那种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意外的大成就。并且銷路越来越大，但是走私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边防军增加了两倍以至三倍。所以几年以后，就发生这問題，是否适宜把大部分的出版物在德国秘密印制。現在被禁著作的印制发生更加迫切的同样問題，这些著作的銷路也是不断增加。这时迪茨和格利伦貝格同志都来帮助苏黎世的人們出主意和参与共事，他們想用这为党立下大功。字模以絕妙的方法私运到德国。报纸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印成，有时如果环境許可，就較久在一个地方印。警察不久就觉察到了，也許边境官吏一时所抓到的寄件报纸越来越少，就通知警察說，报纸必定主要是在德国印刷了。警察于是尽全付力量来寻找秘密印刷的地方。但是徒劳。只要不是做得拙笨，警察的智能是发现不了的。这里沒有叛徒，凡参与印制这些书报的同志都是第一流人物，他們的保密和熟练都是可靠的。在整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間，警察沒有能够发现一次印制禁品的場所。例如，格利伦貝格以簡直聞所未聞的胆量长期印《社会民主党人报》。紐伦堡的警察猜想，《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沃尔兰公司——柯尔伦貝尔格的公司印刷的。警察不分日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搜查，然而始終沒有結果。

迪茨同志也担了很大风险把我的书《妇女与社会主义》秘密地印了許多版。这是一本内容广泛的著作，早已需要印制，而且被发现的危險也一天大似一天。我了解他的处境，当他有一天写信給

我說：他所從事的事情却是件危險得要命的事。斯圖加特的檢察官，大約是聽到傳說，也為了印制禁書這件事曾對他進行預審。但是戀愛的辛苦白費了。^①

這樣，我們大部分人的頭上懸着達摩克利斯的利劍^②。這個人由於這個原因，另一個人由於另一原因處於危險之中。並且，我們之間如果發生分歧，這種危險把我們又團結在一起；由於秉性和理解的不同，這種分歧是很自然的，而且因為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意見，就更容易發生分歧。只要一個黨存在，已往、現在和將來都是這樣。但是面對着共同的敵人，我們任何時候都是團結起來嚴陣以待，而且這個陣營一天比一天強大。

① 關於這事件迪茨同志寫道：

倍倍爾打算把他的書《婦女和社會主義》的完全新修訂版在德國印制。出版社名稱應該是一個瑞士商號。決定在德國印制的版本仍留在內地，從而比在國外印制必須私運越境的容易推銷。倍倍爾和我意見一致，把這著作在斯圖加特印書館印制。蘇黎世期刊出版社（J. 沙柏里茨）聲明，它的商號名稱可以印在著作上並且擔任國外銷售事宜。原書名改為，《婦女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出版後約半年有人向官方告密說，這著作是我印制的。進行了一次搜查，在印刷所中沒有發現這本書，相反，可靠地確定了，根據出版法，這本書現在已失時效（六個月），那麼迫害也就不能再來了。這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個余波，後來馮·普特卡美爾先生在國會下次開會時為政府所提出的法令草案作辯護，根據這草案，違反出版法的時效期限將由半年提高為三年。但國會立即加以拒絕。馮·普特卡美爾先生在他的文件下面還放有一本倍倍爾的書，這書當時用的是《一八八三年工廠監督報告書》的黃色包皮，銷路很廣。

根據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而宣布的禁令原文如下：《婦女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奧古斯特·倍倍爾著。期刊出版社（J. 沙柏里茨）出版，蘇黎世一八八三年。柏林王室警察總監。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禁令包括用印有題名，《一八八三年工廠監督報告書》的封面紙包着來推銷的版本在內。柏林王室警察總監。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七九年的第一版已經是用封面紙包皮發行的，上面印着“恩格爾，統計學，第五冊”。

② 達摩克利斯是西西里暴君的侍臣。暴君為使他知道幸福無常，一方面享以盛宴，同時在他頭頂上空懸挂一把利劍。——譯者

一八七九年的国会會議

这次会期非常长；它在二月十二日开始，七月十二日結束。討論的主題是新关稅率，它引起德国貿易政策由溫和的自由貿易轉为保护关稅的轉变。同时这次會議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俾斯麦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直接稅与間接稅的演讲所宣布的捐稅理想，在演讲中他着重反对直接稅，并且主张对“大众的奢侈品”（他指明为啤酒、烧酒、糖、咖啡、烟叶和煤油），尽量科以高额間接稅。对很富有的人只当作体面稅来征收一种不高的直接稅。

关稅政策的轉变是两种情况导致的。巨大的工业危机現在已延續到第六年，并且是国际性的，它为国内工业帶來了一个激烈的国外竞争。特别是鋼铁工业家高喊一八七七年一月所决定的提高铁的关稅。他們不仅要求保持铁的关稅而且还要把它提高。棉紡織工业家也感到英国竞争的威胁，与鋼铁工业家合作。其他部門的工业家也感到外国竞争的压迫，同他們联合起来。但是工业家如果没有地主党人来协助，他們不会单独贯彻他們的計劃。不久以前，地主党人曾是自由貿易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們把小麦和牲畜主要銷售到英国去，同时他們在国内和国外都取得了高价。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粮食竞争却忽然惹人注目。凭借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批大批的粮食在英国市場上出現，以廉价排挤德国的粮食。还不止于此，美国粮食也出现在德国市場上并且有助于压低当时很高的粮价。现在地主的观点来了个迅速的轉变，一夜工夫，他們成了与以前他們作自由貿易派时一样热烈的保护关稅派。因此，地主党人和工业家之間有了一致行动的接触点。在他們二者之間成立了巨大联盟，取得新稅率，就保证了他們的同盟。

国会的休息室当时等于一个暴利交易室。各式各样工业部门的代表和地主党人成百地聚集在国会休息室和党团室。在那里达成了协议，随后由全体委员大会批准。这种买卖生意所以能轻而易举地以广大群众为牺牲品，是因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民主党不能作反对新关税政策的鼓动。并且国会多数派也是厚颜无耻，运用警察在国内对集会所习用的策略，在国会中有系统地封闭我们的发言人的嘴。这样，我在关于粮食关税的发言中被打断两次，许多其他我党同志（例如凯泽尔和瓦尔特希）在税率的其余项目的发言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还不够。在第一次讨论有关柏林宣布小戒严的总结报告时，在李卜克内西和继他之后的部长欧伦堡伯爵讲话以后就结束辩论，由此剥夺了哈赛尔曼（一个被逐出柏林的人）的发言权。可注意的是，显然在同意后没有一个资产阶级议员要求发言。

二月二十六日，讨论冯·海尔特林先生为扩充雇主责任法向政府所提的质询。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发言。我的改革建议如下：
1. 召集工商业视察员会议，由他们那方面作出改革建议；
2. 征询国家高等商业法庭——后来的最高法院——关于雇主责任法的经验；
3. 根据第一条扩充雇主责任法在伤亡事故情况下的赔偿义务；
4. 扩充赔偿义务保险的范围，包括工业、商业、交通和农业中的一切工人；
5. 在伤亡事故发生时，企业主有责任提出证据，证明该项事故不能归咎于不可克服的情况；
6. 设立国家伤亡事故保险局，由国家管理，代替私人的赔偿义务的保险。企业主的保险费应与税款同时征收，这可使管理费用少花一些。

特别聒人听闻的是在这次会期中所提出的对国会议员的惩罚权的法律草案。俾斯麦并不以得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满足了他的迫害狂；他还想使国会中每个难操纵的反对派窒息而死。这个法律草案显然主要针对着社会民主党发言人，不过，它的规定随时

也可用以对付不受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发言人。为了实施对国会議員的惩罚权，設置一个委员会，由三个議長和推选出来的十个国会議員組成。这个委员会可根据不正当行为的輕重对发言人作出下列的决定：1. 当着全院譴責；2. 有义务遵照委员会所規定的形式当着全院道歉或撤回发言；3. 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出席国会，酌情可延至本届委任終了时。国会議長也应有权暂时不把議員的不正当的讲话列入速記的报告內。受制裁者对此有权向委员会提起控訴。

这个法律草案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东西，只有像俾斯麦那样天性强暴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在国会中，这个草案被戏呼为“口罩法”。一家英国大报声明說，这种法律草案只有在德国才可能。并且提这样草案的人正是議會的一切发言人中一个永无止境地用侮辱口气攻击反对派的发言人和政党的人。如果有一个发言人在一个集会上或者一个作者在一篇文章里触犯了他，他立刻就跑到审判官那里并且提出数以千計的印就的刑事訴訟。

96 党团方面又决定我为发言人。三月五日，在我的发言中对首相毫不宽恕。国会未經委员会討論就駁回了这种友好的請人作道义上自杀的邀請——法律草案不会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七月七日的會議上，我提議一个決議，企图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在德国的監獄、审讯拘留所和公开的劳役所中实行禁止制造烟草。提案被否決了。

很早以来，議長馮·傅尔肯貝克先生的事务管理就在我們中間引起了巨大的不滿，这个人是有自国会以来最不公平的議長。現在当大半的发言人在整天辯論中屢次攻击我的时候，議長連一次也沒有让我答辯，这使我忍无可忍。七月十一日的會議上，我作关于議事規程的发言，大力控訴對我們所慣用的蛮橫手段。后来有个机会，我們建議恢复发言人名单制，名单制是在几年前取消

的，其理由是发言人的排列次序只是偶然的事情，应该把这留给议长来处理，哪个发言人首先使他觉察到，他就让哪个人发言。这次温德荷斯特也站在我们这方面。他也不得不确认，发言次序的处理具有蛮横的性质。

一八七九年的会议期间，国会也从事于讨论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的建议，他要求国会准许给议员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刑事处分，因为他们虽然因柏林的小戒严被驱逐出境而仍到国会开会，所以是违反禁令。但是俾斯麦的这个高材生（他最顺从俾斯麦的意志），这次却为这个大胆的要求栽了斤斗。国会一致拒绝了台森多尔夫的建议，并给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八条一个解释，解释说，此条不能用来对待被逐出柏林而服从国会开会召唤的议员。但是台森多尔夫在柏林市法院对这两个议员仍提起控诉，说看见他们在七月九日夜里在理希特菲尔德，因而是违反禁令。法院宣布二人无罪，因为他们并没有被从也宣布小戒严的台尔托夫驱逐出境。 97

原来那天夜里我们（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连同相当数量的柏林受托人）在当时建筑物还不多的理希特菲尔德的东部开秘密会议，来审判对党和党团有不利行为的哈赛尔曼。一时大雨如注。我们站在最密的丛林中，暴雨打在伞上，我们的讲话几乎难以听清。哈赛尔曼觉得自己完全孤立，于是让步，并且尽量承诺一切，后来又都失信。夜里两点钟，我们都是全身透湿地回柏林，到公路旁旅店投宿时，碰上了我们的柏林秘密警察，他们显然在追踪我们。他们现在告发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台森多尔夫遂据此提起控诉。

一宗失去的遗产

一八七九年春季，在莱比锡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美籍德国人，

一八四八年的老战士，名叫林格瑞，他通知我們說，他在日內瓦同让·菲力普·貝克尔約好，留在那里一份遺囑，遺囑里指定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为继承者。他指定李卜克内西、盖布、白拉克和我为遺囑执行人。因为林格瑞，五十岁，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显然是非常健康的，决沒有人会想到，我們能在短期內继承他的财产。可是他在秋季返回美国时，一登陆就中风逝世。我由夫頓塔格的帮助办好了必要的证件，并与紐約附近霍包肯市的我党同志左尔格取得联系，以便尽快拿到落在我們手里的一份财富。这事关系到約一万二千美元，这在我們的困难中很有用处。我于是写給左尔格同志下面一封信，同时这信也是我們情况的报告书：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

前不久約·菲力普^①所要求的全权委托书希望您已拿到手，我們只盼望一切順利，如意进行，并且到年終我們真正能完全办好。往这里汇款时要特別謹慎从事，不要把錢落到我們的好朋友——敌人的手里。所以您不宜把錢直接汇給我們哪一个，而汇到一个不会有危險的地方，关于这，我們建議汇到律师夫頓塔格那里。您最好把全数开一张支票，写一家德国銀行，最好是萊比錫的銀行的抬头，这样一来，这个行动就沒有更多的人注目和知曉。这款一付出，我們就召集遺囑执行人开会，以便按照立遺囑人的意思来支配这笔錢。对于我們在德国的人，这錢来得再适时沒有了。可怕的危机在今冬所达到的程度和所造成的灾难几乎是我們从来所未有，这自然對我們的人的捐獻能力起了不利作用，在道德方面也起了败坏作用，这种先失业而后无限期流浪街头的危險，使最有勇气的人也极端謹慎起来，許多人极不願冒这种危險。在今天，因

① 貝克尔。——編者

为到处都有人手过多的现象，并且一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正因为未再看到社会民主党公开活动而对它越加害怕，越加憎恨，所以惩罚的危险也就越大。我们所表现的每个生存迹象都在某些人士中引起恐惧，这使我们非常高兴。人们不能了解，我们会还活着，我们哪里来的勇气，还不顾神圣警察而把头抬起来。警察自身也经常是在恐惧和烦恼中讨生活，因为我们不顾一切的监视和侦察仍举行秘密会议，阅读犯禁的书报，警察于是在许多地方竭力防范这种情况，他们用的方法您在那里是想不到的。相反，我们这方面却把那神圣的海曼达德^①掌握得非常之好，故意把他们的迫害狂引导成可笑的行动。所以在这个可怜的时代也不乏幽默。

最狂暴的是柏林警察局，它对待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好像柏林警察局就是德意志的帝国警察部。在莱比锡和汉堡以及一切较大的非普鲁士城市中，安插了些警察间谍，他们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监视社会党人，另一方面监视当地警察，看他们是否也具有必要的热诚。

近来继续不断的驱逐又使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人发出呼吁书，这里附上几份，或许您那里也能为这帮点忙。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纽约的东西，相反，费拉德尔非亚大体上做得很好，并曾寄来几笔大款。杜埃写信说，莫斯特的鼓动在那里对我们极不利。汉斯为他自己只能勉强维持的企业用钱太多，所以对于其他目的也就没有余力了。

如果您答复此信开头时所谈的事，请寄交律师奥托·夫赖塔格，这里的长官大厦，而不要直接写给我。

敬礼和握手。

您的奥·倍倍尔。”

^① 海曼达德，西班牙语，意指兄弟协会。一四七六年为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所建立并具有很大的特权，在剥夺高级贵族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变成嘲弄警察之词。——译者

100 这些好建議可惜沒有用处。我們的美好希望付之流水。遗产事件的消息由瑞士的报纸发表了，于是俾斯麦侯爵竭尽全力，来夺去我們的财物。伯尔尼的德意志大使必定同瑞士官厅說清楚，在德国沒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已被解散，并且在德国也不再容許有它了。那末在遗嘱上所指的继承者就不存在，遗嘱执行人也无权要求使一个已不存在的政党来继承遗产。瑞士官厅贊成这种理解。我們受了欺騙。我写信給福尔馬尔說，失掉很好一笔錢固然不愉快，但幸而党的强大并不依賴于錢袋的大小。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持續的十二年期間，我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說）在德国最受警察迫害的人。警察有成見，认为我是一个不可不監視的最危險的人。馮·普特卡美尔先生自一八八一年春季起直到一八八八年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的末一天止，任普魯士內务大臣，他承认了这个意見，因为一八八六年在国会的一次社会党人的辯論中，他就称我为“最危險的人”。人們自然不会认为，我处在这种警察保护之下会感到舒服。正相反，我对这种救国措施的憎恨一年大似一年，警察对許多同志以及对我所进行的无数卑鄙和昧良心的行为，堆积如山，也使我对它的蔑視有增无已。我逐漸产生一种心情，就是我最渴望发生一次国内大灾难，使我們能够报复一切由他們那方面施于我們的罪恶。今日回忆当年，我还头上冒火。如果我到柏林参加国会开会，就受到寸步不离的監視，我的社会民主党的同事也是如此。但是在我背后发电报，由这个城市向另一城市打电报，告知我将到和在什么时候可以到，則只有对我如此。这多半是这样办理的：監視我的警察一看到我到車站购买

車票，他就即刻到售票處打聽我買哪里的票。我不仅在所謂鼓動旅行被追蹤，即使我作業務旅行時也對我這樣胡鬧。我後來學會能在稠人廣眾之中發現這個“密探”的本領，每逢火車進站時，我由窗子伸出頭去，很快就發現那個要擔任監視我的警察的面孔。處在這種追蹤之下，我和我的追蹤者之間展開無聲的戰鬥。因為我自然感到需要，尤其在夜晚來往於同志們中間並同他們交換不讓警察與聞的意見，所以我竭盡全力把跟踪我的“救國者”“移開”（像我們的術語所說的），這就是說，我竭力在雜亂分歧的街道和房屋中間把我的追蹤者甩掉，這用我的兩條快腿和同志們的幫忙幾乎無例外地達到目的。許多安閑的市民露着驚訝的樣子看我，當我的快步漸漸變成了小跑，在我後面隔一段路有一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氣喘吁吁、汗如雨下。後來實行了環游籬的辦法時，鐵路追蹤的樣式也改變了。我在一八八五年春季第一次利用這樣的環游籬。我由德累斯頓起程經過薩克森、巴伐利亞、符騰堡和瑞士。在德國境內的追蹤同以往一樣。當我由巴塞爾往巴登州到夫賴堡時，我吃了一驚，看見我的警察衛士已經站在我時常住的旅館門口等着我。在卡爾斯盧厄這種事又發生一次。我於是問侍者，警察從哪里知道我要來。他聳一聳肩，並且認為，這警官三天以來就已在旅館門前等候我。這事情對我越來越神秘了。在同樣的監視系統之下，我最後來到了美因茨。我到達我要住宿的旅館的時候，侍者領班在那里站着，他看到我時叫道：“您到底來了，倍倍爾先生，我們已等候您八天了。”當我驚奇地問他，“是嗎，這是怎麼回事？”他回答說：“您的道德衛士八天以來總到我們這里來問，您什麼時候來。方才他看到您來就溜開了。”

我覺得這太討厭了。次日上午，我拜訪一位我黨同志，他是市議員，因為美因茨的警察隸屬於市政府，或者由他那里能知道，這種監視方法是從哪里來的。我不久就解決了這個疑問。我發覺，

原来德累斯顿車站管理处把我訂购环游簿的事通知德累斯顿的警察并把联票抄一份給它。德累斯顿警察局当时是全国最热衷于追踪我們的机关之一，它立刻通知有关各地的警察局，說我将来到。但是警察不能知道，我在各个地方将逗留多久，所以他們計算的时间与我到达美因茨的时间相差八天。

在那些年代，不仅铁路局同警察的关系密切，而且邮局也是这样。寄交著名社会民主党人的信件或包裹，在送交以前，邮局先通知警察局，使它能在物品交到后立即进入住宅而加以沒收，这种情况发生过几千次。在七十年代，李卜克内西在国会控訴他的信件被人私拆时，帝国邮政大臣斯台凡博士回答说：“书信里的秘密在德意志帝国就象祭坛上的聖經那样可靠”，早在当时，这句话我們就不相信，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却使我們有加以評論的充分理由。在我这里，邮政和警察的联系也还以其他形式暴露出来。

103 厂主和商人有一种商业习惯，即如果派代理人出发前往接受顾主訂貨，在代理人到达該地前不久，寄去一份印好的說这人即将到来的通知书。这在我們生意上也习用。有一天我在美因茨得悉，許多天以来在維斯巴登車站上已經站着两个秘密警察，以便在我到后担任監視我的职务。而且警察是由邮局中的商业通知书获悉我将到来。我很快决定了彻底戏弄他們一下。第二天早晨，我同两位亲密的党员同志乘車到維斯巴登前面最近一站，我們下車后由另一条警察料想不到的路进城去，在那里办完了我的商业事情并且还与我党同志举行了一个座談会。当我晚上同一大批同志一起出現在維斯巴登車站搭車回美因茨时，那两个警察还站在那里，他們看見我之后那副万分惊愕的神气使我們非常愉快。

一般說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党同志簡直把竭力摆布和欺騙警察当作游戏。每一个成功的戏弄都非常可笑，从而鼓

勵人另作新嘗試。我們聚集在一處辦完我們的黨務以後，正當來一陣歡笑，娛樂材料大部分是敘述如何愚弄警察的故事。警察有所發現和知曉，很少是由于他們自己的機智和技巧，而是由於某一個同志的疏忽或者喜好多言。除開有同志背叛，這種人不能抗拒警察的金錢引誘，或者是為警察所迫作叛賣活動，因為警察知道了他們的事情，如果告發，就會把有關的人送進監獄。這樣的強迫事情會屢次發生。基督教國家的警察支柱情願讓刑事罪不受懲罰，如果犯罪者同意走上政治變節的道路。

我有一個在大多數旅館使用假名的習慣，這自然很快就被警察發覺，但從不追究。我所以這樣做，一則是因為資產階級圈子裡對我的敵對態度使許多旅館主人如果知道我是誰，就不讓我住宿。再說，我也不願引起其餘客人的好奇和呆看。因為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下，我已經把以前所留的上髻和尖的下鬚改變為留滿鬚鬚，所以我的外貌沒有多少人能認識。自然，旅館主人和他們手下的職員會很快地探知我是誰，但也不驚擾我，職員們照例是同情我的。我長期犯了一個錯誤，在一個地方使用我同伙的名字，在另一地方則用商人奧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的名字。但有這麼一回，在一個地方我以往曾使用我同伙的名字，這次則用了弗里德里希的名字。這真不幸，我於是從現在起總使用弗里德里希這個名字。

104

這有一天在巴登的夫賴堡引起了一件趣事。我早晨走出旅館去做生意。在門口遇着郵遞員，我問他，有無萊比錫商人弗里德里希的信。“有的，而且還是掛號信！”他回答。我把收據簽好後走出去。五個月後，我又到夫賴堡，可巧在門口又遇到那個郵遞員，我又問他，有無商人弗里德里希的信。我一說這名字，他抬起頭來嚴厲地看著我說：“您不是弗里德里希先生，您是倍倍爾先生！”“不錯，這您是怎么知道的？”“瞧，今年春天您可把我弄得非常為難。您還記得，我當時交給您一封掛號信，當我回家後檢查我的收據時，吃

了一惊，发现您那张收据的签名不是弗里德里希而是倍倍尔。我赶紧跑到旅馆找侍者领班诉苦。侍者领班笑着解释说，倍倍尔和弗里德里希原是一个人。”幸而邮递员的上司（他必须把收据全部交给上司）只点一点数，而没有细看签名，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责罚。

这件事我觉得实在有趣，但是我从此以后开始小心了。

警察对我个人的监视，在那些年里常常是具有既可恶又刺激的性质，尤其是在德国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城市中。在德国北部监视人员，我可以說，是慎重些。警察的举动不大使人注目并且跟随我也离我远些，但是在中德和南德的一些城市中，警察是既拙笨又粗鲁，就是以警察观点来看也是愚蠢的。这里跟随我的照例是便衣警察，如果我带着我的样品箱穿街行走，他就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若进入房屋，他就在附近等候，到我出来时像只忠心的狗一样又跟上了。当一八七九年春季在紐伦堡第一次对我监视时，这消息像电光石火一样在我党同志之间传播开来。晚上，群众集合在警察局门口，对警察大骂，这种大骂只有一个巴伐利亚人能喊出口。思想较稳健的同志不惮烦劳地劝导群众散去，以免发生冲突。

105 这里在紐伦堡有某一个叫做马尔兴的人，是多年来监视我的秘密警察，他从早到晚追踪着我。有一天晚上，我又像平常一样甩掉了他。那时将近半夜，我和一个让我在他家住的朋友（很易理解，我当时宁愿舍旅馆而住私人住宅），一同走回家。我的朋友住在格莱斯哈迈——紐伦堡的郊区，铁路的那一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月夜。我们越过一片草地，刚一走上街道，我就突然看到这位马尔兴先生站在路旁一棵白杨树树下。他显然想至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使我的朋友注意马尔兴。他一看到马尔兴，就飞步向他跑去。这个区域死一般的寂静，到处都不见一个人。现在在马尔兴方面可以說，一个抵两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于是他急忙转身，沿着大道飞奔而去。我的朋友就大踏步随后追赶，他俩进入两

个庭园中間一条弯曲的小道里面就看不見了。忽然間枪声砰然一响。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认为，警察用枪打了我的朋友。我急向他们追去。当我刚轉入小道的时候，我的朋友大笑迎面而来。“誰在打枪？”我問。“我打枪，可是这家伙逃了”，他回答。“是呀，你瘋了，如果明天馬尔兴告你，我就必須作反对你的证人。”“我只是对空射击的呀”，他以安慰的口气回答。奇怪的是，我們不再听说这件事。馬尔兴大約认为緘默是比較聪明的办法。后来他退出警察界做起牛奶生意。竟有人向我断言，他参加了党。

一八八二年，我无意中导致了政府剝夺佛尔特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权利。这个市政府是絕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所組成，它允許我在一个参加者非常众多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巴伐利亚政府因而大怒，剝夺市政府掌握結社与集会权的权利，把它移交中弗兰克专区政府。一九〇二年年底（亦即二十年以后），塞基茨同志在邦議会上质問巴伐利亚政府，究竟它还要把剝夺佛尔特市政府权利維持到何时，当时的部长馮·菲利普奇回答說，只要佛尔特的市政府中有社会民主党人在內，就一直保持下去。但是人們不久就改正了想法，把权利仍交回佛尔特市政府。这样一个部长，用这末可笑的卑鄙手段来治理国事，在德国，大家知道，竟被称为政治家。

我从紐伦堡—佛尔特，通常往慕尼黑去，在这里我也最多停留三四天。我一到达，我党同志馬上都知道了，然后在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星期日，照例在一个啤酒店里来个大集会。同志們随后成群出发，以高呼和歌唱来示威。紧跟在同志們后面的是由警监米歇尔·格里特或其助理欧尔帶領的为数約十二人的尊貴的宪兵。星期日的娱乐經常是以我又一次試行避开警察而結束。直到如今，我記憶犹新，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长个子馬克西姆·恩斯特如何用手拉起衣襟，迈开两条长腿穿过錯杂的小巷向宫廷酿酒場附

近冲去，我看着他表演的那种滑稽像，笑得几乎难以跟上前去。

107 在符騰堡做得和气一些，虽然那里的警察也常常使我們的同志生活困苦。有一次，斯图加特的同志集会紀念三月革命，一个警官前来声明說：不准作庆祝演讲。一切談判无效，坚持禁令。于是紀念会主持人問他，是否准許宣讀，这警官以其充分的尊严感給了典型的答复：“可以宣讀，但不許乱扯！”于是发表的不是一篇也許相当温和的庆祝演說，而是宣讀弗萊里格拉特和別人的革命詩篇。国家又被拯救了一次。

另一事件的經過是：一天晚上，我在斯图加特，三个艾斯林根
的同志来請我立刻同他們往艾斯林根去，在那里的一個集会上迎
接宗納曼。我拒絕了。一則我疲倦了，二則我在业务旅行中也不
喜欢在公开集会上講話，因为我不願在所謂自己家里冒犯几乎尽
是我的政治敌人的主顧。最后我不得不勉强向他們的热情让步。
当我们进入会场时，里面已經人滿。我們只得站在門口。宗納曼
讲得特別坏，他显然沒有兴趣。卡尔·麦耶尔作主席（柏林有人开
玩笑地說，麦耶尔每天早晨至少要吃一个普魯士人作早餐）。宗納
曼讲完后，麦耶尔要求听众报名发言。我报名发言。当麦耶尔和
大会一听到我的名字，发生了一陣騷动，好像从屋頂上飞进一顆炸
弹。麦耶尔于是通过他在滔滔不絕的講話中致敬于我这“勇敢的
民望所归的人”，并声明他抱歉得很，他必須辞去主席职务，因为
我所隶属的党是受非常法追究的。这是我所沒有遇到过的事，尤
其沒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那里遇到过。当机立断，我抓起鎗向大
会声明說：幸而我們是在符騰堡，这里根据邦法不要求集会向警察
办理登記手續。如果无人反对，我願接充主席。大会默然。我必須
来作这个非常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在艾斯林根的同志中間我应
建議由誰来担任主席。于是我自己发言。但是很快我就觉察到，
宗納曼为什么讲得很坏。十分钟后，我的遭遇同他一样。稠密的人

群和夏天的温度产生酷热。并且因为会场似乎以前不久才用石灰粉刷过的，天花板和墙壁都开始反潮，无数的石灰粉散布在空气中，贴在粘膜上，讲起话来特别吃力。我的心情很不安。这时由门口发出一种声音打断我的话。我没有听懂讲话人的话，问他要干什么，他回答我说：“以法令名义解散集会！”没有人比我更幸运了。声音是由一个警察发出的，他原是来作听众的，但被他附近站着的那些民族自由党的城市大亨们多时劝诱，以至声言解散大会。但因此却保证了大会的效果，因为大部分与会者恼恨被这样打发回家。一般说来，在那些年代，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统治之下，我们如果在讲话中间忽然被监视的警官打断并声明解散集会，我们没有人感到苦恼。这经常引起拥护发言人的示威性掌声，因而效果最好；再说，也保护了发言人的肺。

在那个艾斯林根集会的次日，我往杜宾根，在那里有我一个很熟的人——一个左倾的人民党人——在车站接我。我给他叙述艾斯林根的事，他听了摇摇头。午饭时，我们一起到市政厅酒店，我们坐的那张餐桌已经有一位先生坐在那里，我的熟人向我介绍，说他是杜宾根市的警务长。他就立即为这个人叙述艾斯林根的事件。警务长笑了，然后对我说：“您知道，倍倍尔先生，今天晚上您在这里举行一个集会，我向您保证，我不解散它。”我笑着回答他，他这亲切的邀请，是警察方面对我迄今所未曾有过的，可惜未能从命，因为我必须乘下午的火车往苏黎世，那里有人等候我。

在巴登是另一个样子。那里的警察在那时期已经采取了普鲁士的方式。在夫赖堡对我的监视特别严厉。我习惯住在“罗马皇帝”旅馆。旅馆老板，一位斯布林格先生，自然是我的政治敌人，但也是一个正派人。他很憎恨警察一大早就在旅馆的前门以至后门放哨，来等候我出门。并且当警察先生日渐大胆，有一次竟闯进庭院，他就强硬地把他们赶了出去。有一天我在警务长维乃尔那里

控訴这种无耻的監視方式，但是这位先生非常不悅地对待我的申訴。一个像我这样危險的人，如果警察加以監視，是不許他控訴的。我声明，这种監視方式将在下次国会中提出。他回答说：这于他是无足重輕的，他认为什么必要就做什么。我相信，我如果在国会中攻击他，这位先生会欢喜的。当时的大公是我們凶狠的敌人，一个因为对我们处置过严而被我控告的官員可以得到他的欢心并有升級的希望。在九十年代，这位大公在退伍軍人协会庆祝会上还（沒有提名）一再駁斥我的两次庆祝会上的演說，一次是在辛根附近的霍亨維尔，另一次是次年在黑森林的維林根市。

卡尔斯卢合的監視也是无所不至。我曾屢次这样摆脱对我的監視，每見有单独停放着的出租馬車，我就一跃而上，飞駛而去。一个星期日，当我和保尔·辛格尔在卡尔斯卢合遇見时，他也参加了这样一种行动。

許多年間，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一个特別討厭的陪伴。这个人跟在我后面，几乎不到一公尺。有时我停下，好像要看一座有趣的房屋或一棵树，他立刻也采取相同的动作。但有一次在大白天我把他“甩掉”了。我在一天中午乘市郊火車往欧芬巴赫。他跟着我上去，坐在我坐的車廂里。在欧芬巴赫，我把生意很快办完，然后去拜訪我党的朋友烏尔利希，他在城边一座房屋的院子里開設一个小印刷所。我問他，我有一个追踪者站在房子前面，我如果不乘市郊火車而利用美因—威塞尔铁路（当时卡塞尔—法兰克福綫这样称呼）能否避开他。烏尔利希认为可以，不久就有这样一趟火車，我只要跨过庭院板墙，橫越田里一条小路，即可直达美因—威塞尔車站。烏尔利希帮助我翻过板墙，而后他把我的样品箱递給我，在火車将要到达时，我到了車站。到法兰克福后，我跑到我住的“达姆斯塔德城”，这是靠大教堂很近的一个小旅館，这教堂在一八四八年曾作国会的激进左派的飲宴之所。我把样品箱放

下就走了。当我夜里十一时以后进入客房时，店主人和客人都大笑起来。人們向我述說，当我晚上离开旅館后，不久有一个警察坐一辆出租馬車狂奔而来，才知道我已經离开旅館。在客人大笑中他咒罵着去了。

后来我把这些經過在国会中发表了。因此至少在法兰克福和維斯巴登停止了这种可厌的監視。

但是即使在国外，我也不免受警察的迫害。我常由齐滔出发順路到波希米亚的賴辛貝格作生意。我一由那里起程，在齐滔車站上的薩克森的崗警就用电报把我的到达時間通知賴辛貝格的警察。到那里后，一个雄赳赳的宪兵已經全副武装地站在車站上，为的是伴送我到我的主顧們那里去。这引起巨大轰动。随后有一天我做完工作后同一些我党同志在一个飯館花园中集会，我們正在談話，我就被召往見城市当局，他詢問我到賴辛貝格干什么以后，劝告我乘下一班車离开这里，否則他将給我以驅逐出境的处分。在奥地利那时候完全同我們这里一样籠罩着仇視紅色人物的狂热；對我們同志的极厉害的殘暴懲罰成为日常事务。这些懲罰對他們同對我們一样毫无用处。

由賴辛貝格我多半是穿过北波希米亚前进。我一次作这样的旅行，最后到了开姆尼茨。在这里我也受到通常的接待。而且警察蛮橫无礼，竟敢当我不在，从旅館里把我的箱子取去并且要打开检查禁品。有一个警察甚至在大街上要我同他到警察局去，以便检查我的箱子。这我拒絕了，倘若他願意扛箱子，我可以跟着他。111
他满足于同我进入一座房子，来证明箱子里面並沒有有害的东西。我对这个不法行为一直控告到部长那里，但沒有結果。

相反地，在同一天下午我却同米特維达的警察有出可笑的插曲：我到那边去是为了拜訪我們那里的同志。当我到达米特維达車站时，我受到双重的迎接。有一批黨員同志等候我，在他們后面

站着一群由城市首长——市长奎布莱尔尊駕亲自率领的警察。这种迎接使我觉得非常可笑。我于是立刻向我的同志们建議，不到飯店去而到米特維达市的主要街道上回来散步，同时我把种种事情讲給他們听。想到就做。开始散步。在我們后面不远跟随着市长和警察。几分钟后聚集了大群的人，由人群中喊出种种对市长和警察的冷嘲热諷。大家都笑起来。市长非常狠狠地避到一座房子里，命令他的部属离开。

当我由米特維达回到开姆尼茨的时候，在我住的旅館前面警察給我站了双崗。我早已睡起正义人士的大觉，而可怜的警察却須在离开崗位后才能办到。第二天早晨，我乘第一班火車走了。当警察又来值班时，他們听说，他們的站崗已成为多余的事，定感滿意。只有敌視我們而毫无思考能力，并且不再感到他們在每一有理性人的眼里如何出丑的机关，才能采取这一切措施。反社会党人的瘋狂使他們失去了理性。

一八八一年我被驅逐出境以后，在萊比錫也是这样。人們非常开恩，准許我一年有二次最多三次，到这城里来一两天，以便为了业务旅行了解一下业务情况，这时也立即有警察从早晨到晚上在門前站崗。到賬房来訪的同行开玩笑說：我們已猜想到，陛下又到臨了，他的扈卫站在門口。我們的一个工人恼恨这种監視，以恶言对警察喊叫，因而被禁閉八天。如果我在旅行中經過萊比錫，就必须預先呈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車站，什么时候由什么車站离开那里。于是警察的監視又发生效力，規定是，不得停留地从这个車站到另一个車站，搭下次火車离开本市。这个义务加在一切由萊比錫及其轄境驅逐出去的人，他們一旦旅行經過該地，都应如此。萊比錫警察对我特別严格，有些允許李卜克内西停留較久的地方，对我都經常加以拒絕。这样两种对待的原因，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后偶然获悉。警察权威人士——卫队长多布勒怀疑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莱比錫通訊是由我发出的，通訊总是开他的玩笑，把他說成綠眼睛的人。其实并没有一篇通訊是我发的；如果多布勒不是个十分愚蠢的人，那末他从笔調上（这他在莱比錫可以长年研究）立刻可以认出，肇事者是誰。欧克森斯提納^①的話总是对的：“你不知道，我的儿子，世界是以多么少的知識来管理的。”

我还能絮絮叨叨把这一章說得很长，但我只再叙一件也許可能使我遭到极恶的后果的事情，来結束这一章。一八八一年三月間，我到东部做生意。同时我也到波森，并決定順路到我父亲出生的城市欧斯特罗沃一行。根据我党同志魯克的說法（他的双亲住在那里），在欧斯特罗沃还有我父亲的三个姐妹在世，此外还有一批年輕亲属。年輕亲属中，我也遇到过一个表兄弟，他常到卡里希做生意。他向我建議次日（星期日）到卡里希去一趟。卡里希是个要塞，駐有强大的俄国军队，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俄国城市。他不难給我搞一张假护照。我預感这件事也可能出漏子，因为我覺得，我在欧斯特罗沃也被警察監視。所以我拒絕了。当我星期一早晨走进客房用早餐时，店主人問我，是否听到夜間发生在旅館中的吵鬧。我惊奇地問：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十二点钟以后，柏林来个电报，說星期日午时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在彼得堡被炸弹炸死。这消息使他的客人非常憤怒，有几个喝醉了酒的，认为德意志社会民主党是这次行刺事件的共謀犯，所以有人打算闖上樓去，把我丢出房外。他煞費苦心才把这件事阻止住了。

113

这真是个可喜的通知。不久以后，我的表兄弟来了，他說，幸而我們沒有在卡里希。他方才听说，那里接到关于沙皇被刺的电报后，下午四点钟城門全閉，不准任何人出入。我設想一下，如果我在卡里希被认出来（对于这，德国警察無論如何要負責办理），那

^① 一五八三——一六五四年，三十年战争期間任瑞典首相。——譯者

該发生什么情况。俾斯麦侯爵对于我的释放大概不会动一个指头，他的警察，据我們当时所得的經驗，甚至会发誓說，我在东方的旅行很有嫌疑，虽然我除在哥尼斯堡和但泽之外，从沒有拜訪过我党同志。在那事件后沒有几天，柏林《邮报》竟发表一篇文章：“倍倍尔先生在俄国边境”，把我的旅行同行刺联系起来。所以我有理由为我的小心謹慎、中止卡里希之行而庆幸。

关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之下的集会說几句话

114 在那个法令統治之下，如果有人想确定警察方面作为禁止或解散集会所依据的原则，他即使用高额奖金悬赏来解答这問題，也必须說：这是沒有原则的。这里的标准只是官吏們的喜怒和任意横行。在这一地方导致禁止或解散集会的原因，不适用于另一地方。导致处分的原因，有时是題目，有时是发言人本人，有时又是地方的性质。时常在同一个地方，这一个官員所准許的，另一个又禁止。还有下命令說，某某和某某演說家从此永远不准演讲。例如保尔·辛格尔在薩克森王国所遇到的就是这样。

一八八六年，当保加利亚的巴騰貝格丑剧引起全欧洲注意时，我在萊比錫发起一个民众大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那些事情的演讲。在辯論中，保尔·辛格尔也讲了話，他講話时无意中說了一句侮辱联邦議会的話。監視的官吏立刻停止他发言。我料想会起訴，并祝賀我的朋友，他定然也可以把監獄的牆从里面观察一番了。我猜錯了。並沒有起訴，却只由內政部长下个命令，永不准辛格尔在薩克森作公开演讲。

禁止集会也屢次得到有趣的結果，在薩克森的大汉茵就有这

样一回事。在那里的一次民众集会上我报名作有关新的意外事故保险法的演讲人，那末这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题目。但因为我担任演讲人，集会仍被禁止。大汉茵的同志在我的建議下向所有的法院提出申訴，但到处都遭到拒絕。他們然后向邦議會申訴。議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討論。結果是反对我們和几个自由主义者的票駁斥了我們的申訴。

我于是建議大汉茵的同志，仍以原題目重新召集會議，但以一個工人担任報告員。報告后在討論時我再發言。就这样办了。暗地里却通知說，我将出席集会。集会上挤满了人，与会者有駐防大汉茵的驃騎兵團的几乎全体軍官，他們是穿便衣參加的。報告人讲了約二十分钟，在以后展开的辯論中我才發言，警察未敢加以干涉。我在暴风雨般的掌聲中讲了一点多钟。但整个事件的頂点却是在集会結束后監視的警官向我走来，为了我这有趣的演講向我致謝。政府和邦議會在道义上的失敗不能比这更厉害了。

115

当后来在国会的一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討論会上我为說明法令的执行情形而叙述大汉茵事件时，也特意提到了警察向我致謝，全會場包括出席會議的俾斯麥在內哄堂大笑。这样和善的警官，他大概还没有遇见过。

但是除公开集会之外还有无数次的秘密集会。这甚至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集会上，全体领导都出席，并且这样的集会罕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幽靜而偏僻的會場、森林、荒野、砂礫坑和采石場，都是所选择的會場。例如，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要向我的汉堡的党内同志們报告我在国会中的活动，我們除在这种地点会晤外，别无他法。

但是我却有一次被捉住了，那是当我出席曼海姆的黨員同志在所謂納卡河尖地上(納卡河流入萊茵河的地方)举行的秘密集会的时候。我們被认出来，奥古斯特·德累斯巴赫、我和一批曼海姆

党内同志被科以罚金。相反地，有一次人数众多的秘密集会，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在美因茨下面一个无人居住的莱茵河小岛上举行的，则未科罚金。固然检察官竭力起诉，但证据不能成立。所以控诉只好中止。

116 但是只有地方的秘密集会还不够。县和邦的集会也有必要。在萨克森也是如此。警察固然屡次追踪这样的集会，但是我们总是愚弄他们一下。特别是在一次邦会议时，我们假装要在虎穴——德累斯顿举行。在一个十一月的阴郁的星期日，代表们在警察监视之下来到德累斯顿。我们在那里集合，约有四五十人，下午在轮船码头上打算乘船往易北河上游去。警察当然看见了我們，并且当然给我们四个秘密警察作为卫士。虽然天气不佳，我们仍留在甲板上。我們的船票是到皮尔尼茨。同我們作伴，警察感到不舒服。这是我們所期待的。他們进船舱去了。我們的四个同志跟他們到那里去，在那里玩起牌来，警察学起这个榜样。我們却暗暗商定，不到皮尔尼茨，而在下一站很快离开了船。我們的那四位同志为了稳住警察，到皮尔尼茨才下船。开会地点在森林中间的迈克斯弥莱，这在适宜的季节是德累斯顿人所喜爱的郊游处所。当我們在警察不知不觉中离船时，天色已相当黑暗。我們以冲鋒的步伐跑向迈克斯弥莱，那里的店主夫妇看到在这样季节和这样时刻跑来这样大群的客人，感到惊讶。我們来到大厅里，同店主夫妇說明，我們是一个音乐协会，一切我們自己来。为要迷惑他們，我們不时地唱一只歌。會議在这样場合总是进行得很快。在討論中間，我們那四位到皮尔尼茨的同志来了，当他們描述警察在皮尔尼茨站上看到只有他們这几个人时那副惊愕的神情，我們大笑不止。我們的四位同志立即跑进漆黑的森林里，警察也就由他們去了。大約警察是乘下一班船回德累斯顿。他們一定要受到他們的上級的責罰。

我們的討論一結束，就叫店主人給我們一個燈籠，由一位同志挑在手杖上在前面引路，以免我們在這污泥的道路上迷路，我們唱着歌走我們的路。半夜後我們步行又回到德累斯頓。警察不需要有什麼推測天才就可以猜到我們在什麼地方開會；第二天他們派一個委員會到邁克斯彌萊去訊問一下店主夫婦。店主夫婦一聽說星期日他們接待的是怎樣危險的客人，吃驚不小。但是他們不會有什麼牽累我們的口供，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117

當時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下每一擔任黨的職務的，都經歷過類似的事。我這裡所敘述的僅是其中一小片斷而已。

地下工作

我們秘密活動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組織《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其他禁書的推廣工作。這裡轉錄我給蘇黎世的人們的一系列的书信，這些书信中顯示出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下這方面的黨的生活。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莫特勒！

首先告訴你，柏林人拿去黨團的總結報告五百份，例外地每份收十分尼，為的是把多餘的錢給被流放者的家屬使用。第四期《社會民主黨人報》連同報告的結尾部分還未到達柏林，因而發生一種揣測，說第四期被我們扣留了，為的是掩蓋 H. ① 沒有在報告上簽字。這真是奇怪的邏輯，但是在柏林竟有許多人相信，因此大力推廣總結報告就十分必要。

① H. 是哈森克萊維爾。參看第五十一——五十二頁。——編者

請寄三百份到这里来，可利用 F. 那里的 Kl. 小姐的地址。

第八、九、十和十一各期柏林都沒有收到，因为格伦齐希被捕，地址泄露，可能落到警察手里；惊人的是，我們最能干的人办起事来有多么拙笨。直到你們接到了地址（这几天内即办理）之前，暂时不要往柏林寄东西。如果柏林沒有把地址直接寄給你們，請把那里的賬单寄到这里来。

118 如果是像你所写的那样的布置，一切順利，則发行部就十分完善了。我认为，即使汉堡給你們其他建議，你們也仍要保持着秘密組織。不宜把采取的布置和所設置的組織不顾一切地暴露出去。如果你們确信，協議的事可以很好地达到目的，而且一时又沒有其他办法，別的路都走不通了，只有采取写信的办法，那末就写信好了。

你們或許可以由那里把有关北方的东西寄到 H；不过我們这里并不規定办法，因为你們必是最清楚地知道和看到，什么适当，什么不适当。

关于书籍和刊物的銷售，我在一二日前已写过信了，你們想必已收到。

我在这里只能重說一遍，即如果从这里来的建議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不能实行，你們就按那里的情况办理。我們在这里只能說明我們的思想，至于它是否永远正确和能否实行，我們不能知道。注意将来把報紙按完全确定的時間完工，这样不仅中間人，即最后的收件人也差不多能計算出寄件到达的那一天；迄今完全不可能計算出寄件到达的日子。

我接到巴黎来的一封信，信中也抱怨《社会民主党人报》到来的時間不規則。

瓦尔特希希望，不日可以接到准許旅行的通知；他的开姆尼茨的官司是阻碍……

我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怎么样了？請把它按期登广告。这一版只剩下二、三十本了。如果再版，我就要把它分章；它现在的结构，读起来不方便。

附件請交福尔馬尔。 此致
衷心的敬礼。

你的奧·倍·”

“萊比錫，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莫特勒！

你們刚从窝里出来，竟就觉得皮子痒起来；你們把别人还陷在里面的陷阱已忘到九霄云外。

完全用不着天才就可以确定，价款是誰收到的，因为邮局对这种款項有六分之五是公开付款的。 119

一个‘軍費金庫’将很适于暴露會計員并且把所盼望的、由某一方面計劃已久并渴望其实现的戒严加到我們头上。由于同一理由，我反对所提到的同第十三期一起寄来的小报上的‘正式’报字样，我认为这完全无益。凡是有一个‘正式’报的地方，也就有一个‘正式’的领导机关；至少有很多很有影响的人认为如此，而且他們还相信，这领导机关是在萊比錫，这个巢穴必須加以毁灭。我至少确知，如果說我們仍旧安坐在这里未被惊扰，其原因不在柏林的某些人。每一成功都促使人們更加紧扫蕩；今天却又最无耻地把萊比錫指为馬格德堡选举的发源地了。所以不要做那些把我們暴露了而于你們毫无益处的事情。

考夫曼上星期在汉諾威因为违禁返回柏林和推銷《自由》报的罪以及十四条其他由于《自由》报内容所犯的罪（六条讀君罪和許多条侮辱俾斯麦的罪等），被判四年监禁。这就是說，他因被控叛逆罪还要再經最高法院审理，将来一切对帝国的叛逆罪和叛国罪都由該院判决。在柏林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輕举妄动；幸而这

鬼怪是在重頒戒严令之后才出現。

关于考夫曼的消息可以发表。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錫，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布兰特尔^①！

信都收到。一月二日的报告发表以后，我不再有什么遗漏的东西要素还了。

我在前一两天写给赫希柏格的信，你收到了吧？

120 再说一遍，莱比錫需要一百三十份，其中一百一十七份是固定的；需要可能还要大些。第一次寄件只收到九十七份；短少的仍须按所訂的数目补足。

不伦瑞克等地的通信地址都好。

我若作春季旅行，我将竭力把我们的人召集起来，彻底地同他们谈谈。你们知道恩得里斯（奥格斯堡）亡故。这令人痛惜，他是个杰出的青年。

你说：‘关于莱比錫的事我还没有决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关于刊物我们在那时曾写信给烏萊，人民书店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都拿过来并且通知我们，但对人民书店只以現金售卖，因为它和《哨兵》报还欠我们一大笔债。因为你们同人民书店結算印刷眼目，所以能够把一切它那方面的刊物关系都从眼单上抄录下来。

在柏林，第八期以下的都被查获，而且因为 Grg.^② 这样能干，竟把直到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的全部收件人都记入他的笔记本中，因而警察非常省力。在这件事上有叛变行为，证据是，他在眼房中逮捕并且警察径直走向他存放那东西的柜子。警察可能在那里还查出其他的東西。检查直到现在仍在严格秘密进行中，誰也

① 莫特勒的笔名。——編者

② 格伦齐希。——編者

不知道事情怎么样。

同样准确知道地点的搜家，曾发生多次。你们可以料到，因此籠罩着很大的怀疑，人们在认为事情可靠以前，绝不肯冒一点险。

关于总结报告，柏林人们决定不予散发，因为它不够尖锐，所以就是正式投不信任票。我们给这些好人以应得的斥责；我设想，这里另有其他影响在作祟。

因为瓦尔特（福尔马尔的笔名）在他的信里也曾提到总结报告，我删去了其中几点过于尖锐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里来说明一下，第一，他在信里就搞错了，把哈森克莱维尔的笔迹和我的混淆了；第二，由我们签名的文件必须这样持重，才不致使我们吃官司。¹²¹

如果南德仍旧畅通，我们暂时不必用汉堡。直到现在，一切顺利，至少第一期如此；第二期还没有到这里。

可以介绍一个办法，在寄发样张请订户订时，附一小启事说明把钱用邮票或钞票夹在信中，用挂号信寄到那里去。因为人们不知应如何寄钱，汇款按国际规定应以‘法郎’汇兑，这就有困难，再者，必须署名。人们给我们汇款是有顾虑的：第一，工作本来已经够多的了，第二，人们对这事做得都是这样特别不妙，我们在这方面所以能免遭不幸，那就只有感谢我们的迄今还未被腐蚀的邮局了。

你们今后寄信可以挂号或作为汇款信件，就可直接寄交，不必顾虑；给我的可寄交我妻。

我不愿从事于《我们的目的》的修订工作；这必须彻底修订，这就给我大量工作。照它原样印吧，但是印一万份？你们想把它弄到哪里去？

现在在柏林也还有一次新的国会选举，这将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考验。

在第十七选区，我们除彭齐希外还有一个保守党人作竞选的

候选人。

衷心的致候。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錫，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福尔马尔)!

我将对您来信各点一一作答。

122 首先奉告一件使我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不能交给馬隆他那篇文章，并且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办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多地需要我的劳动力，所以凡是我必须集中思想来做的工作都几乎不可能了。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业务，到一点或者一点半合作社理事会座谈会，两点到七点又是业务。我若不利用一大部分业务时间来作党的工作，则单只晚上我就不可能胜任。如果事情进行顺利，那末还可将就，但是还有大批各种烦恼和不愉快的事，所以我如果有一天像可怜的盖布，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再谈其余的。

您给恩格斯的回信很好，在我通知李卜克内西以后就寄给恩格斯，他会狠狠地骂一顿。无妨，他的怨言我已经听够了，我也把这写信告诉他。

现在再说一次，也希望这是关于‘正式’报等字样的末一次，我们认为这种写法，不管出自何人，都一样地危险。您在我所论及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您自己很少阻止这种不愉快的传播。并且您在格伦齐希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您多么不能信赖我们的人。但是，否认是绝对不行的。第一，人们不相信这种否认，第二，被迫否认是不愉快的，第三，万一因为一件事情打起官司，我们的法官的主观推测就有这末大的伸缩余地，使在严格的司法意义上的‘证据’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您在有关莫斯特的诽谤函件的通告中又谈到了‘党的领

导’。如果您第一次的通告和现在的这个一齐誤落他人之手，我想要知道一下，那又如何否认。无论如何，这种爆炸的大部分要落在您的身上，我认为，这对您是决不会愉快的。

他們那里同我們的許多党内同志完全一样，他們仍生活在古老情况之中，他們仍用古老的詞句讲话。但是这容易避免，并且也必须避免。

我曾盼望，您主要地能仅限于叙述莫斯特的誹謗信件，而且只是因为，就我所知，在德国而且大概也几乎在国外，没有一个人相信，《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赫希柏格的企业。如果这种想法曾經存在，我們的报告（我指的是議會党团的和后来的报告）以及充分显露出何人撰稿的文章，也早已把它驅散，并且很彻底地把它驅散。 123

我相信，您神經過敏，太容易激动。

赫希柏格写信告訴我，他因为通告提出他的名字，对通告感到不愉快。他自然有一切原因要尽量置身幕后。

您抓住了莫斯特的誹謗信件，很好，但是我們暂时不願繼續传播它，而且是为了赫希柏格。他遇有机会，将当面給汉斯应得的斥責。

为什么第一期这样大事鋪张，您的解释我們认为完全正确。附带說一声，李卜克内西經常在德累斯頓，只在星期天，有时星期六才到这里来，所以我还没有同他談，弗里茨舍太胖和冷淡得不露面。我这里說得是 Hskr. 和 V.^①，我把信讀給他們听了。我也很知道，人們是多么容易流于放蕩，我个人因为顧虑到錯誤的措施在敌人报纸上的作用，所以对于錯誤的措施不能过甚地表示惋惜。这种恐惧心理，如我已在信里說过的，完全針對着另一方面；对于主要損害，瑞士官方的感受，我在发信后才想到。

① 哈森克莱维尔和瓦尔特希。——編者

因此，这也就规定了我們的策略，而且必須按照这个来办报。

我們要努力，只要有机会，就到处提出这些观点，如有必要，您也要按同样意思用书面写出来。

124 对于柏林，在我們到那里之前，似乎不必做什么。監視是大規模的、成批的，对于每个人，只要稍微认为他同被禁止的报纸或者同喜爱这样报纸的人多少有点关系，都进行家宅搜查。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对于这封信应予注明：《小报》是福尔馬尔所編的传单。福尔馬尔以笔名瓦尔特在苏黎世建立一个所謂对外連絡站，它不依靠我們，保持对国外各协会的联系。我們对此沒有异议。但在对外連絡站的通告中常常有这样一些措辞和語句，万一这种通告落入他人之手，这些語句必使我們在國內遭到連累。但这个危險是存在的，因为在国外——布魯塞尔、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各较大协会里也有德国警察在活动。但奇怪的是，柏林却多年沒有探悉瓦尔特究系何人，这有馮·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常常提到瓦尔特的名字可以为证。

在柏林的領導机关中，由于迫害和訴訟，人事更換很頻繁。有許多次也有著名的警察代理人盘踞其中，他們在激进主义方面做得太过火，力图同我們冲突。

这里所說莫斯特的誹謗信件是針對赫希柏格的，莫斯特原来以前受过他的帮助，应当向他致謝。莫斯特却恬不知耻，对于以前友好往来而不能責备他改变見解的人，加以侮辱性的攻击并攻訐說他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幕后。赫希柏格为此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一期上声明說，他在党内並沒有值得一提的影响，他既沒有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这报也不是他的机关报。他始終既沒有同党也沒有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協議，所以他必須謝絕同这家报纸的任何共同責任。这个声明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也

可以起安撫的作用，他們現在可以認清，他們對赫希柏格的地位到底還是估計錯了。

對於赫希柏格，莫斯特的攻訐起了作用，當他不久以後到德國旅行時他的遭遇同我一樣。他經常被警察追蹤。他當時曾有一夜睡在我這裡的沙發上。一個警察充當衛士，在門前站崗直到深夜，但次晨赫希柏格起身絕早，當崗警又出現在屋前時，鳥兒已經飛去了。當警察看到我從鐵路那邊回來而後走進家裡時，十分驚愕。

125

一八八〇年二月間，《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和我們發生新的分歧。我有個習慣，總使給黨內同志的通知和指示登載在報頭上，標題是：“德國，年月等”。在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九期上，編輯部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發表一篇號召書，發起在德國建立一個普遍的秘密組織，下署：德國，一八八〇年二月底。號召書的頂點是：“這裡自然不是談論組織的適當地方；同志們只須商妥可靠地址，其餘的事會跟着來的。”

這是違背我們的意思的。在整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期間，我們嚴格注意於不成立一個普遍的廣布全德國的秘密組織。我們確信，這個組織會在極短時間內被發現，而後必將導致更加凶惡的普遍迫害。如果同志們在一定的地方組織起來，萬一被發覺，迫害不可能超出這個地方。人們若為一定目的而集會，則問題只在於追究未辦法律登記手續的集會。雖然如此，在警察方面仍普遍認為，有一個廣布全德國的秘密組織存在，首先我是屬於它的領導機關的。來自警察方面的報紙文章和同類的小冊子都認為有一個這樣的普遍聯合存在，而且竟由警官們在法庭前宣誓這樣說。這幾年來，我必須在各城市中為許多訴訟作證，證明並沒有這樣一個聯合存在，也不能存在，只要是有關隸屬於一個廣布全德國的秘密組織的控訴，結果照例是宣布被告無罪。

一八八八年我歡慶一次極大的勝利，當時柏林秘密組織的領

126

领导人被控告了，說他們是隶属于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組織的。证人是三十个各級警官和我，警官中間有在我們这方面臭名昭著的柏林警察參議克吕格尔——政治警察首脑。我的证据推翻了三十个警官的证据，法院宣布被告們被控隶属于一个普遍的秘密組織不能成立，不过他們由于地方性秘密联合另行判决。

警察參議克吕格尔非常恼恨这个判决，他回到他的办公室后，大罵法院，說它竟对我这样一个汉子比对三十个普魯士王室警官还相信得多。

克吕格尔这种瘋狂攻击，我怎么会知道呢？原来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官員，他会把那里的一切事情告訴我們的。

这事以后再詳述。

不消說，我們把苏黎世所計劃的秘密組織才在萌芽中就鏟除了。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會議

在这次会期中，我們、政府和資產階級政党之間发生极其尖銳和激动的爭辯。警察的暴行所达到的范围和严酷性，使我們极为憤怒。这种憤怒情緒，我在討論延长柏林小戒严时特別表現出来了。我結束我当时的发言时說：“我的先生們，这种情况在群众的心里和感情上必将自然而然地激起什么？它将产生什么？只有仇恨，只有忿怒，这种忿怒，一般說来，到最后定然会导致除了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的东西而外别无他法的信念。这是您們用您們的惩罚所导致的。并且还不止此，而且也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喚醒了一种要求（因为与您們打交道的是人），必然喚起的报仇雪恨的要求。这就是您們所得到的收获，如果您們滿意于这种收获——那末，我

們也滿意。”

《法蘭克福報》關於這個發言寫道：“隨着非常法而來的仇恨和報仇欲發展到如何程度，我們從倍倍爾的發言中可以戰戰兢兢地推測出來。我們所得到的是危機四伏的陰森印象，這種潛伏危險威脅國家治安，更甚於任何公開鼓動所能做的。”

《日爾曼尼亞報》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延長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結語說：“有一個希望支持着社會黨人，不是希望非常法令的終結，而是希望報仇的那天早日到來，這大約在一八八九年左右。”

這次會期內提出了再延長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至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一個議案。中央黨委派馮·海爾特林男爵為第一發言人，他的發言說明他的黨有一部分在非常法事件上變了心。他提議組織委員會來討論。相反地，拉斯克爾議員則認為法令執行得太嚴格了。他聲明反對延長法令，最後投票反對它。

我們曾提出一批修改建議，為的是用這方法能夠徹底談談法令的執行情況。在辯論時，我們幾乎全體參與。最後決定把法令延長至一八八四年九月三十日，於是又加上二年半。國會還通過一個決議案，即募捐或者公開勸募捐款，不受第一六條的約束，如果捐款規定只救濟那些因執行法令第二二和二八條而失掉其贍養人的人們。

哈賽爾曼五月四日的一次發言成為法令第三次討論中一個特別插曲，在發言中他當國會大眾之前表示脫離了我們，他說：人們弄絕虛無主義者，他却把自己歸在他們之列。國會空談時期已經過去了，行動時期開始了。

我在我的論預算案的發言中對馮·卡爾多夫先生（他斷言我以我同俄國的關係自誇）聲明說：“我只能回答馮·卡爾多夫議員說，我在俄國毫無聯繫，並且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是來自與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完全不同的圈子。馮·卡爾多夫先生的社會圈

128

子就在那里。”(大笑。)对于这个声明,哈赛尔曼,有如上述,却联系起来。他以这种方式表示反对我们,在他发言以后,我们就公开声明,我们已不再认为他属于我们党了,这声明使他的信徒非常厌恶。哈赛尔曼的名利欲因而完结,于是他留下相当多的债务而转到美国去,在那里他不久就脱离运动。

也在这个论预算案的发言中,我第一次谈到馮·哥尔茨先生的书,《莱昂·甘必大及其军队》,自此以后我曾多次在我的发言中以頌揚的方式提到它,利用它来支持我们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馮·哥尔茨先生因为他的书的问题而贬职,但依法他却属于参谋部。这位当时的上校,大家知道,后来成为大元帅,不过他书上那些要求并未实现。

在那次会期中,我还犯了另一过失,引起了对我的攻击。在辩论新军事议案(七年预算,由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八年)时,我回答对我们的攻击说:“如果发生有一个国家想占领德国领土,则社会民主党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来反抗这个敌人。”因此,一个未具名的南德意志的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攻击我。我答复说(在第十六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所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不收回,并且结尾说:“万一在一次战争中,为了德国的土地完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一同捍卫这辉煌的本国行政体系——党的死敌,则社会民主党的遭遇可能十分艰苦,但是社会民主党将不借外国征服者的力量来消灭它的死敌,而只是通过自助,通过统治体系的横暴太甚而最后激起群众的反抗来消灭它的死敌。当有一天在我们保卫本国免于分裂和保卫自己免于奴役(不是保卫我们的敌人及其暂时性的制度)之时,我们参加防御,这不是‘为我们英勇的警察和法官防御敌人’,如南德那个可敬的同志所讽刺的,而是要取得行动自由,以便在本国同我们的敌人清算。可能有个时候,一位俄皇带着他的军队来到柏林,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很愉快,但是党

自己将很不舒服。

我三月二日的发言中沒有絲毫放弃我們的立場，因为我們在一個卫国戰爭中所捍衛的不是我們的敵人及其制度，我們捍衛我們自己和国家，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我們想按我們的意思来改革的，这个国家也是我們活动的唯一場所。”

維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一八八〇年春季，我們普遍認為需要召開一次較大的黨代表會議，這只有在国外可以舉行。第一，必須完全澄清黨對於哈賽爾曼和莫斯特的詭計和煽動的态度。第二，黨有必要闡明國內局勢并對此作徹底的討論。第三，黨必須听取有關《社會民主黨人報》及其推廣情形的報告。最後，必須對於明年國會普選的宣傳措施取得一致意見。蘇黎世的人和我們意見一致，認為這次會議是有必要的。我於是在三月二十九日通知他們說，我們決定，在國會正式閉幕後兩天在羅曼爽或者羅沙赫集會。國會可望在聖靈降臨節前不久閉幕。會議的邀請由《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部和發行部發出通知，我為這擬了個稿子附去。在國內發寄邀請通知的事由我們來辦。人們在各方面都要保持和提倡極大的謹慎。

這不過是說得很好。還在能夠舉行集會之先，蘇黎世州政府已經聽到風聲并訪查到這事的真像。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報》在五月十六日的一期上通告說，原計劃聖靈降臨節那一周在瑞士舉行的集會由於各種阻礙不能舉行，必須延期幾個月。這個通知未能早日發出，致使許多代表，其中有莫斯特，當接到通知時，已到了瑞士境內。

莫斯特借這機會也來到蘇黎世。在這裡同志們召集一次集會，

在会上，他在每个发言人之后都讲话，来申述他控诉党的理由。最后大会要求，《自由》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的笔战由现在起停止。但如果《自由》报无节制地继续对党攻击，那末人们就不得不把靠该报的信徒开除出党。

莫斯特让步了并且允诺服从决议。但他一到伦敦，就把旧的斗争继续下去，竟否认停止向党进攻的诺言。

圣灵降临节的集会成为不可能以后，我们即须从事于召开另一个会，关于这事我写信给苏黎世的人们说：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朋友们！

日期今晚可以决定，哈赛尔曼的事也在今晚同时决定。如果决定的日期早在八月半以前，我就不能来……马格德堡发生了一系列的逮捕，由其中一人那里查出你们的一封对我们大加攻击的信。

你们由此给我们一个恶毒的打击。你们把我们狠狠骂一顿，倒是真正的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确定，你们以这封信供给了长久寻找的反对莱比锡的武器，人们将利用这个武器。

我却认为，像现今这个可能发生并且真正发生形形色色的意外事件的时期，你们不应那样感情用事，而应保持冷静谨慎。向这里来质问我们怎么阻碍一个报纸的推销，这暂时就足够了。此外，你们应加倍避免向这里开火，因为这事汉斯等人已经干够了。我们要看看，马格德堡事件结果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报纸是否被破获了，写信人没有提到，我们须先探询。

因为这里并没有禁止推销，我们自然没有什么禁令可以取消；在这方面你们又一次受了误会的害，你们原可以免去许多烦恼的。那末再说一遍：即使在你们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时候也要好好保持冷静……

集会这件事被破坏，使我非常生气，因此许多人白白地作了旅行。如果人们立刻把决定延期的消息通知我，则一切都还能很及时地加以安排。此外我确信，延期没有什么损害，相反地，有些现在短时间不能来的人以后却会来。——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晚上决定，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日为代表大会的日期。没有人赞成提前，许多人却赞成推得更迟。主要原因是：我们必须筹款，物品现在贵多了。讨论同往常一样，从星期六的预备会开始。

地点由你们规定。如果你们不愿使用罗沙赫，就用圣加侖，干脆用苏黎世不好嗎？

我认为，由于秘密警察之故，关于确期我们暂时应严守秘密，反之可把会期大概定为八月，随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正式公布，并且要再三要求那些想参加大会的人在你们那里报名。但是不要公开使用代表大会字样，通知上用谈话会，这使我们以后容易在法院作辩护……

反对哈赛尔曼和莫斯特的声明，各按各的样式，星期一議妥 132
了。哈赛尔曼是由柏林人选举出来的，却不敢接受委任，现在这个坏蛋竟抵賴說，人们原可以好好地在德国土地上举行会议，这对于我们纯粹是浪费钱。你们最好在編輯信箱上登个随便给哪一个人的启事說：‘能够在德国召开一个或许要许多天的巨大集会，以讨论全党事务，这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才会相信。’

我下星期一起程去旅行，差不多一直到六月底，請将一切信件安排得可以给较大范围的同志看。如果你们有对我个人的特别事项，請以特别函件寄给我。

你们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这时苏黎世的人们想到一个好主意，不在市内，而在一座古老的維登宮举行集会，这座宮很特殊，位于图尔河岸欧星根村附近的

一个山崗上。这古老建筑物属于一个巴塞尔的先生，他把这座宫及其附属建筑租給我們使用几天。在一座附属建筑物里面設置了草垫同毛毯，备作众人宿舍之用。紅色邮政局长认为，欧星根的旅館主人未必友好地接待我們，但后来证明，他猜錯了；如果我們在村庄中来来往往，我們就未必能秘密举行會議。因此，罗曼爽的德意志协会的主人及其妻亲来担任款待宫中出席會議的人的事务。

133 在我們从欧星根車站走上村庄周围的道路往城堡去的时候，农民站在田地和葡萄园里扶着他們的工具惊奇地、搖着头目送我們。当夜晚在这古老的建筑物里点起灯火，演讲人的声音由敞开的窗子响彻爽朗的秋夜时，他們还更要惊奇。但是夜越深，我越不喜欢夜晚将用草垫的前景。我幼年学艺时期的記憶忽然涌上心头，使我吃惊。此外，我也不相信紅色邮政局长的意見，即使我們出好价錢，欧星根的店主人仍将拒絕供給我們飲食。我暗地里向李卜克内西解释，我們到下面那里定然会找到比这高处好些的住处，并且約他同行。他表示願去。这样我們就离开了这伙人。果然不出我所料，村中“猎鹿”酒店的主人非常和藹地接待我們，拿美好的土产葡萄酒，塗新鲜奶油的黑面包和出色的瑞士干酪慰勞我們。店主人一再表示惊奇，为什么“先生們”寄宿在旧宫里而不到村里他們这里来。

当我們次晨又在城堡出現时，引起了各种的嘲笑。但是恶例败坏了好意图。宮中副建筑物的住处决不再是理想的了。而且有一群爱吵鬧的汉子大肆喊叫和騷扰，以至人不要打算睡觉。在第二晚，开小差的人数就大大增加，到大会結束时，夜間在故宮中坚持不去的人，只剩下寥寥无几了。

欧星根人以惊人的方式向我們表示感謝。次年，应在苏黎世举行国际代表大会。自由主义者使出一切翻天覆地的手段，使政府禁止召开大会。他們在州里募集三万多人签名要求禁止，但沒

有一个欧星根的农民签名。这更足以说明，他们已认识了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知道他们都是正派人；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不准这些人在苏黎世举行集会。

参加維登集会的代表共計五十六人，其中包括所有德国的有名的同志。出席者有：奥艾尔、伯恩施坦、比尔克特（达姆斯塔德）、加尔維、格罗伊里希、弗里茨舍、弗罗梅、格利伦貝格、哈森克萊維尔、希尔曼（爱北斐特）、考茨基、M. 揆格尔、賴恩得克尔（美因茨）、李卜克内西、罗文施太因（佛尔特）、莫特勒、鄂尔敦堡（阿尔托那）、施吕特尔（德累斯頓）、陶舍尔、烏尔利希（欧芬巴赫）、瓦尔特希、法特（汉堡）、福尔馬尔等等。

哈森克萊維尔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关于德国国内局势和财务状况由我作报告。此外，我也是莫斯特的活动的报告人。奥艾尔作汉堡—阿尔托那区的金庫收入及其使用的报告，弗里茨舍作关于特别为柏林被流放者及其家属募捐的报告。此外，奥艾尔传达了哈赛尔曼的分裂企图的报告。截至一八八〇年八月一日为止，总共收入約三万六千零四十四馬克，其中經我手付出的是二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馬克。由我付給柏林被流放者及其家属的計一万零七百一十馬克，給別处被惩罚的和坐牢的同志及其家属的是五千二百馬克，三次国会会期付出日貼二千零三十二馬克，罰金和拘押补偿金二千四百一十六馬克等。工資一个錢也沒有付。（社会民主党人报）另行結算。除了这些交到中央机关的錢之外，还有大宗款項是由各个地方收支的。

汉堡的一批柏林被流放者提出一个长达二十一頁的抗議书，它主要是对議會党团而发，特别攻击錢的用途。一个柏林的出席代表梯特把抗議书交来，声明他依撰稿人的願望把抗議书轉交来，但他声明不同意抗議书的内容。为了使柏林同志能清楚認識出納处情况，梯特被选入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一致決議，建議大会核准

这个十分妥当的出納管理。大会就依此一致通过。后来才知道，抗議书的撰稿人是一个被驅逐的柏林人——独眼的沃尔弗，他被揭露是一个为柏林警察服务的間諜。此外，大会还一致決議，同意議員們所持的态度及其所遵守的策略，并对在困难处境中做工作的党的先鋒战士表示信任。

135 在进行一般討論时，施吕特尔建議，把綱領中的“合法的”一詞刪去；党是非法的，它不可能作合法的活动，用合法手段达到目的的保证，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在短短的討論后，建議被一致通过。这个決議以后在国会内外和在法院审讯中引起很大的喧囂。这是毫无道理的。人們不是把決議当作党的处境的单纯結論，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推翻以往策略的革命行动。

关于开除哈赛尔曼党籍一案的討論占了很多時間。党团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布一篇号召，其中要求开除哈赛尔曼，因为在前面叙述的国会发言中他声明与俄国无政府主义一致。党团对他的声明答复說：“这話意味着与党并且特别与我們断絕关系。我們欣然接受这个断絕关系的声明。这有助于（現在特別必要的）澄清我們的队伍，把这样一个人清洗出党，他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七五年代表大会上統一之日起，只是勉强地在表面上属于党而暗地里却不断地、有計劃地对党阴谋叛变。毁灭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創立一个哈赛尔曼党——这就是哈赛尔曼先生按着他的本性，通过各种阴谋和挑撥以不正当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

党团給这个控訴立刻提出证据，公布哈赛尔曼一系列的信件，由信件可以看出，他如何有系統地作反党工作并且想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后（一八七六年九月底）利用他所創办的《紅旗》报来破坏刚才造成的統一。

号召上繼續譴責哈赛尔曼，說他如何沒有一次有勇气把他的

发言在他自己的报上不加修改地刊登出来，而在他的报上他总是把他的发言改得和缓。党团要求，誰要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誰就离开它。“我們要求纯洁性。誰不赞成我們，就是反对我們。”

号召在結束时也轉而反对莫斯特，他的瘋狂行为和前后矛盾同哈赛尔曼先生的煽惑挑撥和詭計，都是远离党团的。这声明由全体議員签名，只有汉堡的哈尔特曼例外，他认为声明“不合时宜”。 136

奥艾尔以手头材料就毫不費力地证明，大会批准开除哈赛尔曼乃是理所当然。大会也以全体对三票同意开除。这三票中的二人声明說，因为哈赛尔曼由于他的活动，自己已置身党外，所以认为決議已不再有必要。

实际上哈赛尔曼在六月間已經无耻地公开发奥艾尔、德罗席和加尔維，說他們进行了一次违禁的募捐。汉堡的檢察署也为此进行一次預审，但无結果。莫斯特在《自由》报上也无耻已极。对他的討論，其經過也不出所料。我由这堆积如山的材料中很容易证实他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把他看做已經脫党的人这一建議以全体对两票通过。

一批柏林同志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的信徒，企图用些特殊建議使哈森克萊維尔、李卜克内西、凱泽尔和我在代表大会上为国会的发言負責任，但是他們遭到惨敗。代表大会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表现出惊人的完全一致。大会也完全一致地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并建議参加国会、邦議會和市区选举，而且考虑到鼓动和宣传方面的利益。

此外还決定，全力参加秋季国会选举。在复选时党员同志一般应弃权。其他的決議是：同意在苏黎世創办的国外連絡站，贊成召开比利时同志所发起的国际代表大会。

在維登宮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一时轰动了德国的警察和輿論界。警察灰心丧气，它必須承认，虽然它具有巨大的間諜机构而仍 137

不能找出大会是何时何地举行的。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我们竟还能召开代表大会，感到震惊，它们尤其震惊的是，在大会后不久，在柏林的《论坛》报和《马格德堡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苏黎世同志示意的高度传奇式的描写，使整个事情显现出冒险色彩。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有趣。维登代表大会对党内的气氛起了极好的作用。单是举行了大会这一事实就已经大大振奋人心。人们又一次聚集在一起，老战友又见了面并且彻底谈谈，无论哪里存在的猜疑都被消除了；每个人的勇气都显著提高。大家都勇气百倍地抱着决心回家，要使维登所播的种子发育成熟。

我们敌人的最初惊愕过去之后，敌人报纸掀起对瑞士的挑拨，以《十字报》和《国会議員》报为先锋。它们要求把叛徒由瑞士驱逐出去并建议策划一次叛国诉讼。但是《十字报》和同类的机关报要求瑞士无视逃亡者的避难权而将政治上可恨的人驱逐出去，这个要求只得到一个结果，在九月间开会的瑞士法学家会议表示非常坚决地拥护避难权。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要绝对地加以维持。瑞士在批准避难时要抱着宽宏大量的原则，但是有理由把间谍、秘密诱捕者和类似的流氓赶出去。永不能为取悦外国而发布驱逐令。

警察和法院在维登会议以后又重新热心于迫害我们。于是布勒斯劳初级法院企图把所谓当前的秘密联系竭力造成一件讼案，并且为了这目的把三千多人的信件查封了。布勒斯劳的全部邮务都被打乱了，遭受巨大的业务损害。结果毫无所得。

L38 就是在莱比锡，警察也越来越仇视我们。在我们头上渐渐阴云密布。在快到九月半的时候，我们约四十人聚在一起举行“生日庆祝会”，警察忽然冲入酒馆，把我们全体都逮捕了。在众多警察押解之下把我们领到警察局，进行审讯。大群的人伴随着我们。这个手续费时二小时半，毫无结果，而后把我们释放。这一事件的唯一损失是俄国的蔡特金同志，他在莱比锡当排字工人，也参加“生

日庆祝会”作客。他被驅逐出境。

在我家里又进行了一次枉費心机的搜查。我也发现，检察机关对于一位声明願作我的信件的掩护收件人的太太，宣布封鎖她的信件。由此落到檢察官手中的信件却不足以作为起訴材料。我也立即关照取消掩护寄信处。

斗争在繼續进行。在九月二十六日的第三十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而經同人同意的号召书，署名是：“德国，九月十八日，党领导机构”，其中提到維登代表大会时說道：

“……处于党目前在德国生存和斗争的这种情況下，我們的任务是非常严重的和困难的。包围我們的敌人想消灭我們，他們手里掌握有充分的反动立法手段，用‘法律的名义’来鎮压我們，我們再說一遍，只有勇敢配合着智慧才能保证我們成功。

在这些条件之下每一保证成功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每一个地区的党员同志的事情是选择和采取他們认为是最可靠的达到成功的适当方法和途径……

因此，你們組織起来吧，一律像……到处組織起来，一直到最辽远的我們有信徒的地方，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命令。 139

第二是：不倦地鼓动以爭取新的讀者和訂戶来传播我們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三个命令是：在各地以各种形式經常为鼓动和救济的目的募捐款項……作战需要金錢，金錢，还是金錢，因为党經常作战，所以也經常需用錢。”

接着我們劝告要謹慎小心。

“你們要小心，你們必須特別緘默——到处都有間諜——，但是你們不可胆怯。”

然后接着指出各人应持什么态度。最后又一次迫切地劝告各

个选区关于下次的国会选举要組織起来。人們也应为选举募捐，并且对于候选人要取得協議。

除这里节录的党领导机关的言辞外，苏黎世国外連絡站却认为必須发表一篇类似宣言的东西作为传单发出，其中对維登決議的一种解释是我們不能也不許可同意的，因为它給檢察官为将来的訴訟提供一个重要材料。我們在萊比錫对国外連絡站这个行动的看法可以由我在九月十八日写給苏黎世同志的信里看出来，信里說道：

“……結尾还談一談这里近来甚囂尘上的一点。这就是关于《馬格德堡报》上似乎全部刊載的那篇宣言。

我們对于这个文件一无所知，我們也不知道这个文件有什么目的，这大概就是W.^①在他的信里所說他向代表大会致賀(来自国外)的那封复信。这个简单事实证明了，我們处在多末痛苦的地位。

我奉命声明，我們全体对这类行动提出抗議，如果再有此种行为，定將在我們和連絡站之間导致不可挽救的冲突。

我在这里不願談論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形式和笔調，虽然对于
140 这个也曾有过很不利的和很严厉的評判，我也觉得，好像你們不惜任何代价必定要超过莫斯特似的。

但是大家取得一致的是关于連絡站在一件非先拿給我們审查和判断不可的事情上竟擅自行动。連絡站不是个特殊机关，它不能也不許独断独行地向世界发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使我們負責的文件。这样的責任我們是不負的，并且像連絡站在当前情况下对待我們的方式，也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这里所做的事情，沒有不是事先經過同事的討論的，我們必須注意，每一規定要发給广大范围和要公开的文件，具有或应具有公

① 大概是瓦尔特，亦即福尔馬尔。——編者。

务性质的，事先都要給我們看，不得提前发表，也不得更改我們先前的討論所规定的来发表……

毫无疑问，代表大会和其后的一切激起了我們敌人的无比愤怒，有系統的摧殘和相应的迫害将不可避免。这种迫害势必还要加剧。

我們让与連絡站的权利是同国外同志通信，如果认为有益，可給与解释和报告，以及收取款項。但是一涉及以任何方式要牽連广大党员的文件，我們就必须坚持，把文件通知我們并及时地取得我們对它的同意……我相信，这只是理所应当。因为领导机关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苏黎世，所以那里若不事先告訴我們，就不能办理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这个宣言給我們敌人什么印象，見于馮·普特卡美尔先生一八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在国会中反对我們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宣讀了宣言，以便在宣言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危险的革命性质。并且在十八年以后（一八九九年），这宣言还关系到党员同志阿龙斯博士离开柏林大学讲师职位的問題，他的控訴者又是根据那个宣言，141說它是当时党领导机关的正式文件。

我对于当时情况的理解，在下面給恩格斯的信里也談到了，

“萊比錫，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二十七日的信，我使您等到今天才得复信。这个长久的耽擱，我可以請求原諒，因为从那时起到九月初止，我除短期間断外，几乎全是在旅行中。而这短期的間断又为其他工作所占用，以致无暇作复。

在隔了这长時間以后，我不想再回到您信中所提及的各种私人事件上去。

如果您把我盼望已久的您和馬克思的像片交由李卜克內西帶

来，我就非常愉快了……靠著再版的情形，李卜克内西当可奉告；我曾請求他来办理这件事，因为我由于上述原因无暇及此。我若沒有完全搞錯的話，您的著作也遭到以前不久在布勒斯劳所遭到的沒收。显然是叛卖在捣鬼，叛卖如何到处与拙笨一同扮演着不同程度的重要角色。一点钟以前，有人告訴我說，一个同志有叫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嫌疑，遭到搜家。这只有被出卖才会发生。搜家的結果如何，截至目前晚上九点钟，我还不知道。当事人今天下午还偶然在我这里，当他不在家时，警察闖进家里。这情形您可以通知李卜克内西，他会对此关心的。

142 各种迹象暗示，在最近期内这里会有几个重大打击到来，这就是說，如果人們能为此找到材料。代表大会使他們异常烦恼，萊比錫被认为是一切这种事件的祸首。我們这里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向过着安宁閑适的生活；这生活现在到头了，我們必須鼓起勇气。

关于大会經過，您由《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可以知道一些，最重要的討論自然須保密；大会的經過，总的說来，是使我十分滿意的，它在德国同志中間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莫斯特相信能用虛假的描写和仇視的批評給人以巨大損害，他就錯了。他的信徒总共也沒有几个。公然投归无政府主义陣营，像他特別以最近一期报的社論和社論后面所轉載的巴枯宁革命法則所表現的那樣，則对他更为有害。

我該认为，因此却也正好是您和馬克思来声明与莫斯特沒有关系的时机。您也許答复說，这沒有必要，因为您根本沒有声明过贊成他。这种理解不对。莫斯特在許多函件中自夸得有您和馬克思的贊同；馬克思有几次出代收报纸訂費的收据，这种情况使不明了內情的人得到好象还給莫斯特物质援助的印象。事实上，莫斯特也把这一切，特别是在奥地利，大事宣传。我現在并不要求您声明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不要要求您把声明寄給它。这件事情

可以用對您們很容易的方式這樣辦妥，即您們給我們任何一人寫一封作為回答有關詢問的信，由收信人（他可勿需具名）把您們的信加以發表。這對您們和對我們都會有好的作用。您和馬克思的完全消極態度常常遭到不利的批評，所以一般人盼望您們積極參加並且說一說您們對於時代的想法。

您在最近來信中所說的，我們敵人的一切活動最後如何總有利於我們，尤其是俾斯麥的忙忙碌碌和破壞活動如何有助於我們的工作，這您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單只這樣，我們沒有一個人會滿意，我們必須把那個人所掘的坑挖得更深，並且把他的活動以及不斷的普遍災難所造成的不滿，用力煽動起來，在這方面，您們必須同我們一樣予以協助。

俾斯麥作了貿易部長，使我們感到很有趣的驚訝。俾斯麥在這裡已陷入使他一定咬牙切齒的境地，加之在這種境地上除了播下極端不滿情緒而外什麼作用也不會有。他若真正制定有利於工人的法律，那他就第一，遭到整個資產階級的反對，而且第二，他也不能贏得工人的同情，因為他即使以最好的心願也只能提供不徹底的辦法。在他迄今所擔任的一切職務中，他現在所接受的，就是將來最徹底毀滅他的職務。

還有一個好處是，通過他的措施所必然引起的激烈筆戰激起了漠不關心的群眾，並且強迫他們參加公眾生活並在公眾生活上表示黨派性。這又是对任何人沒有比對我們更有益了。這一切都是這樣有利，所以我們也必須利用這形勢。如果您們能決定現在公開出面一次，我可否這樣說，您們把形勢加以理論上的闡明，這就會起巨大作用，而且您們的意見將不只一次為我們的敵人和俾斯麥的敵人所引用。

我們這裡非常忙於目前的日常工作和各式各樣往往細小瑣碎的事情，以致缺乏做這種工作所必要的時間和專心，再說您們懂得

的远比我們彻底。所以請把不悅之色拋掉吧。

我非常希望能到那里去一趟，和您們亲自認識一下，不过这一次又不合适，将近下月底或許可以。其余季节，包括国会会期在內，我的业务和业务旅行非常繁忙，实难分身。但是，不管怎样，毕竟要聚会一次。

謹向您和馬克思致以衷心的問候。

您的奧古斯特·倍倍尔。”

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十月初，发生了一件事，普魯士借口第二汉堡选区的国会选举的結果，向汉堡提出宣布汉堡小戒严，同时普魯士也宣布阿尔托那、欧登森、王茲培克及其周围小戒严。但是汉堡市政府拒絕了这无理要求，它相信沒有这种强暴手段也能維持治安和安全。汉堡当时对待維登代表大会把“合法的”一詞由綱領中删去的決議较为客观，可見于半官方的《汉堡通訊》中一句話：社会民主党用这个決議只是把由非常法对它开出的票据兌現了。

如果說在汉堡起初不倾向于对普魯士的压迫让步，却并不是說那里对待社会民主党就是寬容的。相反，从頒布非常法那一时刻起，警察和法院就携手合作以最严酷和肆无忌惮的态态出現。控訴一个跟着一个，懲罰达到所能宣告的最严厉的程度。当最后汉堡市政府仍屈服于普魯士的压迫，于十月二十四日宣布小戒严的时候，有大批人被驅逐出境，这表示汉堡共和国可以与普魯士警察国家竞赛了。第一次就有七十五人由汉堡驅逐出境，其中家长就有六十七人。几年以来由汉堡驅逐出境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五十人以上。与汉堡同时，阿尔托那、欧登森、布兰肯內斯和威代尔等地，

包括俾斯麦侯爵的地产和劳恩堡在内，也都宣布小戒严了。总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公里。

被驱逐的人中间有奥艾尔(他在一年之内遭到两次这样的命运)、布洛斯、迪茨、加尔维、普拉斯特、两位卡培尔等。几个月后，《裁判报》因为一篇论俄罗斯情况的没有什么内容的文章而被封145閉，因而又有一批人的生計被毁灭，形成巨大的物质损失。迪茨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把一八七六年創办的印刷合作社在形式上买了过来，现在这件最艰苦的工作落到他头上。他要为许多生活无着的人筹措工作和款項，他和一批流放者到哈尔堡去，必須由那里作出一切安排。但就是那里也不是他們停留的地方。不久以后，普魯士也宣布哈尔堡小戒严并强迫汉堡的流放者四散。迪茨往斯图加特去，在这里他接收了在莱比錫不能維持的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后来同《新世界》报一起迁往汉堡。奥艾尔寻找不到工作，遂加入他的岳母在石威林开设的生意，他原先是皮匠和裱糊匠，所以他能好好地干生意活。布洛斯往不来梅；大多数由北方戒严区被驱逐出来的人都流浪到大西洋那边北美洲去了，其中有摩尔肯布尔。

党的经济刚在开始好转，就来了汉堡—阿尔托那这一很为不利的打击，但应贊揚汉堡—阿尔托那同志們，他們用自己的力量擋住打击。迪茨有一天曾由我这里为汉堡的流放者求到一千馬克，这笔款項由汉堡同志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归还了确有一百倍之多。从一八八四年起，我在德累斯顿附近普劳恩市住家时，汉堡的代表团每两个月总有一次在我这里呆到深夜，他們是受欢迎的客人；他們总是滿載而来，每次輸入金庫的至少五千馬克。

一般說来，汉堡—阿尔托那的打击起了与在上者所期望的相反的作用。一个激昂的运动貫串到群众中间，并且反抗“在上者”；普遍的口号是：要牺牲什么就牺牲什么。从现在起经济困难逐渐消除，到处都开辟了来源。

柏林曾有人希望，在柏林及其近郊重新宣布小戒严的同时，薩
146 克森政府也对萊比錫及其近郊宣布小戒严。但是我們的末日还没有到来。

李卜克内西在开姆尼茨一个集会上的演讲招致了六个月徒刑，于十一月中旬須开始服刑。鉴于福尔馬尔通知在一月一日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职位，这次徒刑非常讨厌。他不願由于久当編輯而使自己不可能在德国任职，像莫特勒和伯恩施坦从他們的活动中产生的結果那样。他不願放弃他在德国政治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这些事情，我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四日写信給恩格斯說：“亲爱的恩格斯！

这一次我又使您等了好久才复信，可是这中間情势更清楚了。福尔馬尔通知辞去他的报纸編輯职位，拟于一月一日去职。所以我們不得不进行一次新推选，我們于星期三举行了这次推选。

希尔施当选为編輯，但首先却是临时的，并且是在克服相当大的反对以后才选出的。我必須明白地說，这反对不是因为害怕改变制度，而是反对他在《灯笼》报期間的某些輕举妄动，也反对他那些人們认为可以指責为倾向于私人报复和落落寡合的性格。此外是：希尔施是不守紀律的人，喜欢独断独行，所以人們恐怕不久会同他发生冲突。希尔施在最近期間在《苏黎世邮报》的通訊中还以极粗暴的方式攻击党内个别同志，这使那些贊成希尔施的人的处境更加困难，而贊成他的人本也只有两个（李卜克内西和我）。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希尔施必須放弃对党内人員的任何攻击，特别是对赫希柏格，我同意这个意見。如果您們认为党内的意見是那么一致，那你們就錯了，这你們由甲和丁两章中可以看出来。
147 领导人多数或多或少地倾向于那一方面。只是人們觉得自己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在編輯方面能够因此既尖銳而又客观，

尤其是倘若希尔施能达到既为群众所喜而又能鼓舞群众的笔调，那末，希尔施就算胜利了。

我在这里不再多作分析。希尔施本人曾那末尖锐地攻击编辑部，现在他有责任表现他能做事做得更好。如果他像他在我们的叛国案审讯时期编辑《人民国家报》那样来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我就对他满意和同意了。

关于我们对赫希柏格等人的态度，我记得以往曾写信说过，赫希柏格对报纸曾有重大贡献而且还在作出贡献，但他迄未对编辑部妄加干涉。考虑到赫希柏格一向的牺牲精神及其个人的高尚品质，我们希望希尔施放弃任何敌对赫希柏格的行为。虽则赫希柏格仍然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正派的、可以相交往的人。

可以预料，赫希柏格不会欢迎选任希尔施，我认为，这件事希尔施方面应负较大责任。但是赫希柏格也不会反对，即使反对，也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我大概可以假定，通过希尔施的当选，可以充分向你们表现出，报纸并没有外来的影响。

有了良好的编辑部，我们可以希望短期内读者范围扩充到报纸不要第三者帮助就能经久维持下去，并且如果还有您和马克思参加给它写作，也将给它以十分重大的促进。我很希望，你们下次的信里予以同意。

目前我们还在躲避戒严，躲避多久，只有天知道。有时候高高在上的先生们又互相冲突起来，这丝毫不能损害我们。我很想知道汉堡戒严的动机。可怜的市政府将不容易隐藏真实的动机。

附件请交希尔施，并请同他再彻底谈谈。

148

谨向您和马克思致以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伦敦的卡諾沙^①之行

使希尔施被推选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的一些情况，和党领导机关的多数派对这次推选所存的顾虑，使我认为现在是开始那计划已久而总是推迟的伦敦之行的适宜时机。希尔施当时住在伦敦，我可以立即同他討論。此外，我也希望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希尔施所很仇恨的伯恩施坦一起到伦敦的獅子洞里給他們看看，他并不是二老心目中那样的坏东西。說到伯恩施坦本人，他在苏黎世的生活和每天向那里报道的德国情况，已造成迥然不同于李希特爾年鉴中三星文章所流露的情緒。我暗中还存着一个希望，如果希尔施拒絕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可以做到使伯恩施坦代替他。如果真如此，則有必要在新編輯人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取得一个可以容忍的私人关系。因此，我請求伯恩施坦同我一起往伦敦作卡諾沙之行，对于这他立即表示願意。我們在加萊港相会，因为伯恩施坦有一切理由避免踏上德国土地。

到达伦敦后，我們首先拜訪恩格斯，那是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間，他正在进早餐。恩格斯有个习惯，夜里二时以前从不休息。恩格斯非常亲切地接待我們，他立刻就同我以你我相称，我們下午去拜訪的馬克思也是这样。今年成为裸夫的恩格斯并且邀我住在他那里，当然要利用我們在这里的日子就各方面彻底交換意見，在交換意見过程中伯恩施坦显然赢得了二人的信任。在我們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恩格斯较为活动和較少牵挂，所以常充当向导引我們

① 卡諾沙位于意大利的亚平宁山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于一〇七七年一月到这里向教皇悔罪并表示臣服。——譯者

游覽倫敦的古迹名胜，这时保尔·辛格尔也参加，他正在做每年到英国来的业务旅行，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在我们当时在伦敦所度过的唯一的一个星期日，马克思把我们全体请到他那里去吃饭。燕妮·马克思夫人我早已认识，仪表雍容大方，立刻博得我的好感，她善于以极其可爱和殷勤的方式招待客人。在那个星期日，我也认识了与龙格结婚的长女燕妮，她是带着小孩们来省亲的。在这里，我十分惊喜地看到马克思，这个当时到处被人诽谤为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人，多末亲热温和地同他的两个外孙玩耍，而小孩们又怀着什么样的爱依恋外祖父。除长女燕妮外，还有两个小女儿：杜西（即后来的阿维林夫人）和劳拉（后来的拉法格夫人）。杜西是黑头发和黑眼睛，极像父亲，劳拉是淡黄色头发和深色眼睛，更像母亲，二人都美丽活泼。

外来人所感到惊奇的是，夫人和小孩们都称呼马克思为摩尔，好像他没有其他名字似的。这个名字是由他那漆黑的头发和鬍鬚而起，这些除鬍鬚外当时都已苍白了。恩格斯也有个亲密的绰号。马克思家人和他的亲近熟人都称他为将军，并且是用英文音读如：“靳訥勒耳”。这头衔来自他特别喜爱的对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人们认为他对军事和战术具有权威的见解。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又到马克思家时，马克思夫人患病卧床。由于我请求告别，马克思偕我去见她，但严格嘱咐同她谈话不得超过一刻钟。但是我们立刻就交谈得这样兴奋，我完全忘记她的情况，以致谈了不是一刻钟而是半点多钟。忍耐不住的马克思进来申斥我说，大约我想要他的夫人的命吧？我悲悲切切地向她告别，因为她的病是不治之症。我没有再见她。她在次年就亡故了。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事宜，希尔施在许多如果和但是之后，在由我以领导的名义拟就的条件下，声明同意担任编辑并迁往苏黎世。

整整停留八天后，我們滿意地离开伦敦。伯恩施坦取道巴黎回苏黎世，辛格尔和我同行到科伦，在这里我离开他。我原认为同希尔施已彻底搞清楚了，但很快就证明我錯了，由下面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

“亲爱的恩格斯！

希尔施的事是这样解决的，希尔施留在原处不动，并且不接受編輯职务。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接到他的一封信，同我們的約定完全相反，在信里他重申人已熟知的对苏黎世人的非难，声明不往苏黎世而想在伦敦主持編輯。这封信我昨日在集会上宣讀了，李卜克内西也在座，于是这事彻底失敗。我們現在一致认为，希尔施既然簡直不想离开伦敦，而我們这方面又不可能博得希尔施的欢心，并且沒有外面的压力我們不能也不願接受他这有計劃的反复无常，所以他的信我們理解为拒絕信，并且今天我与此相应地答复了他。

为了免得我重复一道，請你們向希尔施索取我的信来看。

事情是这样布置的，報紙的主要領導是李卜克内西，由他写社論和政治概要，考茨基办理通訊和編輯部的技术事宜。这安排效果如何，必須从經驗得知，我的希望不大。我請你們（你和馬克思）尽力支持李卜克内西，尤其在他坐牢期間。

151 承寄茶叶、威士忌酒等幸而到达，留待享用。我妻囑致衷心謝意，我在伦敦时多承照拂，謹一并特致謝忱。

这里工作堆积如山，都等我清理，假期来得很是湊巧。此外一切如旧。李卜克内西有二十四小时的假，昨天下午又入獄。除夕他又可获得自由二十四小时。这里的人們还規矩。

謹向你們大家，特別是馬克思閣家致衷心的問候。

你的奧·倍倍尔。”

考茨基拒絕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他不打算长期停

留在苏黎世^①。于是伯恩斯坦先临时代理福尔马尔的位置，他，如现在所表现的，我们得到他，是获得了适当人选。伦敦人也声言，他们对于新年以来编辑部的情形感到满意。所以我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二日报告恩格斯说，我今天写信给伯恩斯坦，问他是否愿意正式担任编辑。他若接受，我们就去了一件大心事。伯恩斯坦虽然并不乐意并且拖延很久，但最后还是正式接受了。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报纸所需要的编辑人。

在所说的那封信里我继续写给恩格斯说：

“关于李卜克内西的萨克森邦议会的发言，你所写的那些，我没有完全照办。我有一个时期放弃了领导。他特别是在萨克森邦议会中，由于Fr. 和 P^② 的促使，过于和气。再加上他一向过多地单纯重视政治，因此对经济情况及其发展就注意过少，从而必然趋于错误的理解。

你如果能附着把你对于他的邦议会发言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那就好了。一个这样的作用尤其是重要，因为多数‘领导人’比李卜克内西更为片面，而且陷于危险的悲观情绪。 152

幸而群众同往日一样比领导人还好些，有一天会跨过领导人而迈步前进。当我们交换意见，我斥责那些片面地、歪曲地判断我们的情况并几乎完全缺乏对群众的信心的人的时候，这话我已毫无掩饰地说过多次了。

我真不了解，在我们的状况之下还有人不是抱着希望来看将来。无疑的，他们使我们本身不愉快和厌恶，但是由于完全另外

① 当时情况我已记不起了，但觉得倍倍尔在这里弄错了。我当时并没有离开苏黎世的意图。如果说我拒绝了，那首先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还从未在德国生活过的奥地利人，不能自信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对德国政治能有正确的理解。我认为伯恩斯坦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更适当些，但是我也参与工作，直到我去创办《新时代》报时为止。
卡·考茨基。

② 夫根塔格和普特利希。——编者

的原因，他們也使我們多數的敵人而且直到統治階層不愉快和厭惡……

如果有人裝做一個偽善的人到商人和廠主中間去聽聽他們的真心話，那他所聽到的是很有趣的。俾斯麥及其體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挨罵。下次選舉會有強烈的反對色彩……

你們不能為李卜克內西在英文報紙中搞一個中等稿費的通訊職位，在對於自己毫無損害的情況下為它寫稿嗎？李卜克內西出獄後必須向這個方向尋覓較多的收入，因為單是我們報紙的酬勞不足以維持他的生計。

請順便把幾個轉信地址賜告。當時所告訴我的地址，上星期日在布勒斯勞，當我在赫普納住宅中有四個警察光顧的時候銷毀了。當時我們有六、七個人在一起閑談，神聖的海曼達特的僕從希望弄到一次大破獲而突然闖入，並搜身和搜宅。唯一的發現是我寫給哈森克萊維爾而只起了頭的一封信，這信適逢有人來訪沒有写完。拿到這封信，他們辦不了什麼事情。這些老爺們在兩小時後垂頭喪氣而去。

向你們大家致以
友誼的敬禮。

你的奧·倍倍爾。”

153 在沒有作出關於恩格斯的幾點說明之前，我不能就此結束這一章；恩格斯本人是一個可愛的、和藹的人，他遵守着馬丁·路德的口號：酒、婦女和歌曲是生活的趣味，但是同時他並沒有忘記工作的嚴肅性。他直到死時，始終是個最勤奮的人，當他七十高齡的時候，還學習羅馬尼亞文，並且對一切事情都是興致勃勃。——他總是活潑和高興，對於各種各樣小事情和他那多風波的生活中的可笑情景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他在歡樂的宴會中拿這些可笑情景招待客人，從而使談話饒有趣味。在他那里度過一個夜晚，是同他

往来的朋友和同志记忆中最愉快的事。谈话总是很活泼，不论是谈严肃的问题或者以欢乐事情为基调的东西，一概如此。恩格斯也是个善饮的酒客，他支配着一个相当大的酒窖，如有客人称颂他的酒，他就高兴了。

在清教徒的星期天，即每个喜爱生活的人都厌恶在伦敦停留的一天，恩格斯却开门延客。谁来都受欢迎，在早晨二、三点钟之前没有一个客人离开他的家。——我直到他一八九五年逝世为止，曾多次作他的客人，他也有一次作我的客人，这是当他在一八九三年经我不断催促才决定到大陆来旅行，并借这机会出席苏黎世的国际代表大会，随后访问了维也纳的时候。他在一八九五年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这好像我身上死去了一部分。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有这种感觉。

我也利用我在伦敦期间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作了一次关于德国社会政治情况的演说。虽然有莫斯特的很多党羽到场，竟无一人敢起来与我对抗。相反地，他们邀请我在他们召开的集会上为他们所提出的议程讲话。这我拒绝了。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154

会议是在二月半开幕。自实行新关税政策以来，其结果成为热烈争辩的对象，赞成和反对的论调都有。预算的讨论首先为此开辟了适当的战场。这次仍然如此。我以党团的名义作关于预算的发言。从一八七四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仍占优势，而在改善方面只露着轻微的开端。工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面照常特别艰苦，因为企业主都肆无忌惮地使用财政部长馮·康普浩森一八七五年所提出的办法，这办法是，只有在管理上勤俭节约，要求工人提高工作

效率和减低工資才可能改善經濟情况。这个建議曾引起欧仁·李希特尔議員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說：向一位敢于說出这样不得人心的观点的部长致敬。

我在发言中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彻底批判了現行經濟制度，这制度需要彻底改革，应使劳动群众感到幸福。但这种改革却不是今日的当权者所能办的，不管首相是俾斯麦，李希特尔或李克特。

三月底，汉堡市政府和普魯士政府关于宣布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小戒严的总结报告第一次提出討論，需时两天。报告是用这种报告所普遍特有的毫无意义的陈詞濫調組成的。党团指定奥艾尔和我为发言人。我們二人在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我相信可以說是讲得很好。继奥艾尔之后是馮·普特卡美尔先生发言。他第一次在国会中以普魯士政府对有关问题的代表身份出現。他立刻就表现出来他是哪种精神的产儿，俾斯麦在他身上找到了助手，他同样肆无忌惮地（但比俾斯麦灵活些）尝试着每一种暴行和把每个暴行都加以掩飾和辯护。他正是个只有在易北河以东长大的彻头彻尾的容克，以后才知道，他心似铁石，最残酷的手段是他最称心如意的。但在他执政的第八年，为已故的皇帝弗里德里希的旨意所迫而退位时，他必須承认，他对我們的斗争毫无結果。他誠然毁灭了好几百人的生命，把更多的同志送入監獄，而且他这个婚姻、家庭和所有制的教主和保护者却破坏了許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党是自豪地、不屈不撓地屹立在这里，較以往更为强大。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七年中間，在普特卡美尔治下所举行的三次国会普选中，党的票数由約三十一万二千上升到約七十六万三千，并开始使党成为一切政党中最强大的党。

普特卡美尔在对奥艾尔的答复中說：普魯士王国政府由这里的、薩克森王国政府自然不知道的事件中确信，萊比錫的危險一天

比一天大，并且普魯士王国政府不能否认，事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要凭薩克森政府的明智来决定，是否普魯士王国政府要提議对萊比錫也采取一种类似对柏林和汉堡—阿尔托那那样的手段。

沒有哪一个政府的部长能比他更厚顏无耻的了，这样把自己的期望露骨地向其他政府示意。在德累斯頓，人們懂得这种示意，可是我們也懂得。我回答这部长說，如果他认为我們的运动就此完結，那他就錯了。他的武器将为运动所粉碎，就像玻璃碰在花岗石上一样。

在这次会期里，联邦政府提出一个意外事故保險法草案，其目的在于設立一个国家保險局，如此，整个保險事务就操在国家手里。在这个基本要点上，議案符合我在一八七九年二月趁着辯論馮·海尔特林男爵的賠償責任的质問时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执行的方式却与我們的立場相去很远。然而这个草案已足以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圈子里引起极大不安，它們把它看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种恐惧心情，馮·卡尔多尔夫先生在他的二月二十五日預算案发言中暴露出来，他以他所爱好的那种夸张方式断言說，首相以这个議案甚至超过了社会主义。我为此回答如下：“我不知道馮·卡尔多尔夫先生如何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及其企图。我只能說，如果說我們一般地同意这个意外事故保險法草案所根据的基本原则，我們也很不滿意这种执行細則，并且即使我們曾願抱着这样的希望(可是我們沒有这种希望)，在国会这里把草案修改得完全符合我們的願望，即符合工人阶级的願望，我还是必須說，这也仍然很少涉及問題。这也許是做了一个值得称贊的步驟，但至少还同样重要的是，不仅要照顾到(而这是您們的任务，因为我們在这會場里只是被容忍者，人們最喜欢把我們逐出會場)使工业上受到某种事故伤害的人有飯吃有住处，而且要照顾到，

使我們的工人能够总有足够的麵包和收入并且有工可做。”議員班伯格博士竟把我归入法令草案的发起人中，因为他在第一讀时說道：

“今天的法令草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它明白承认，这是它的动机……現今的立法理論已經如何很向社会主义内容靠攏，我后面大約另有一位发言人給您們很清楚的解释，这就是倍倍尔議員先生。倍倍尔先生在一八七九年正是在討論修改意外事故立法的議案时作过一次发言，他在发言中所草拟的正与今天向您們提出的法令的各要点完全相同。我不願夺去倍倍尔先生的快乐，来逐字宣讀那一段把法令的整个經濟学甚至都按他的說法包括在內的話；但是我可以說，今天早晨我又把那篇发言重讀以后，我这样想，不知道为什么沒有任命倍倍尔先生为帝国政府国民經济部門的讲演參議。”

四月二日，俾斯麦侯爵在他的发言中坚决反駁法令草案的这种特性，同时激烈攻击我們；但是他为草案辯护得非常欠妥，我在四月四日的发言中对于这說道：

首相在星期六以某种蔑視的态度对待我們，今天他将知道，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的草案，这使他更加愉快，因为他自己給他的草案作的辯护絕不会使人信服。（笑声。）所以他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我們願意尽可能給他以支持。我們願意竭力协助他，促进他那将借着这个草案来对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积极努力，这样一来，他达到一个有益的目的……（笑声。）

在說明原因时說，法令草案的存在，是由于，人們在討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約定，也要用为工人謀福利的积极措施来对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我們由此很高兴地看出了，原来我們是法令草案的起因。（很对！左面。笑声。）……根据这点，我們就要努力使法令草案成为一个真有助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的东西。（笑声。）

接着我对法令草案作一个较长的深刻的批判。

有人提出顾虑，說实施法令草案时加在业主身上的負担将使他們对外国失去竞争能力，面对这种顾虑，我向首相建議，为了他說得那末中肯的“被剝夺继承权者”的福利，可发起一个有关各国的国际會議，劝它們采取相同的立法。可以保证，如果各有关国家的政府拒絕接受他的建議，那些国家的工人就会支持他——首相，158而强迫他們的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他——首相进行过三次大战，在战争中有許多人牺牲，血流成河，并且由此发生巨大灾害。他因此荣誉日高，如果他能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建立为被压迫者謀福利的和平机构，他将会获得更大荣誉。

我的发言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滿意。恩格斯声明說，这是我迄今发言中最好的一次，他将为此也用馬克思的名义写信給我。

草案轉到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把草案修改成連政府也声明它不会被通过的样子。

在會議结束后不久，党遭受到一件討厭的损失。瓦尔特希和弗里茨舍声明要移居合众国，尽管我們反对，他們仍然实行了这計劃。

几个月以前我們派弗里茨舍同菲勒克往合众国去作演讲旅行，为秋季选举募捐。旅行也很有成績，净余一万五千馬克。弗里茨舍由于各种原因对于祖国已无好感，遂在这时机想出移居計劃。這我們大家都了解，但是瓦尔特希也作同样决定，則使我們不解。我們非常需要他。在我們为这件事进行辯論时，他解釋說，他至今已三次陷于生活无着，他終于想休息一下，享其余生。生計无着是事实。最近他是已无法生存的莱比錫印刷所的經理。但他也又找到朋友，他們准备給他維持一种新生活的金錢。他却拒絕了。

事情一为大家所知，就激起不愉快的轰动一时的新聞。这是惡运，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两位最初創始人同时离开德国。我們收

到由党内寄来的大批信件，要求解释这个事件。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敌方报纸努力利用这事件并且断言，李卜克内西和我也要同样迁出，这促使我们公开声明：不管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决不离开此地。瓦尔特希后来在合众国又继续作他的党务活动。因此，他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休息。

萊比錫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国会会议结束后，自由主义右派和保守党的报纸对我们大肆挑衅。所以我在五月初业务旅行中写信给我妻说，小戒严要来了，但不像萊比錫的人所推测的那样来在春季博览会结束后，而是来在选举以前，最可能是在七月初。我猜对了。为了制造小戒严材料，在三月初，人们第二次试行控诉我违禁集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十六条），而且为这个目的也曾搜查住宅一次，但结果徒劳。控诉失败了，必须宣布我无罪。但普鲁士政府总要设法，至少能为小戒严制造个假材料。自一八八〇年晚秋以后，我们在萊比錫有一个被逐出柏林的铁匠亨利希，这个人在外表上很使人同情，后来却判明，他是负责提供小戒严材料的柏林警察代理人。

在我们的秘密集会中，亨利希始终是最激进的。他特别愿意我们根据一个章程秘密组织起来。我竭力反对，他放弃了他的计划。但在四月初，我须出外作业务旅行。六个星期以后，当我回来时，我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亨利希在这期间完成了一个由他草拟的组织计划。我非常愤怒。如果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萊維爾出席这种集会，亨利希的计划会被阻止，可是他们认为有我到场就够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集会。我在下次集会时非常严厉地反对所作的决议，我说它是轻率的，并且要求销毁现存的全部组织章程。



各方面的人都答应满足这个要求。但此后不久，警察对我们进行普遍搜捕和大批搜家时，所找到的唯一的一份组织计划是亨利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对他起了疑心，我也照这样来对待他。他后来完全被揭穿了，并且他在马格德堡犯了伤风败俗的罪行，必须逃跑，为了逃跑，他从柏林秘密警察那里领取了五百马克。他来到苏黎世，在这里他堕落得越来越深，终于遭到悲惨的毁灭。

六月二十八日，我遇到另一件意外事。我的眼房里来了某一个沃尔菲尔，他在柏林秘密组织中扮演一个角色而由于各种原因已引起我的猜疑。他以柏林秘密组织的名义要求我把上月收支账目抄给他一份。我立时就明白了这个人的目的何在。我把他逐出门去。一小时后，一位我党同志气咻咻地跑到我的住处告诉我，他刚从推布乃尔印刷所的一个排字工人那里获悉，晚上出版的官方莱比锡报上有一个内阁的公告，说自次日起宣布本市和长官公署辖境小戒严。

事情已经决定了。

我立即把我们面临的情况通知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并促使召开莱比锡及其近郊的受托人大会，在次日——六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钟，在普罗布斯台达附近高地上的拿破仑碑那里集合。拿破仑碑标志着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八日拿破仑带领大军作战的地点。在当时由那里可以了望很远，这地区既无大树也无灌木限制视线，处处尽是农田，人们远远就能望见、辨别不速之客。今天这地区完全变了样，附近在这期间建立的莱比锡大会战纪念碑压倒了拿破仑碑。

我们大约有一百人集会。讨论了如何组织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和由谁来分配款项。此外，整顿《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销事宜并拟定选举的组织规程。我结束我的发言时向未被驱逐者劝告说，不要头脑迷乱，要屹立不动。辩论很少。然后我们互相告别，

一队一队地各自回家。

萊比錫警察所喜愛的驅逐形式是非常卑鄙的。第一批名单上的三十三人被喚到警察局，在那里把每个人（好像我們是罪犯）的相貌特征都仔細登記下来。但因沒有量身长的尺度，每个人都要站在門柱跟前由一个官員用鉛筆把身长記下来。这种待遇是被驅逐出境的人們所从未遭到过的。我为这件事向内务部长馮·諾斯提茨—瓦尔維茨先生提出強硬的申訴，他却为这种待遇辯护。他只同意我的非難中量身长的方式，他命令設備一支量尺。

部长先生在这里表現了一次幽默，这个特性是他往常所沒有的。

在被驅逐的人們中間也有一批是本来由柏林驅逐出来的，他們以为必然可以在萊比錫居住，把家迁来了，所以他們特別忿怒。她們的丈夫出发的那天，妇女带着小孩前往市政府，把小孩交市政府处理。这些高貴的先生們为此感到很尷尬，允諾給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李卜克內西、木刻家布尔克哈特和我于七月二日离开萊比錫，步行往包斯多尔夫（萊比錫—德累斯頓铁路上的一个車站），在那里我們先从一个裁縫租了两个房間。但当他过了一夜知道窝里是什么鳥的时候，立即通知我們房間退租。李卜克內西在車站那一面租了一間房，他想要在車站飯館吃飯，那里的店主人也怀疑，他是否可以高价供給凶惡的社會民主党人以飲食，他为此特向萊比錫专区公署請示。随后店主对李卜克內西及家屬很有禮貌和殷勤。

哈森克萊維爾在被逐后借同家屬迁往烏尔岑，这也是萊比錫—德累斯頓铁路上的一个車站。这件事使这里聰明絕頂的市參議會大为騷动。这些老爺們聚首商議如何避免由于哈森克萊維爾的來臨而威脅烏尔岑这个好城市的危險。他們作为一群真傻子，決議从現在起先行禁止一切集会，由事实可以假定，这些集会促进

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所禁止的行动。

但因我党同志提出申訴，萊比錫专区公署把決議撤消，并通知烏尔岑的參議會，它只能根据个别情况来宣布这样的禁令。这个城市的首腦人物讀到专区公署的批駁應該面紅耳赤。后来只有限地使用禁止集会权，却是很聪明的办法。

在我們离开萊比錫之前，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萊維爾和我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一篇呼吁书，《給我們的朋友和同志以及一切公正的人》，其中說道：

薩克森政府认为有必要宣布萊比錫市和公署轄境的小戒严令，“因为公众全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公众安全，在該地区内是无人相信的。但这是无关輕重的。单单臆断，說公众安全受到威胁，不要法官判決，就足以使大批人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而遭不幸。除了一个关于一位已被逐出柏林的人的案件以外，萊比錫的法官还未得到机会，对被逐者中一个人，由于一种違反反社会党人法的罪行，而科以哪怕只是一小时禁閉或一个馬克的罰金。“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怀着憤怒和憎恨，被流放者离开了故乡、妻子和儿女；他們虽則咬牙切齿地憤恨，却不得
163
不向强权屈服。你們有义务保证他們的妻子儿女，除了丈夫、父亲、贍养者被夺去所导致的严重精神压迫以外，不要再呻吟于灾难造成的最艰苦的物质压迫之下……被驅逐的人們虽身处异乡，心情也可以輕松些，如果他們知道有数以千計的人作他們的后盾，这些人竭力帮助他們克服这一严重打击，这个打击是他們因为信念而遭到的并且他們作为大丈夫是知道如何承担的……請确信，不管我們遭到什么事情，我們总是坚定地忠誠地站在我們所为之流放的旗帜之下。”

我們的妻子都声明准备收轉各种救济，此外，我們对于在外面的通信处写的是：格利伦貝格（紐伦堡）、奧艾尔（石威林）和薩克森

邦米特維达的工厂主艾密尔·巴考芬。

募捐的呼吁起了作用，资产阶级人士屡次要求我妻，说发布一个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的启事，这会有良好的成绩的。我妻想答应这件事。她请求莱比锡警察局和莱比锡长官公署批准这样一个启事。长官公署立即予以批驳。这个地方长官算是一个特别篤信宗教的人，这也是他的行为的特征。他提請由他那专区公署轄境驅逐出去的不下七十人。警察局向我妻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她躊躇不决，写信往德累斯頓通知我。

我当时的情绪是可以想像的恶劣已极。人家把我们如同流氓或者罪犯一样驅逐出去，未經法律手續就弄得我們妻离子散，我感到像是致命的侮辱，我若有权在手，对这定要报复。沒有一次訴訟，沒有一次判決會像那种年复一年的流放使我感到那样痛恨，那样忿怒和痛苦，一直到那个站不住的法令终于破产，使这个残酷的以人类生活为儿戏的情况告一結束为止。

164 由这种情绪产生了我七月十一日給莱比锡警察局写的信，信里說：

“接到我妻来信說，警察局对于她呈請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一事回答說：她应将这次募捐的方式詳細說明，并且还必須声明願意記收支的細賬并允許警察局审查結算清單。

我认为末一条是沒有法律根据并侮辱我妻的条件，所以建議她撤回申請。

一八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济貧法上並沒有哪一条規定，賦与警察机关过問为慈善事业募得的財物如何使用之权。警察局这一要求是违背法令和迄今执行的济貧法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必然更为每个正直人士所痛恨，因为此刻莱比锡的地方报纸上正在登載着为被煽动起来的俄国平民虐待的犹太人的呼吁书，这是莱比锡的长官和市长以及許多其他高級人士发表

的，文中为被驅逐的俄国犹太人喚起群众的同情，并用最动人的字句請求捐助，而萊比錫警察局却不敢向这些老爷們提出类似向我妻提出的条件。

由警察局的这一行为，联系着长官公署的行为可以看出，在德国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为被驅逐的和被毀灭的人們公开募捐和訴以同情，只有他們是非德意志人，才能获得允許，但是若为那些本国臣民的遭到不幸的家属募捐，則被禁止，否則也是百般刁难，而那些臣民却被一个所謂賢明而又仁慈的政府和它的所属机关，用冷酷的心腸和更冷酷的算計赶得妻离子散、离家背井、生活无着。

我由此了解到，什么叫做生活在一个德意志—基督教国家和受毫无人心的衙門的統治，并且我要注意把萊比錫警察局和长官公署这种‘人道的’、特別表现基督教思想和公平司法的行为公之于世，并且到那时候在适当的地方提出談談。 165

同时我把这联系到这个声明，即如果警察局认为在《萊比錫日报》上公布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应先从它那方面批准，則根据济貧法第一〇三条和第一〇四条明文，这只能指公开吁請募捐和挨門逐戶的募捐而言。但沒有任何机关可以禁止在志同道合者中間，朋友和認識人中間为所說的目的进行募捐，它也不能禁止我妻代收这种捐款。我按照这个意义通知我妻，并靜候下一步的措施。”

这封信发出后数日，我妻接到一个暗示，多加小心，次日早晨要到她那里搜查住宅了。她害怕了，把現金簿藏在厨房炉子的烟筒里。但次日早晨她煮咖啡的时候，沒有立刻想到所藏的賬簿，賬簿烧起来，等到拉出来时已烧去一半。由于几个萊比錫同志的帮助并根据还存在的信件和邮汇扶据，才把現金簿重新整理出来。

我的薩克森邦議會的選舉

166 以往我拒絕了一切要我擔任邦議會候選人的要求。為顧及我們的生意，我不能比迄今我的政治活動，特別是執行國會委任，再犧牲更多時間了。這種顧慮現在由於我的被流放已不存在。現在我不僅違反心願地在秋冬兩季有了空閒時間，而且現在我也渴望與德累斯頓那些老爺們面對面地提出我的控訴。七月初要舉行邦議會的補充選舉，這個邦議會每兩年有三分之一的議員按次序卸任。這一次改選的選區中有第二十三鄉村選區（選區分為鄉村選區與城市選區），而且是屬於萊比錫以南的工業村莊的。我現在接受了候選，因而在政府中和在敵人圈子裡引起巨大騷動，因為我的當選似乎是有把握的。人們竭盡全力來加以阻撓。為了在選民中間散布恐怖情緒，在選舉前兩天又驅逐了二十二位同志。如果說在第一批被逐者中曾有間諜亨利希，他是為了免得引起對他的猜疑而同別人一起被逐的，那末，現在突然出現了第二個警察間諜，這就是柏林的商人弗里德曼，他是從那裡的警察給我們放進來的。弗里德曼去到蘇黎世，他在那裡不久，也同樣被揭穿了。在蘇黎世同志的集會上，他同所有這類傢伙一樣，慣於扮演激進分子，並且特別愛好朗誦海因利希·海涅的詩《兩個擲彈手》，同時把末段的末行改變為：

“我管什麼老婆，我管什麼孩子，
我懷着好得多的希望，
他們若是餓了，就讓他們討飯去吧，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必須絞殺。”

而原文末行是：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被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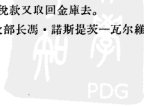
可是警察阻撓我的当选，是徒劳无益的。七月十二日下午，我在齐滔同卡尔·明歇同志往风景幽美的废堡欧宜宾去游历。晚上有一个信差气急败坏地跑来送一份电报，通知我以大多数票获得胜利。明歇为这个胜利消息欢喜得叫人用欧宜宾店主人的两门白炮向森林和深山鸣炮二十响。

我正在一次业务旅行中，于是立即在次晨写信给选举委员，声明准备接受推选。然后我继续向波希米亚北部旅行。这中间，在莱比锡发生了一件几乎难以相信的事。在我当选的次日，《莱比锡日报》上发表一篇官方的文章，声明我的当选无效，因为我未缴纳法律规定的至少三十马克的直接国税。社会民主党将对于我的当选空高兴一场。写稿人接着把我的收入和纳税情况加以分析，这他只能根据官方的材料信口胡说。此外，市参议会却做了件令人无法相信的蠢事，把本年已经缴纳的税款又送还给我妻。做这件愚蠢的、人们认为不可能有的事的人是一位市参议员麦塞尔史米特，他还以选举委员的身份在一个市选区里把选我的三百四十六张票直截了当地声明无效。

167

这半官方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早在一八七一年，当李卜克内西和我受着叛国案威胁的时候，为了使我不至于一旦被判决就一贫如洗，曾把我的小小家产以法律手续过户给我的妻子。这种关系继续存在。我只缴纳我们收入的一部分的税，另一部分应由我妻纳税，但根据萨克森选举法第五条明白规定在计算税款时必须算是我的。因此，我无疑是有被选举权的，并按正式手续当选了。为安慰我的选举人，我借着《莱比锡日报》上的一篇声明把事实情况说清楚。但是，在这期间，莱比锡市参议会的人也知道自己做了蠢事，并把起初送还我妻的税款又取回金库去。

但最强硬的却是，内政部长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先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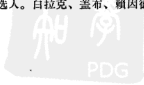
米冒昧地在邦議會中聲明，他有把握不違法而宣布我的當選無效並下令重新選舉。只是考慮到議會的決定，他才沒有這樣做。對他這驕橫態度我沒有能給以相當的答复。議會保護他不受應得的懲戒，通過了辯論結束。但是最後他就是換了這個對他百般順從的議會一下頭等的耳光。審查我的當選的小組一致認為選舉有效，議會全體會議也作了同樣的決議。那三百四十六張曾被市參議員麥塞爾史米特在對我狂怒之下聲明無效的票也被宣布有效。

隨後不久，來了第二個具有稍微不同的結果的選舉戲劇。

一八八一年秋季的國會普選

我們是在可以想像得到的不利情況下參加這次選舉的。我們不再有一份在國內出版的黨報。無色彩的報紙在各處應運而生，但不敢為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負責。僅存的两家印刷所，都被警察日夜監視着，以便阻止它們印發社會民主黨的傳單。其中有一家簡陋的小印刷所——德累斯頓的宗巴式公司——因為敢於為我印一種傳單，而被警察封閉，它的業主和職工被法院傳訊並且一部分被判罪。資產階級印刷所沒有勇氣為我們印制傳單，它們往往連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選舉票都不敢承印。所以到將近選舉日的時候，在許多選區內連一張傳單也不能分配，有許多選區竟至沒有選舉票。很多城市的資產階級報紙也拒絕刊登照價付款的推薦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廣告。儘管如此，警察還認為必須再做一種使我們競選更加困難的事。隨着選期的日益迫近，各處警察的迫害和詭計也與時俱增，性質也是越來越惡劣。秋季，在一切宣布小戒嚴的地區，流放者人數都在增加。警察越來越神經過敏。

這一切再加上缺乏候選人。白拉克、蓋布、賴因德斯都已亡



故。弗里茨舍、哈赛尔曼、莫斯特、莱迈尔、瓦尔特希都迁居国外。其他，如莫特勒、伯恩施坦、陶舍尔、理查·费雪尔，由于他们在国外的党务工作不可能参加竞选。许多以往的候选人也或是迁出或是不敢再参加竞选，以免遭受横祸，或如哈尔特曼和卡培尔弟兄们，把自己搞得不可能参加了。结果是，在一切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都把出名的同志的名字提出来，而这些同志早已在其他地方提名竞选，不过这同时却也使鼓动工作容易做些。这样我就荣膺三十五个选区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各十七个，格利伦贝格十五个等等。

进一步的鼓动工作变得困难了，因为许多选举集会被禁止，更多的选举集会是在演说当中被解散，或者店主人拒绝供给会场，根本阻止了集会。虽然如此，选举那天党所获得的是三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一票，只比一八七八年八月行刺事件选举时少十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七票，那末，这次也是使我们的敌人惊惶失措的巨大成功。选举结果公布后，柏林皇宫内必将充满了十分烦闷的情绪。

事实上早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已经失败了。

党受到的道义上的影响非常大。这次人们又给自己清点一次，并且看见四分之三的老卫士仍然忠诚于以往的旗帜。从现在起，不断进步，直到一八九〇年二月十九日，终于以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作了决战。

我们的候选人在第一次选举时没有一人当选。威廉·司滔莱在萨克森第十八选区兹维考一克里密朝事实上已得到多数票，但被选举委员数掉了。他在复选时才获得胜利。我们总共参加了二十二个最终选举，我一个人就是三个：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第四区。

德累斯顿的事因为有两个奇怪的尾声，使我特别感到有趣。

在德累斯頓已不可能印制传单。我由友人协助发现在齐滔乡間有一家小印刷所，我托它印一种传单。它接受委托，承印四万五千份传单和相应数量的选举票，每一千份为一小包，共装两箱，当作布匹报税，寄交一位德累斯頓的党员同志——布匹商人。承印商号则称为苏黎世—豪廷根的“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这两个庞大的箱子幸运地运到地点，但当收件人看着这两只箱子放在他那小小院内，感到恐慌。他没有脑筋，竟派粗工把箱子送到一个友好的单身汉那里去，他住在一个运输商的院子里。运输商看到箱子，追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由于恐惧心的驱使，这个新收件人又从院子里把箱子送回去，这使那运输商大为吃惊，赶快去给警察送信。警察在街上把搬运人连同箱子捉到，叫把箱子搬到警察总局去。把内容弄明白了，警察总监保尔（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高兴得搓双手。现在社会民主党没有选举传单了，他欢庆着。离选举只有十二天，我们的处境是极不愉快的。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头脑昏乱。我记起一位同志，他是个排字工人，并且是个机警的小伙子。我请求他立刻出发到德累斯頓附近，看是否能以高价找到一个印刷工人来印制传单，我在这期间另写一份新传单。说到就办到了。当这位同志晚上又到我房里来时，我在他脸上就看出，他这次旅行结果圆满。他已在庇尔纳为这个计划争取到一个官报的印刷工人。这个工人在下星期六按照指示把传单装在给他使用的手提箱内，由一个搬运工人送往车站，在那里由我们的人接收，再送交一定的地点。一切进行如意。这时有一个搬运工人忽然想起向警察控告他的同事往车站运送频繁。警察把末一批约六千份加以没收，并将发生的事件向德累斯頓报告。但这时已经是晚上，有四百个我们的人准备得妥妥贴贴地站在岗位上。在警察还未从惊讶中醒过来的时候，传单和选举票已被分配好了。只有两个人带有几百张被抓住了，但是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于是我

們能够有第二次的传单来散发。

在主要选举那天，我在四个候选人中間以九千零七十九票获得相对多数。我与德累斯頓市长进入复选。德累斯頓的手工业者有二千零七十六张以上的票，要我签字答应他們的要求，然后才选举我。我拒絕了。这就意味着我的失败。复选在很不平常的环境中举行——张贴惩治暴动条例、军队准备出动、宪兵盘踞选举会场——，結果以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九票对我的一万零八百二十七票决定勝負。

在萊比錫，我在主要选举中得六千四百八十二票，同一个得了八千八百九十四票的民族自由党候选人进入复选。这一次我得到九千八百二十一票，我的对方是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三票。在这里我們原沒有打算得胜。

更有趣的是柏林四区的选举。在这里的主要选举中我得到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四票，阿尔伯特·特雷格尔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七票，保守党八千二百七十票。在这个选区同在柏林第六区一样(那里是由哈森克莱維尔候选)，保守党在复选中是举足輕重的。当时柏林的情况是这样的，保守党人(反犹太人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等)进行拚命的努力，要把进步党赶下台来。他們按照俾斯麦和普特卡美尔的意思办事，普特卡美尔数月前接替欧伦堡充任內政部长。俾斯麦对进步党和自由党的仇恨总是不停地增加，所以現在又像施韦泽时代那样，保守党陣营准备同魔鬼，这就是說同我們，訂个协定，只是我們不爱这样办。所进行的协商，披露在下面我們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的声明：

“《国家使者》报上关于保守党領導人和社会改良派(瓦格納教授，宫廷教士斯托克尔，狄斯特尔坎布等先生)为一方，社会民主党人为另一方就柏林第四和第六选区复选一事进行交涉的通知，促使我們作以下的說明，

星期四中午，十一月十日，有兩位柏林我黨同志到德累斯頓這里來，告訴我們說，在他們與保守黨領導人和社会改良派之間為了當前柏林的復選進行了談判，並導致下列結果：

我們——簽署人連同哈森克萊維爾應簽署下列聲明：

我們聲明：

1. 我們承認德意志帝國政府的改革政策中對工人的友好意圖；

2. 我們真誠願意同社会改良黨派合作用和平手段改善經濟情況；

3. 我們希望，照我們的一位國會議員的話，用強有力的社会改良來制勝革命。

我們同意這三點的代價是：

1. 上述的保守黨領導人和社会改良黨担保他們的黨員在柏林第四和第六選區十一月十二日復選時投我們的票；

2. 他們答應隨後簽署下列的相對聲明：

對此，我們聲明，如果德意志社会黨人由法律途徑在現行的國家秩序以內致力於改良，我們在這情況下投票贊成撤消反社会黨人非常法。

此外還口頭通知我們：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個協定，則上述領導人們就發出口號：棄權，這樣我們在柏林就一定會失敗。

於是我們堅決而又確定地口頭聲明說：

173 我們拒絕任何政治投機和購買選票；我們情願要光明正大得來的三千張票而不情願要賄買來的三萬張票；我們不能承認在公布反社会黨人非常法之後開始的帝國政府經濟政策；對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增加和提高間接稅和關稅，加重軍事負擔，同業公會法等等是對工人友好的；

2. 我們從沒有拒絕（如我們最近對意外事故法的態度和聲明

所表示的)郑重审查帝国政府的改良方案,試行按照我們的願望加以改造,并且,如果它符合我們的立場,就予以接受,但是我們必須拒絕同那些努力做反动的因而与工人為敌的事情的党派相携手;

3. 如果說第三点是要表示一个假定說我們想要一个暴力的革命,这就是个完全武断的假定。我們始終声明,有計劃的、彻底而完全的改良能够預防暴力的社会革命,否則我們政治經濟的发展必然导致暴力社会革命的結果,并且对于不是我們意志和我們权力所及而以我們迄今的敌人的意志和权力为轉移的事情,我們不能負責任。

我們的同志帶着这答复回柏林去了。选举結果是人們都知道的。

德累斯頓,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

选举結果是,哈森克萊維尔以一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票对进步党人克洛茨的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七票,我以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九票对特雷格尔的一万九千零三十一票而失敗。但实际上我却是胜利了的;我因少五十二票而似乎被压倒,但这事的发生是由于选举委员会把写我的名字的四百五十张票,借口所謂候选人名字难于識別而宣布无效。

柏林第四选区的党员同志对特雷格尔的当选提出抗議。在选举审查委员会中也有两位报告員建議特雷格尔的选举无效。但到决定性會議时,选举档案失踪了,它被盜去。所以沒有能作决定,特雷格尔遂得据有委任证书。究竟誰是档案窃賊,則未发觉。从那时起,对选区代表提出选举抗議的选区的选举档案,被鎖在一个只准选举审查委员会的成員进去的房間里。

174

柏林复选时的斗争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柏林論壇报》刊载了斗争中的下列插曲:一个九岁的小女孩用粉笔在大門上写:

“选举倍倍尔。”一个巡警看见，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了她的名字。“你住在哪里？”她说出了住处。“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流放者。

阿道夫·格克把这段经过写成诗，如下：

圣马丁节的次日在柏林，
搏斗是多么激烈惊人！
胜负难分。标签上边：
“这里特瑞格尔，这里倍倍尔！”——
拥向票柜的搏斗的人群，
是资产者和无产的人。
大家干什么大街出小巷进地
向一个目的地突进，
这里有一个孤独的孩子
混入流动的人群，
一个九岁的女孩，饿得
两颊苍白；眼睛变成深窝，
由于穷困，由于惨痛的灾祸。——
小手拿着块煤炭，
甩这在皇宫的墙上，
这可怜的小孩子谨慎地
用有力的笔划写上“选举倍倍尔！”
巡警见这战栗的小孩胡闹，怒火高烧：
“你是谁，社会党人的娃儿？”
“人都叫我小辛赫，又贫又病”，
小孩不哭而回答。——
完兵又继续盘查：
“谁是你的父亲，他干什么营生？”

小孩严厉地斥责这巨人：
 “我知道，这灾难是谁创造的，
 我的父亲被驱逐出境了。”
 在柏林那一天的战斗
 会有二万人考虑
 小孩的劝告：“选举倍倍尔！”

选举的最后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们获得了十三个委任证书。当选的计有：布洛斯在格莱兹，迪茨在汉堡第二区，佛罗梅在哈瑞，盖塞尔在开姆尼茨，格利伦贝格在纽伦堡，凯泽尔在萨克森的孚赖贝格，克莱克尔在布勒斯劳西部，李卜克内西在美因茨和欧芬巴赫，司滔莱在兹维考，福尔马尔在萨克森的米特维达。

在这次选举中独一无二的，一直到今天仍然独一无二的是，孚赖贝格选区是由一位夫人取得的。凯泽尔在选举鼓动时期又一次被监禁，由他的朋友——商人 O. Sch. 在德累斯顿为他进行选举鼓动。这被德累斯顿的警察发觉了；他们就设法以莫须有的借口把 O. Sch. 逮捕了。这个可怜的、组织得不好的孚赖贝格选区因此失去了选举主持人。当我得到这消息时，神经大受刺激，我不知道，应如何找人来代替 Sch.。次日早晨，Sch. 夫人到我这里来说：“我的丈夫被捕了，您知道，倍倍尔先生。他坐几天牢，对他没有什么损害。但是麦克斯·凯泽尔的选举怎么样呢？您意见如何，我想到选区去主持选举鼓动！”我惊讶地看着这位夫人，而后我同她握着手说：“Sch. 夫人，您是一位出色的夫人，我同意您的建议。”当 Sch. 夫人来到孚赖贝格并向那些沮丧万分的同志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被她的来临震奋起来。他们此后在 Sch. 夫人领导之下竭力工作，因而凯泽尔得到胜利。

李卜克内西是双重当选，必需把所得到的委任证书放弃一个。他放弃了美因茨，虽然他在那里只多得六百张票，而在欧芬巴赫选

区却多得三千四百多张票。但是他为欧芬巴赫选举委员会所迫才采取这个颠倒的措施，该会在选举揭晓之前公开宣称，李卜克内西万一在两个地方当选，他仍将接受欧芬巴赫的委任证书。现在提我作美因茨的候选人。我们竭力保持这个选区，但是徒劳。首先是民主主义者菲利浦斯和我之间的复选。但是我在十二月十五日最后选举时以八千三百八十五票对八千六百三十三票失败了。虽然我们的选举人对于这样又选举一次感到不满，但我仍较李卜克内西多得二百四十八票。当李卜克内西知道了这结果，同我谈到这件事时，眼里含着泪珠。这不是他的愿望。

我的国会活动固然因此警告结束，但是我的议会活动却并未结束。我在萨克森邦议会还有席位。所以我继续有议会活动。

我写信给我妻说，不要为我的失败而烦恼，我现在可有较多时间来料理生意了，因为邦议会是每二年开会一次。我写给恩格斯的信与此相仿，我感到喜悦，终于得有一点我所需要的休息。他却同我的看法不同，他把我的失败看做是党的一个损失。

奥艾尔也遭到与我相同的命运，他是在萨克森第十七选区失败的。他的选举委员会向国会呈递一份抗议书，结果是选举审查委员会宣布他的对手的选举无效。但是这手续在该届末次会议结束时才办妥，所以无从再来重新选举。

德累斯顿国会选举的一个余波

一八八二年三月初，我离开德累斯顿和萨克森邦议会，去作业务旅行。不久之后，我妻写信给我说：一个法警到她那里来问她我的地址。在德累斯顿法院有一件控告我的案子，不过没有把公文交给她。我为这写信到德累斯顿，说我在作业务旅行，无法呈报一

定地址，可把公文送交我妻，但到复活节时我在紐伦堡。我在那里接到了控訴狀。联邦議會对我提起侮辱罪的公訴，因为我在被沒收的、根本沒有能够散发的选举传单上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为可耻的法令。如果这个法令可耻，則联邦議會也就可耻。由于同样的結論，也控訴我侮辱元首罪。但是联邦議會若被侮辱了，則国会也一样。可是薩克森司法部长却沒有向国会提出追究我的侮辱罪的建議。他知道，国会会拒絕他的，这样将使原告联邦議會处于不愉快的地位。我写信告訴德累斯頓法院，我几日内要繼續作业务旅行，但在圣灵降临节一周內将停留在德累斯頓，再有消息可以寄到那里。5月18日，我也是因为侮辱联邦議會罪，来到莱比錫法庭，原来我在一张那里出版的选举传单上用尖銳詞句，說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联邦議會又一次感到侮辱。审理結果判一个月監禁。

我在当天夜晚往德累斯頓，由于莱比錫警察通了消息，在德累斯頓有一个护駕天使在等候着我，他以相当的距离一直伴送我到我的住处。次日早晨，我在同样的保护下起程往西里西亞。当我在圣灵降临节前的星期四由那里又回到德累斯頓时，仍有警察天使在站崗，我的家属第二天来到德累斯頓后，他們現在也享受到他的保护。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一天上午，当我同我的女儿在布吕尔街散步时，有个人从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望，看到警务长保尔那个太熟悉的面孔，他以最恭敬的薩克森語通知我說，他奉命逮捕我。我怒吼起来，对我施行的是个卑鄙的玩笑还是个暴行。他向我暗示已在注意我們的公众，請我跟他到警察总局去，到那里他将給我看逮捕我的法院判決书。他在尽量靠近警察总局的地方把我逮捕了。

我叫我的小女儿把这情形去告訴她那在一个朋友家里的母亲，要她不要煩惱，我的逮捕是不能成立的。

法院的判決是：

“判決，呈請王室警察總監執行此項逮捕萊比錫的旋工師傅斐
178 迪南·奧古斯特·倍倍爾的命令，他一到這里就執行，附帶說明，
倍倍爾曾通知這里，他在聖靈降臨節期間停留在德累斯頓。

德累斯頓，一八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王室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審判廳。

馮·曼高爾特。”

待審拘押的理由是：

“判以待審拘押，是因為被告見嚴重的責罰臨頭，並且據他自己所說在國內並無固定住處而有逃走的嫌疑。

德累斯頓，一八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同上。”

這個有逃亡嫌疑的邦議會議員却自己通知地方法院說，他將在聖靈降臨節來到獅子洞里。五月十三日發出的逮捕命令聲稱，他在德累斯頓一出現就加以逮捕，這首先就未照辦。因為我五月十八日在那裡時未被打擾。在五月二十七日，就是說在聖靈降臨節的第一天，才根據五月十三日的逮捕令把我拘押。因此，這是個狡猾的鬼把戲，想要敗壞我的家庭和我過聖靈降臨節的兴致。如果在五月十八日我第一次在德累斯頓時，馬上就把我逮捕，那末到聖靈降臨節我可能早已被釋放了。

因為法院休假，我要求警務長引我到馮·曼高爾特先生的住宅，試行促成我的釋放。保爾情願接受我的要求。他知道為什麼。到法院院長的住宅後一個使女給我開門，說馮·曼高爾特同他的家屬作節日遠足去了，次日晚上才回來。這樣我就只好從警察監獄最高的一層樓上，當這風和日麗的天氣，以研究圣母教堂的鐘樓和屋頂的形式來消遣了。第二天，我被帶到地方法院監獄里。又次日，我求見馮·曼高爾特先生。我滿腔憤怒，所以我非難法院的
179 決定和提請釋放的講話，大概不會很客氣。馮·曼高爾特先生祖

暴地說，关于法院的决定对我没有什么可談，其原因我应已熟知。我可以对这决定提出申訴，不过审判厅却也願意以繳納一笔保证金为条件把我开释。我想繳納保证金是达到目的的最簡便的办法，遂声明願意繳納保证金。現在馮·曼高尔特先生非常迁就，他对再拘留下去已不感兴趣，他已經达到了目的。他认为，我应该立即提出书面申請，他将尽早送到审判厅，次日中午我就又可以回到家里了。我問：保证金数額要多少。反問：您能提供多少？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一千馬克。他同意了。次日早晨，我接到通知，决定以我繳納保证金为条件把我开释。現在我却沒有一千馬克。我于是請求，准許由一官吏随我到城里去設法筹款。这得到允許。中午我得到自由。当我又回到我的家属中間时，他們甚为欣幸。在开释前，馮·曼高尔特先生告訴我，六月十五日法院开审。

我一获得自由，就送給刑事审判厅一个申請，請把該厅首席之职改任其他法官，因为我认为馮·曼高尔特先生是有成見的。他在去年秋季的选举鼓动中，在一个反对我的竞选号召书上签名，这个号召书对我个人攻击得极为激烈。法院的审理是关起門进行的，当时在德累斯頓照例如此，尤其是在曼高尔特审判厅——这是党内同志对它的称呼。开庭后通知我說，我的申請被拒絕了。馮·曼高尔特先生解釋說，他并不抱成見；他当时同意在竞选号召书上签名，但不知道其內容如何。我声明，既然如此，就放棄繼續申訴。檢察官还扩大对我的起訴范围，說我使人填报虛假的印刷商号，并且邀来一个新的证人，可是这个证人却不能說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檢察官又把違反出版法的控訴撤回了。关于此事的經過我曾写信給我妻說：

“檢察官对我攻击得很厉害，尤其是在設法攻击和誣蔑我的人格，所以我多次呼叫打断他的話。首席法官斥責这种行为；說我們不是在国会。但当我后来发言反駁他时，給檢察官以应得的回敬，

他竟憤然跳起，呼請首席保護。首席就給了他保護。馮·曼高爾特先生打斷我的講話有三、四次，竟威脅我說，如果我這樣繼續講下去，就不准我講話並加以拘押。但是我並不畏縮；我同自己說，當着法官只有最堅決地代表我的立場和我的正當權利才能對我有幫助。

我的態度使我的律師十分不悅；他說我的講話將會給我增加一個月監禁。這我不承認。這些先生們大半都抱這種見解，處於法官勢力之下必須忍耐。現在，儘管他態度溫和，馮·曼高爾特先生仍有幾次以我所永不能忍受的方式打斷他的發言。辯護人有幾點是好的，有一系列的其他各點則失之於纖巧詭辯，使法官幾乎不再理會他的發言，把他講話中好的地方也抹煞了。幸而在他之後由我講話，因為在這一剎，情形是對我無利的。法官立刻很注意地諦聽；他們還作很多筆記，這使我能真正看到和覺到氣氛的驟然轉變。檢察官已受得夠了；他不再發言。討論半小時後宣布判決。判辭說，侮辱聯邦議會罪處監禁兩個月；至於侮辱元首的控告，我被宣告無罪。根據憲法，皇帝單只公布聯邦議會和國會一致決定的法律。皇帝無權參與制定法律，等等。”

181 聚集在法院前面的德累斯頓的我黨同志向我祝賀“緩和的判決”。曼高爾特法庭判案嚴酷，因而在他們中間聲名狼藉。剛在幾個月前，蓋耶爾同志因在一個傳單上說了一句對於第一三一條的無關重要的話而被判八個月監禁。我對判決聲明上訴。

就有关对我的法律控訴來說，一八八二年是個“丰收年”。八月八日我又一次，而且這次是同李卜克內西和哈森克萊維爾一起，作為被告在萊比錫地方法院出庭。這次罪狀是在宣布小戒嚴後我們三人在萊比錫及其近郊發布由我們簽名的傳單。我們認為，宣布小戒嚴主要是為了儘可能阻礙我們的選舉鼓動，檢察官把我們這個意見又看作是違犯第一三一條。說我們是以這種主張令人連

背良知地蔑視薩克森政府的這一規定。由此可見，第一三一條在當時純粹是有彈性的條款。此外，司法部長馮·阿伯肯先生還在傳單中找到一個對聯邦議會的侮辱，檢察署又為此提起公訴。我們徒勞無益地抗辯說，傳單中所說的是符合我們的信念的；以為我們違背良知地妄加報道，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所主張的，新聞界大部分也說過；在德累斯頓的競選中也反復拿“如果我當選了，德累斯頓也要宣布小戒嚴”這句話來吓唬選舉人。半官方的《德累斯頓新聞報》曾宣布說：我現在沒有當選，德累斯頓的小戒嚴因而獲免。一切理由都無用。判決我們每人監禁兩個月。

八月二十六日，又對我和另外兩位我黨同志（克萊曼和哥爾德浩森）進行第三次的法院審訊，仍是關於選舉傳單，違犯刑法典第一三一條。不過檢察官須撤消對我的控訴，因為證實撰稿人不是我而是李卜克內西。但對他已不能再起訴，因為這時已失時效。此外，法院也宣布那兩個被告無罪，因為並未發現傳單中有違犯第一三一條的地方。不過這個判決的獨立性沒有能使茲維考地方法院得到好處。後年，馮·阿伯肯先生委派馮·曼高爾特先生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

182

死耗的誤傳

自從三月以來，我除極短的間斷外，都過着流浪生活，不僅精神緊張，而且健康也受了損害。在茲維考法院審訊後，我緊接着患起胃黏膜炎，必需臥床請醫調理。我妻一聽說，就趕快到專區長官那里請准許將我移送萊比錫由她護理。請求被批准了。警醫立即被派到我房里來，他不僅確認我生了病，而且勸人把我留居萊比錫的假期延長一個星期。我隨後遷居包斯多爾夫，並且在那里發現

有一所房子，它可以使李卜克内西离开他那狭小住屋而迁到较大房屋。从现在起，我們住在同一层楼上，他占三个房間，我占两个。

我生病的消息也登載在外国报纸上。有一天，我妻在非通常探望时间来到包斯多尔夫，她一見面就突然喊道：“万幸，你还活着！”这使我吃惊不小。在我惊問她为什么这样惊惶呼叫，她說，她今天一大早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来自巴黎的德意志协会，說是因我死亡而向她慰問，另一份是由伦敦发的，态度謹慎些，詢問我死亡的消息是否确实。而且在一清早警察也到家里来探詢，家里是否有人死去。他显然认为，我是秘密住在萊比錫的。我死亡的消息也传到美国，并促使我們在紐約的党内同志举行几千人参加的追悼会，会上由瓦尔特希致悼念詞。这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当瓦尔特希获悉真实情况时，他很生气，并且責备我不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告訴他們。我回答說，我不能知道他們得到这个消息而且就相信它。

183

继死亡消息之后，法国报纸上刊載了很多的死者小传，从它們的内容中我部分地懂得了：有时候历史是如何造成的。例如：《罗亚尔河的灯塔》报有一篇較长的死者小传，作者在文中說：他是在里伏諾一个午餐席上認識我的。随后我們一同旅行到佛罗梭斯和羅馬，从那里到卡布累拉，又到因加里波第停留过而著名的山羊島上去游覽名胜。整个描写沒有一句实話。我在那时候还没有踏上过意大利国土一步。是否叙述人受了自称是我的一个人的欺騙？这会有有的。例如，我在九十年代有一天接到波尔庫木島的一张旅客名单，把我也列为某一个旅館的旅客。可是我从沒有到过那里。

关于这件事恩格斯在九月二十三日写信給我說：

“亲爱的倍倍尔！

我們为了你大吃一惊。一星期以前，星期五晚上約十时，协会有两个人到我这里来問：已有两期《公民》报上登載着你去世的消息（还有死者小传），不知是否属实。我认为这极不可信，但也說不

出确定的东西。因为有个无聊的人坐在我这里，虽然我不再讲一句话，可是他仍不想走，所以我到十一时才跑到杜西·马克思那里，见她还未就寝。她订的《战斗》报同样有死者小传，而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但认为没有疑义。所以大家都惊惶失措。德国党所遭到的这个极大不幸，至少是很可能了。英国报纸专注意于埃及的欢庆，关于这事什么也没有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星期六晚上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未到，这是常有的事。幸而我在星期日早晨见到杜西收到了她的报，这报的内容使这个消息极不可信。在咖啡馆里查看德国报纸，从来就没有希望，因为它每天换新的。我们就这样在烦恼的忧疑之中，一直到星期一晚上《正义》报终于到来，那上面有正式的否认。

马克思也正是这样。他是在日内瓦湖畔的维卫读到了反动的《日内瓦日报》上的记载，它自然是当作确凿无疑的事情来叙述的。他就在当天以极惊惶的心情写信给我。他的信正是那个星期一晚上到达，我还来得及趁早邮班把喜信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捏造的。^①

不行的，老青年，这样年轻你不可以溜走。你比我年轻二十岁，并且在我們还要一起打许多快乐的仗以后，你还有责任仍旧掌舵，即使我扮完了我最后的丑相。因为凡被误传死亡的人都应该长寿，所以你現在被判定为长寿了。”

我回信说：

我看到了朋友和同志们多么器重我以后，我认为有责任，要开始好好生活并尽我的责任……“我暂时同死神订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我想，这时间不仅足以阅历到旧东西的崩溃，而且可以享受

^① 马克思的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往来信件中发表。其中关于倍倍尔的死亡说道：“真可怕，我们党的极大不幸！他是德国的（也可以说欧洲的）工人党里面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编者

一段新东西。”从我写这话的时候到现在已三十二年，但还差的八年将是最艰苦的，据此看来，我不见得能活到那时候。

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二年在薩克森邦議會

185 邦議會那年例外地在九月一日就已開幕，为的是庆祝宪法五十周年纪念。在議會開幕后开始討論呈給国王的請願书，这使李卜克内西和我得到了所盼望的机会，对整个政府制度包括萊比錫及近郊的戒严令在內予以严厉的批評。我同时指責政府，說它为普魯士政府所迫而采取这个手段。馮·諾斯提茨—瓦尔維茨先生否认有这等事。說政府自己决定这样办，今后仍将这样办。我們的答复，因为議會通过了辯論結束的建議被打消了，这一个方法从現在起對我們常常使用。

我們現在决定提出一个质問，即：王国政府根据哪些理由宣布萊比錫城区和专区所謂小戒严？政府对此暂时避而不答，而在九月六日赶快使邦議會停开，借此，如《德累斯頓新聞報》泄漏說，使社会党的議員在国会普选前不能作有煽动力的言論。

这就是当时在薩克森所据以施政的“大見解”，在这种理解上，議會中的絕大多数是同政府不謀而合的。

根据現今还有效的法律，由城市和平原选区的代表組成下議院，而城乡之間的区分，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工业极发达的薩克森更不适当的。但是数十年之久，城乡的这种分法有利于政府，政府借助于选区的相应划分保证了保守派的多数。当然，議會面对着我們，除一、两个例外外，成为单一的反动集团，总是准备把来自我們的一切都盲目地加以駁斥，把反对我們的一切都予以嘉許。根据它的社会成分看，它不会是另一个样子。乡村議員在議會中占很

大一部分，他們的政治眼光几乎不能越出他們的選區界限，這些人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志願有極其可笑的想像。贊同他們的有一批小城市的市長，這些人生活在庸俗的環境里，思想也是這樣。其餘的議員是一批政府官員、幾個工廠主和一大部分法學家。除少數的例外，議會拘泥於極狹隘的薩克森邦獨立主義，這與保守黨的所謂進步議員沒有區別。坐在這樣的議會里，我沒有一天是舒服的，只有對黨的責任感和不時地痛斥我靈魂最深处所痛恨的制度的必要性把我留在这里。

我相信，那些部長們也常常暗自後悔宣布萊比錫小戒嚴，因而使我接受了邦議會的委任證書。

為了補足這幅圖景，還必須敘述一下，我在德累斯頓接到退租住房的通知二次，據房東自己承認是被警察所迫而出此。福爾馬爾在二年後進入邦議會時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周圍盡是無知和敵視。

十一月初議會重開後，討論我們所提的質問。我申述提出的理由，這引起議會和部長席上的暴風雨般的忿怒，並向我喊了多次守秩序。當我報道警察機關對流放者的粗暴違法待遇的一些情況時，多數派大笑，因而我對他們叫道：“如果這樣的事情不能使議會羞愧的話，我就不知道，還要發生什麼事了。”

馮·諾斯提茨—瓦爾維茨先生答復我，如上文所述，他在這種場合倒有可憐的勇氣來聲明說，他本可以並不違法地宣布我的選舉無效。其次，他提出荒謬的見解，說人們在討論萊比錫社會民主黨時，曾討論哪些人必須酌情加以清除的問題。這顯然是萊比錫的柏林秘密警察的騙人說法，而部長却認為可信。這個說法的可信程度同後來在半官方報紙上論證萊比錫小戒嚴時所發表的另一說法完全一樣，在討論（亨利希的）組織計劃時考慮到會有普遍起義的可能，所以人們要想取消瑞士給流亡者的避難權和其他自由。

难道人們能以愚昧无知的东西責备可爱的公众嗎？

我們对于部长講話的答复，又因为會議通过結束辯論的建議成为不可能。至于會議将因此承认政府的弱点并且同时也就承认它自己的弱点，这就超过它的水平了。但是內政部长在十一月十七日為我的被选举权的講話却得到應得的答复，奧托·夫賴塔格参与了这次清算。

在李卜克內西的选区里居住的大部分是矿工，他以貫徹矿工救济基金制度的必要改革为自己的任务。十二月二十一日，举行关于他的建議的大辯論。建議被交给一个专案小組（在薩克森邦議會称委员会为专案小組），它最后提議把我們的建議当作資料移交政府。另方面它自己提出一个建議，請政府在下次邦議會会期把改革矿工制度的适当建議送交邦議會。两个建議都通过了，邦議會不能让矿工制度中被我們揭发的弊端再长期存在下去了。

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底的一次會議上，我激烈地非难司法工作。檢察官們以极其濫用职权的方式提起公诉，法官們以同样方式判处待审拘押。在德累斯頓十八个月的时間內有九十個黨員同志被拘押待审。他們总共被拘押六年五个月。被拘押的人只有二十三人，即四分之一被判罪，共計被監禁八年两个月又十六天。法官在判徒刑时，总共只計入九个月的待审拘押。其中由待审拘押和由被控而释放的或宣布无罪的有十二起，他們每人平均遭到无辜被押五十二天。但也有拘押待审十八个星期、十四个星期、十二个星期和十一个星期的。这些尽是情节輕微的案件，按科刑标准只有十起可超过六星期，但决不能超过三个月。显而易见，在这些訴訟中成問題的是法官的成見和偏袒。有一个被告人由于灰心失望在監獄中自縊而死，另一个在十八个星期的待审拘押后必須宣布无罪的人，患迫害狂而投易北河自溺。在叙述孚賴貝格选举时已經說过的那次事件中，檢察官向 Sch. 解释說，他不諱言，如果 Sch. 不

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話，他不会加以逮捕。一切这些案件的策动者是警务长保尔。

二月九日，司法部长馮·阿伯肯先生企图糾正我的申訴。我予以詳細的答复。議長为此忽然宣布辯論結束。馮·阿伯肯先生同他的同僚——內政部长相反，是个具有迷信宗教者的冷酷面貌的瘦小的人。我对我党同志称他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裁判长陶奎瑪达的翻版。他适合他那时代。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法律家，从他那沒有抑揚的語調而是用一种尖銳的干枯的官腔的发言中，人們只能听出他內部激动的輕微顫抖，他极其一貫地为他的檢察官和法官的行为作辯护。因此他对他的邦的司法发生极其有害的作用，如很大一部分对我们提起的公訴，司法部长是发动者。

在所說的會議上，李卜克內西也作了长长的彈劾发言，这个发言以无数事实为佐证，也屢次被喊叫守秩序的声音所打断。我支持李卜克內西，但是結束辯論的建議被通过，因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行动。

我們攻击的另一个对象是德累斯頓市的由本邦开支的警察預算。其中为表揚警务长保尔的活动，每年撥出个人津貼六百馬克，按保尔的生活方式，这只是杯水車薪。这个保卫风化和公共秩序，保卫婚姻、家庭、宗教和所有制的战士是一个可能有的最沒良心的人。他是一个酒鬼，一个債台高筑的人，他夜夜在德累斯頓的妓館里游蕩，而且賄賂公行。一个以迫害社会党人为游戏的人，知道借此可以在上司的眼里遮盖他的許多罪惡，但是最后，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将完結的时候，因为檢察署被迫使他对于所犯的罪行負責，他不得不自杀。

尤其是在上次国会选举时，保尔在德累斯頓的行动像一个惡霸。在十一月十九日选举之夜，他醉熏熏地冲进麦克斯·凱泽尔的烟草店，冲进彼得士的飯館，用他的手杖痛打群众。在市場上警

察在他领导之下胡作非为，群众对他们抗議时，就被加以叛乱的罪名判以重刑。

我們提出这些事件的那次会议，是邦議會中最长的会议，而且是最激烈的会议之一。

最后还使国会忙碌的另一事件，是薩克森政府利用其掌握的驅逐出境权对政治犯的胡作妄为。它竟至不得不用违警章作为驅逐令的借口。在那时候，薩克森的議員被按一八三四年法令驅逐出境的不下三人，即凱泽尔、李卜克內西和福尔馬尔。我們建議，至迟在下次邦議會提出一个法律草案，給留在警察机关的驅逐出境权限树立一个确定的，不是只凭臆断的，并尽可能保障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标准。在这个建議上，我們依据的是七十年代議會已經通过的一个与此相似的建議。我担任申述建議的理由。我指出最近发生的政治犯被驅逐事件，里面有四个生在薩克森的人，四个所謂“异乡人”，部长在九月五日的会议上把李卜克內西和我都指为后一类人。誰不是在神圣的薩克森土地上出生的，在他看来都是沒有全部权利的，虽然如此，这却不妨碍欺侮和迫害那些在他心目中有全部权利的本邦子民，只要他們一旦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此外，我证明，驅逐出境是与居住和迁徙自由法相矛盾的。并且部长以前自己曾承认，驅逐出境需要一个另外的、合法的基础。部长对这话的回答仍是宣告說，我們如果觉得这地方不合意，就应尽量广泛利用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种說法引起議會哄堂大笑。他也由我这里得到了应得的答复。

我們要求把我們的建議作为最后討論，这根据議事規程是可以的。議會拒絕了这个建議，决定把它交給立法小組。这就是說，建議被葬入坟墓，因为議會眼前就要閉幕了。

这促使我在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向国会呈遞一件請願书，书中我对薩克森政府的驅逐出境的方式加以彻底的批判，并建

議，請國會用對居住和遷徙自由法第一章第三條的解釋，並根據刑法法典所規定的違法、犯罪和違警罪的定義來說明：1. 薩克森王室政府對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薩克森戶籍法第二章第十九條的解釋是同居住自由法和刑法法典的有關規定相矛盾的，所以也是與有關的中央法令相抵觸的；2. 薩克森戶籍法第四章第十七條由於德國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法的第三條和第十二各條而失效。請國會酌情決定將居住和遷徙自由法第三條加以修改，使像薩克森所發生的那種驅逐出境今後不可能再發生。

我把我的請願書附在二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議事記錄報道里，並且把兩者都單行印制分發給國會議員。

從國會的請願書審查委員會向全體大會提出的印就的詳細報告書中，可見委員會里沒有一票支持薩克森政府的觀點，雖則委員會中還有許多薩克森議員，包括我的德累斯頓國會委任證書的繼承人斯圖貝爾市長在內。委員會一致請大會決議把請願書送請首相作必要的處理，必要時為有關的帝國法令增一附件，務使薩克森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戶籍法及其執行情況與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有關居住和遷徙自由的帝國法令相協調。

191

我對於這個結果是滿意的。

一八八一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 最高法院的第一件叛國案

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民族自由黨議員馮·斯陶芬堡男爵在國會中討論延長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時說，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招致了無政府主義。一八八五年五月，瑞士總檢察官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報告中也包含有同樣的想法，不過遠較詳細並以很多事實為依

据而已。这恰恰证明了我們以往在国会中所屡次强调指出的东西。

无政府主义的組織在頒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前在德国几乎无人知曉。固然，它也有个别的信徒，但其数目是不值一提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頒布，莫斯特自一八八〇年起在《自由》报上开始以极其粗暴的形式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后，它才有較多的信徒，但仍不很多。这个法令所激起的愤怒，是无政府主义的适宜土壤，并且这种愤怒由于众多警察机关的殘酷惩治而增长起来，这些警察机关好像打算激起有关人們的暴动。在开庭辯論时許多被告自己承认，如果没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他們絕不会信从无政府主义。

192 但是法令所賦与警察的权力手段，对于許多官吏是一副刺激剂，他們开始把自己装扮成救国者。供他們动用的大量机密費，特别是在普魯士完全以賄买費供他們支配的机密費，不久就使煽动阴谋，教唆狂信者行刺执政人士来解恨当作一件有利可图的生意。事实上，所有自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六年以及更后的图謀行刺和行刺，警察代理人都曾参与其事并充作策动人。如果适当时刻到来，能把謀叛者捕获，使他受法院审讯，那末，警察就出现在救国和救社会的人的圣光之中，表示出它是不可少的，簡直是必要的，于是贊揚、報酬和荣誉如雪片飞来。

所有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鞋匠布略德、伦敦的作家維克多·达維、奥格斯堡附近莱希浩森的金匠阿尔伯特·李希登斯太格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达姆斯塔德和柏林的另外十个被告的訴訟，都是使被告負图謀叛国、违犯德国刑法法典第一一〇、一一二、一二八、一二九和第一三〇各条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九条的責任，这些就是后来一切叛国案和无政府主义者案的典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警察參議隆普夫建議，需要雇用一個奸細，其任务是与法兰克福及其四郊的无政府主义者相結交，以便把他們送进檢察署去，但也使他們准备行刺隆普夫本人，借以在他的

上級那里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由于热心救国而被无政府主义者看做十分危险的迫害者这样的人。监狱总监魏德曼，像他在审讯时自己供称，他觉得隆普夫把因贪污而坐牢的裁缝霍尔式这个适当的人介绍给他，是应当感谢的。这个人本是一个有一大家子人的穷鬼，现在以每星期十到二十个馬克的报酬为条件受雇于隆普夫。

首先霍尔式应设法确定，誰是一八八〇年十月在法兰克福散发的“反动的社会民主党”传单的制作者和传播者，这传单也曾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散发。为了骗取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任，他用警察的钱订购《自由》报并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加以传播。他并且取得隆普夫的同意，在他的朋友那里发动应由鞋匠布路德实行的行刺警察参議。他应在警察参議散步时把一小瓶镪水倒在他脸上。霍尔式自己准备好镪水，并连同犯禁的无政府主义传单和印这些传单的底版由达姆斯塔德带往法兰克福。霍尔式还竭力按照莫斯特指示的意思組成五人小组，分头去执行计划。 193

不消說，这些叛徒连同他們的一批伙伴都及时被捕并被解往柏林，那里已有許多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讯，主持审讯的是以办理霍德尔和諾比林案件而出名的市法官霍尔曼，他好像具有一种担任这个职务的特別能力。为了听取所希望的口供，經霍尔曼同意，把其他囚犯放在这些人的囚舍里来偷听。为了进一步迷惑这些被告，隆普夫也逮捕了霍尔式，以使他的伙伴仍相信霍尔式还是一个誠实的人，但当最高法院检察官得悉霍尔式是警察代理人时，就把他释放了。有一个放在囚犯身边的奸細后来在詢問证人时說，他由監獄里被帶出去六次，以送出被告們的秘函，这些信件每次都被查获。如果他能够把被告推入陷阱，就有由警务长斯提尔夫里德伯爵那里得到一千馬克赏金的希望。此外，如果他由于他的活动在这个案件中被判为告密者，预审法官霍尔曼曾給他一个提出免罪申請的希望。在审讯中还宣布了隆普夫給霍尔曼的两封暴露阴谋

的信件。在其中一封里隆普夫写道：“我不认为把霍尔式当做证人来审讯是适宜的，因为这样一来，他的背叛就会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这对他有害，而对我至少也是不受欢迎的。”

“我认为，就让閣下决定吧，因为做成的事情，只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为了对社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觉得我有责任用那些供我支配的手段来达到这目的。结果已证明这番努力是正确的。”

在另一封给霍尔曼的信上，隆普夫写道：“我认为，为了公众的和国家的利益，不泄露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手段会最严重地揭露了他，并拆穿他所扮演的卑鄙角色。

一个律师痛斥预审法官，他在为被告作辩护的话里说：（他认为霍尔曼先生是一个按照古时宗教裁判训练出来的很好的预审法官）毫无疑问，霍尔曼先生对口供起了作用。

经过九天审理后，多数被告都被判了罪。其中布路德二年半，裴式曼二年，达维二年半，克里斯杜派特二年，李希登斯太格一年又六个月的监禁，连同通常的附带刑罰。

按法律来说，除布路德及其同伴外，祸首罪魁——裁缝霍尔式也在被告之列，但按法律说，警察参議隆普夫和应负这些违背刑法典行为之罪的预审法官霍尔曼都应列为被告。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极沉痛的震动。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却立誓要报仇，并见诸行动。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三日夜晚八时，警察参議隆普夫被发现死在一座房子的前花园里。他的心臟被刀戳穿了两个洞。这次暗杀造成非常巨大的震动，惊惶失措的官署悬赏一万馬克緝拿凶手。几天以后，曼海姆的霍肯海姆有个鞋匠——朝森人尤利烏斯·李斯克作为此案的嫌疑犯被宪兵逮捕。当宪兵要逮捕他的时候，李斯克向他开枪，没有打伤他。经五个月审讯拘留后，李斯克被法兰克福刑事陪审法庭按企图枪杀宪兵和暗杀隆普夫的罪分别判以四

年監禁，褫奪公權十年和死刑，死刑就執行了。判處死刑只是根據間接的罪證，因為李斯克堅決否認有暗殺行為。 195

表明法蘭克福居民在隆普夫被刺後的情緒的是，在出殯時，他們故意拒絕參加送葬隊伍。送葬隊伍專由官員組成。

意見分歧

一個政黨即使非常團結，他們個人的觀點非常一致，在鬥爭過程中仍不免發生意見分歧而形成對立。沒有一個政黨以往或現在沒有這種經驗。社會民主黨也不例外。

那些當權的和必須捍衛自己的遭到攻擊的權力地位的政黨，要比那些為取得權力而鬥爭的政黨更加團結些。在為取得權力而鬥爭的政黨中，關於要遵守的策略，關於像用什麼方式和手段來鬥爭，對敵人可以或應該遷就到什麼程度，這個或那個鬥爭方法對敵人將起什麼作用，這個或那個鬥爭方法產生什麼樣的結果等問題，都容易發生意見分歧。

但是鬥爭方式的選擇並不是自由的；這個選擇取決於敵人的鬥爭方式和權力手段，這種方式和手段迫使攻擊者不是照他所願意的那樣，而是照他所必須的那樣來進行鬥爭。於是這上面發生意見分歧，意見分歧又通過各個人的氣質和性格，通過對一般情況和自己黨派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磨擦和意見爭執。

這樣的意見爭執在社會民主黨存在期間發生過，並且在黨生存期間這種爭執也將仍然發生，當然要根據情況改變它們的性質。但是如果要使一個黨內部的意見爭執轉為對黨有利，則第一個條件就是自由發表意見，這樣可以調和對立的見解。

這樣公开发表意見的可能性，是一個民主黨派維持生命的空 196

气，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这种可能性是极端缺乏的。党代表大会总是隔了很长时期并克服很大困难之后才能举行，而且单靠大会是不够的；那些間或在领导同志之間所召开的會議也只是个应急办法。在党机关报上公开地爭辯也很有困难和顾虑，因为这样就对敌人泄露了党的秘密。所以很明显，党内的意見分歧有时带有令人不快的性质，有时使双方都相信会鬧到分裂。

这种意見分歧很少公开，但毫无疑义，如果引起了公开討論，党员同志的絕大多数将反对任何引起分裂的企图。

我曾叙述过，领导同志对于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已沒有普遍的同情。报纸的态度也不停地受到一部分领导同志的不愉快的批評；个别同志竟与該报直接相敌对，对于推銷袖手旁观。但这并不能阻止絕大多数同志为党报尽其全責。当伯恩施坦担任編輯并規定报纸方向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分子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更加不滿，而这个方向不仅取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全同意，而且取得了党员群众的完全同意，这表现在讀者的迅速增加上。在七月間《社会民主党人报》管理部已經能够通告說，虽然往德国运送报纸造成浩大的开支，而仍收支相抵。这个消息使恩格斯写信給我說，这个出色的成績是以往任何被迫害的政党所沒有的。

197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憎恶在政府圈子里也在滋长。关于柏林及其四郊、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和莱比錫的城市与行政区繼續延长小戒严的所謂論据里面，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引来的話占着重要地位，在这里就非作别有用心之歪曲不行。但議会党团的两位发言人不仅不严厉駁斥这种方式，而且，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看法，要放弃該报，并設法使党与它断絕关系。这招致了編輯部方面的严厉駁斥，因此又引起发言人的反声明。此外，《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篇文章中声明，辯論并不是像情况所需要的那样进行的。这件事在我們中間引起巨大激动；特别是根据

我的意見，極力反對否認《社會民主黨人報》為黨中央機關報的說法，於是議會黨團連合在一起，還拉上奧艾爾和我（我們二人因落選已不屬於議會黨團），一致通過一個聲明。聲明說，關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正式性質是沒有疑義的，應當借最早的機會來聲明，本黨團完全同意該報的整個態度。

布律埃爾（一個被逐出漢堡而生活在哥本哈根的黨員同志）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的一篇文章里指責該報的態度，並且基本上站在被攻擊的議員的立場上，因而使這個爭論更加緊張。於是這是個信號，使大批國內外各地區的黨員同志都聲明站在《社會民主黨人報》方面。

有些人是既不贊成報紙的態度，也不贊成黨團的態度，卡爾·赫希柏格就是其中的一個。第一次意外事故保險提案的說明書中有些句子，就像：人們必須使工人確信，國家不僅是一個必要的，而且也是一個慈善的機構；不要把國家理解為專為保護社會上有產階級而設的機構，而要把它理解為給工人利益和工人需要服務的機構，並且，如果立法追求像意外事故保險法草案中所說的目的，則恐因此而引入社會主義因素的顧慮，就不該阻礙踏上這個道路，這些話把他迷惑了。赫希柏格在給奧艾爾和我的信里想使我們改變自己的錯誤理解。我為此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四日由德累斯頓寫信給奧艾爾：

198

“親愛的奧艾爾！

答謝新年祝賀，雖然稍微有點晚了。我的家眷一直到星期一下午，都在這里（德累斯頓），並且人們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到這里來。隨後我出外一趟，昨夜剛回來。一八八二年對我們也將是沒有什麼可喜的，然而不管將發生什麼事，我們總要堅持下去，总有一天受壓迫的會拍起頭來，到那時我們就要報復了……

卡爾（赫希柏格）也寫給我一封與此論調相同的長信，我已詳

細答复了他，并坚决保护《社会民主党人报》。卡尔是个单纯的博爱主义者，他从未了解运动，不能想像现代社会的阶级性。他相信，世界可以通过博爱主义改变过来，只需要少数几个有权威的人的善意，就万事大吉了。由这种观点就容易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大胆尝试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并且差不多把诺言和谎言都当作行动。

我回答他说，只要那一方面没有改变策略，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改变我们的策略。那里的人一直没有超出空洞词句和虚伪尝试，只有那里的人不再说空话而表现出真诚的行动，我们认真考察的时机才到来。那方面的人只要能郑重地改革，就再好没有了，这就会迫使我们表示态度，如果我们真正不理睬好人，那么也许就能使我们分裂，至少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害等等。

我不相信，我的讲解会有什么益处，他的整个天性反对较深入的理解，他会像往常那样，如果不能再回答，就停止笔战。

他每次觉得身体好了一点，就恢复他所作的不断后退和冲动的尝试，这使我有一点生气。在B.地的St.一定是被他邀去帮忙的，这个人做这事，当然较为灵巧。

199 我确也认为，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设法在这一年有更多的人来聚会一下。不是为了防止分裂，因为如果事情首先继续发展下去，分裂终究还是要来的。我认为没有疑义，我们的一部分领导人久已倦于斗争了，这一部分人以前就已被违心地推动前进，进到按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理解所不愿进到的地步，而今天所以还在表面上与我们的事业保持联系，或者是因为他不明白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认为他难以取得群众的同意，因而会丧失他一向的地位。

分歧点并不在于是否五年内要爆发革命。关于这可能有争执，但不是分裂的原因，要把这作为分裂的原因，那至少是大大的蠢事。宁可说分歧点在于把运动完全理解为阶级运动，它具有而

且必須具有偉大的、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不能與統治階級妥協，它如果這樣妥協，就干脆陷於滅亡，或者以新的形象并擺脫迄今的領導而再生。

所以妥協派和苟安派在我們中間已找不到信徒，因為不管是俾斯麥或者任何政黨都連一個勉強可以接受的改革方案也不能提出。一切這些事情仍只是嘗試，即使稍有成就，也只是片面的東西，這個片面東西更喚起對於整個工作（現今的當權者所不能做的工作）的需要。

我所以希望有一個較大的集會，是想人們能真正徹底而又無拘束地談一談事業的當前情況和可能的前途，這些都是可以說得明白，這些在基本觀點上是意見一致的。我只怕在這樣的集會上，那些持另一種見解而不願承認的人缺席或緘默。但這自然不是放棄集會的理由。

關於所提到的法令的延長，我認爲是毫無疑問的，除非此後一個抱着幻想的首相掌握大權（我不知那個幻想者應該是誰）或者在王位更替，第一陣熱情高漲之際，與以往作為標準的國法大不相同的和解心情占了上風。這些情況都是幾乎不可想像的。唯一也許200會有的讓步是撤消戒嚴，其他一切照舊，結果是搞出一個德意志帝國的結社集會法和可能把刑法加重到使非常法令成為多餘的程度。但是這也難以得到多數票，因為這樣不僅惡化了我們的處境，也惡化了其他一切政黨的處境，這樣自取懲罰，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一切黨派沒有例外地（除個別別人以外）都樂意有這個對付我們的法令存在，大家都用真正害怕的眼光等待着我們再自由地登上舞台的時刻；大家都知道，到那時候，我們的信徒就會以排山倒海之勢增加起來，因為展望將來，我們的經濟情況可能繼續惡化而不得改善，最多也不過是很暫時的、難以普遍覺到的改善。

所有的政黨都會本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所以大家都為我們將

来要变成的那种样子吓得要命，因此，到一八八四年^①就一定有多数派赞成继续延长法令效力，并受到反对派的默默感激。

我們的策略決不因敌人的策略而有絲毫改变。也許为了起一点作用，我們必須誓絕一切，否认一切，毀灭我們的机关报，閹割在国会和邦議會中的发言，簡單說来，我們必須放弃甚至使我們敌人有絲毫不合意的一切。而如果我們做了这一切，人們的要求还是越来越多，并且最后——仍不相信我們，而且宣布說，这一切都是企图騙人的偽善，現在才必須十分小心了。于是我們丟尽臉面。

文化斗争可作我們的鑒戒。如果說有人能对上面对让步并且能提供非常合意的帮助，那就是天主教会，尽管归根到底双方十分互相需要，他們却多么謹慎从事，多么互相猜忌。

201 我們唯一能做的而且必須做的是，不做无用的发动并保持冷靜，虽然在對我們不断进行的卑鄙行为的情况下，这是困难万分的，而且無論如何我們沒有一個人能照办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机会发泄一下他的憤怒和憎恨，因而就会发生許多足以使冷靜的人也暴躁起来的事情。在我們所处的地位，錯誤或者被看作錯誤的态度，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最后別无他法，只有容忍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退出党去。

我們只好大家一齐努力，尽可能避免錯誤，但我們不能完全避免錯誤，如果我們不願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把自己閹割的話。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的錯誤是我們敌人的錯誤；我們沒有推动，我們是被推动的。所以如果我們不願否认我們的原则，我們的策略，受我們的敌人規定的远多于我們能为自己規定的。

春季會議大概不会举行，因此我們不能寄以希望，宁可期望在大家可能早一点集会的秋天来举行會議。

①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屆时滿期。——譯者

如果由你們——你和 Gr. 办理所約定的事項，我劝你們在信件里要特別小心；实在糟糕，我們一部分人多么不能适应情况。关于附条，我可以供应你們較大部分。

向你和你的合家致以敬礼。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在当时的国会會議期間議會党团不缺少工作。政府又一次提出意外事故保險法草案，这草案以与先前草案不同的原则为基础，而更迎合资产階級政党的願望。格利伦貝格和凱泽尔对这草案作了发言。党团撤消一切非常法令的建議不再提出討論。

討論的一个主要对象是烟草专卖案，阿道夫·瓦格納教授及其伙伴想設法把这当作“被剝夺继承权者的财产”介紹給不相信这議案的群众。据說，专卖的剩余应作工人保險之用。議案所說却根本是另一回事。固然約計一亿六千五百五十万的剩余中有一小部分会用在意外事故保險，但絕大部分却被政府侵吞，用于軍事和类似的用途。烟草工业約有十万男女工人，人們认为有八万人可以继续工作，約八千人可以得到賠償，下余一万二千人一无所得。那么工資呢？八万人每年平均每人得到五百七十七馬克的低微工資。人們把大多数估計为女工。党团的主要发言人是福尔馬尔，他在一个出色的发言中批評这議案說，人們想用这个提案进行政治欺騙。后来討論时，哈森克萊維尔反对这議案的講話也很好。自由党人想在委员会中让給福尔馬尔一个位置，我們的反对是他們所极其欢迎的。党团拒絕了，它想不經委员会討論而將草案葬送掉。草案最后被丢到字紙簍里去了。

在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兩篇未具作者名字的文章，题目是：《撤消非常法》，作者在文章中討論了这个問題：撤消这个法令或者代之以加重一般法令，是否对党更为有益。作者表示，对党來說，保持这个法令是最值得盼望的，因

为这样会逼党来作殊死战。他在这里引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上的一段話，說：社会主义已不再是理論問題了，而单纯是个实力問題，这問題已不能在議會里，而只能在街头，在戰場上来決勝負了。

作者繼續說：人們必須約定作战計劃……都必須滿懷信心，相信沒有任何妥協，沒有任何和約可以轉變斗争的結果，而只有刀劍能決定勝負……公开的活动是强有力的活动。讓我們把一切躲藏、隱匿、不认賬和偽善当作与我們不相称的……我們公开而頑強地告訴我們敵人說：是的，我們是“危害国家的”，因為我們要想消灭你們。是的，我們是你們的所有制、你們的婚姻制度、你們的宗教和你們的整个秩序的敵人。是的！我們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是的！我們將以暴力对付暴力。是的！我們堅決相信即將到來的革命和解放，我們盼望着它，并且通过秘密組織、鼓动和你們法令所禁止而我們觉得好的一切东西，尽力为这作好准备……

这两篇文章(后来才知道它們的作者是福尔馬尔)非常惹人注目，一种人加以称赞，另一种人不贊成，第三种人閱讀文章时直摇头。我是属于后者的。恩格斯在得到我死的消息而写給我的一封信(前面曾引过一部分)里說：“根据福尔馬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所写的几篇文章(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可能撤消的問題)，福尔馬尔好像很进步。我会感到很高兴，如果在别的方面也证实了，我們會很好使用能干的人的。”

这也是我的意見，尽管如此，可是我可以声明不同意那两篇文章，我因而写信給恩格斯：

“萊比錫附近包斯多尔夫，一八八二年十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两月以前写的那封信——目前我把它放在萊比錫，沒有在手边——以及上月二十三日的信我都收到了。我非常引以為榮，

我的所謂死亡消息在你們那里以及在我黨同志方面引起這樣多的恐慌和同情。由此可見，朋友和同志是多麼器重我，這就使我負有一種責任，今後更要生活和盡我的責任。我暫時同死神訂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我想，這時間不僅足夠閱歷到舊東西的崩潰，而且可以享受一大段的新東西。

究竟是誰把我死的消息散布出去，直到現在我還找不出來；我簡直不知道，消息起初發生在哪裡。我只是由我妻當我患病期間在萊比錫收到的各種刊物中看見，報刊上登載着各式各樣病危的消息。至於說我死去的消息，是我已經遷居到這裡以後，由於巴黎的我黨同志給我妻的一份慰唁電報才知道的。

這個電報使我那可憐的妻子吃驚不小，起初她以為巴黎人知道我的事比她知道的還多，也許是出於愛護之意，人們把這消息瞞着她。

總之，消息是出於捏造，我們大家也就滿意於它是假的。我現在和李卜克內西一同住在離萊比錫幾小時路程的包斯多爾夫。一個苦村子，有幾百居民，位於一個像盤子似的平原上。好處只是，這裡是萊比錫——里沙——德累斯頓和萊比錫——多貝爾恩——德累斯頓各鐵路綫的中心點，所以往萊比錫的鐵路交通很便利，我們的家屬來往方便。李卜克內西和我共住一座房子，每人都有足夠的房間，家屬偶爾也能在此過夜。

今後我希望我寫信能及時些，寫作方面勤快些。多年以來這兩方面我幾乎無能為力。

我聽說，一開始你猜想《社會民主黨人報》上關於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兩篇‘文章’是我寫的。這一段時間內你已知道，並非如此。文章寫得好並且原則上正確，但策略上錯誤。如果我們說福爾馬爾所建議的那種語言，我們就會在四個星期以內按我們的刑法法典的第八〇、八一、一二八、一二九各條全體坐牢，判上五至十

年的徒刑；如果報紙也要用同樣的風格來寫，則每個推廣報紙而被抓到的人都會受到同樣處分。

這種話簡直是不可能說的，即使原則上很正確；我們會因此自招毀滅，所以這話決不准說。

205 當福爾馬爾本人在充分估計到我們的境遇的情況下，一到國會會期將結束時就照例離開德國，而在下次開會之前是不踏德國土地的，這時我更難了解福爾馬爾的這種話。這事的原因是，他以往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活動，德國警察知道得很清楚。據我看，福爾馬爾有理由害怕，人們一旦能在國會會期之外抓住他，就會把他逮捕並提起公訴。他現在卻向處在羣中的我們推薦一種使我們必然成為犧牲品的策略。但是你們在國外完全想不到我們的處境，並且不知道我們如何隨機應變，以免觸犯人們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那些刑法條款。我認為毫無疑義，人們會有一天對我們試用有關秘密和非法組織的第一二八和一二九條，人們會把我們捉起來，關上幾年。難道我們還可以把自已公之於眾而自行告發嗎？

我要寫反對該文的文章。我也不認為，取消非常法令和加重普通法令對我們是一種損害並會把我們的黨同資產階級反對派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對我們的經濟情況已有很大的不滿，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敵對，這對我們真正是件好事；因為二者合在一起就加速了災難的到來，災難一旦發生，資產階級的口頭上的英雄們就必須退出舞臺，我們的影響和我們的領導就成為決定性的了……

李卜克內西和我都很愉快地看到你想動為《社會民主黨人報》寫稿；我們尤其非常贊同你關於俾斯麥的社會主義和拉薩爾的口號的文章。今天黨內最熱心的拉薩爾分子的态度是，他們容許對拉薩爾的批評，只是批評不准用敵對的口吻，這你自己就會避免。那末只管努力干吧，越多越好。因為李卜克內西在這月中旬就要



开始服刑，所以你的文章加倍受欢迎，因为按现今的监狱规则，秘密投稿（公开投稿从来就不行）更加困难了。因为李卜克内西要受两起不同的刑法，这两起刑法要通过由最高法院根据他同我一样提出的已实现的上訴而做出的最后判决（可能还会减轻。——編者），才能宣判，所以他能在国会开幕时出獄。

我有意在十一月一日开始服刑。我若是通过上訴不能把那八条判决总计五个月的徒刑有所减少的话（这是很难想像的，因为最高法院非常反动并且在某些方面它的权限也很受限制），我就希望最后判决能把五个月减为四个月，那末我在三月間就可以把我的处罰課題完卷了。

承你介紹各书，多謝^①；我将想方设法把它们搞到手。

如果写信給馬克思，請代致候；我还請向杜西問好。

再来信时請仍用該通信地址。李卜克内西囑代致意。

你著作上需用的俾斯麦的社会法令草案，我們当代为設法。这人的做事方法拙笨已极；像《地方通訊》所造成的这种过失是不該发生的。还有他之所以放弃国家意外事故保險銀行的旧計劃（这是他迄今唯一合理的意見），是因为他为沙夫莱甘言所誘，須由你給他以应得的教訓。

沙夫莱的小册子《强迫互助救济基金》（杜宾根，一八八二年，H. 劳卜斯出版社）我最近閱讀过了。其目的是为最近的法令草案和俾斯麦的《社会改革》作宣传，并且拥护一个純粹制造混乱的組織。如果你連帶着給沙夫莱先生严厉批評，也不妨事。

敬礼和握手。

你的奥·倍倍尔。”

我对福尔馬尔的文章的回答，发表在十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目是：《撤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

① 恩格斯在他的信里介紹給倍倍尔研究的 G. L. 馮·毛略尔关于馬尔克制度的著作。——編者

这篇文章中，我坚决反对我所认为是福尔马尔的文章的基础的錯誤論斷，并认为他所建議的策略为不可能而加以拒絕，因为这策略将使党毁灭。在那时候敌人的报刊密切注意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内容，所以对这个笔战也大加注意。它們像以往常有的那样，又一次看到党内要发生分裂了（因为人們盼望什么，就爱相信什么），并按这个意思向它們的讀者报道。自然，我的文章使党内右派分子很滿意，虽然說实在的，并没有使他們滿意的理由。恩格斯又认为，我把福尔马尔的文章看得过于严重，并且与他的习惯相反，作出各种各样玄妙的暗示，說我們會早在非我們自己所相信的时候摆脱这法令。

为此我在十一月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由監獄里偷偷帶出来回答他：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正在关门以前收到……因为我現在有机会偷偷地给你写几行字，想尽可能答复你最近的一封信，那封信自然不在手边。

我把福尔马尔的文章是否看得过于严重，暫且不談。《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对于我們的人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他們絕得不到其他东西来閱讀，也听不到其他的东西。如果不駁斥像福尔马尔那樣的意見，那就是承认它普遍适用，結果是，人們也将要求根据它来行动。所以現在比从前更必須避免散布那些不可能容許的意見。简单說来，这就是我所以严肃对待这件事的理由。至于說我因此会得到菲勒克的贊揚，这在我既不感愉快，菲勒克也沒有贊揚我的理由；他正从这里面努力为自己謀利益，却不懂或者不想懂这在半官方出版物上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出版物以开玩笑的口吻喊叫分裂，于是非常愚蠢地造成分裂。福尔马尔一旦身在瑞士，就容易忘掉我們这里的情形；如果他在德国，他就会讲道理得多，这由他那关于专卖的发言可以证明。

如果你能不那末玄妙地說明一下，我們如何能够差不多、也許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擺脫这个法令，那我就感到愉快了。我只能想到其中的两种状况，我要試一試能否猜中你的意思。

或者我們不久又遭到一次商业和工业危机，这将由北美洲开始，反冲到欧洲来而使它陷于混乱，或者欧洲大战爆发，于是其作用之一无疑是欧洲革命。我想不出第三种状况。

我认为欧洲战争，至少是在可以預見的期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确信所有欧洲各国的內閣都完全认清并且害怕大战的后果。人們不会徒劳无益地去設法草草結束埃及問題^①，虽則确信英国的势力将因此大大巩固起来。俾斯麦显然想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外部冲突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無論从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看都最不需要战争。贏不到什么，因而只会受损失，內部的局势是这样，除了工人階級的憤怒外，資產階級由于宣战也必有四分之三宣告破产，这就是說，这个制度完蛋了。我看，除了不缺乏最好的願望的俄国以外，沒有一个国家現在希望欧洲混乱，但是俄国由于內部弱点并不能利用这种混乱。

所以我认为在最近大战是不可能的，但不应由此就說缺乏战争的原因。导火綫到处都很多，偶然事件就能引起爆发。但是偶然事件不是人們所期望的因素。

另一种可能是一次大規模的經濟恐慌，我觉得，我多年来向我們的人指出的美国危机現在很临近了。我最近几年的流浪生活使我不能对于这个发展作更詳細的探討，但近几个月的美国貿易決算所显示的总額，我觉得很足以說明經濟恐慌不久就要发生，于是欧洲的出口工业就完了。于是，特別在英国，革命的時刻就到了。

德国近一年半來我們所覺到的那一点点亢隆气象（如果人們

^① 指一八八二年埃及人民为了反抗英法的財政控制在亚历山大起义，而英国以此为借口进行侵略的事件。——譯者

要这样称呼)全是靠着出口的增加才能存在。它如果有个漏洞,我們就会发生比一八七四年的恐慌更厉害的恐慌,因为我們还没有从那次恐慌中恢复过来。我們的钢铁工业又已发生严重的动摇;事实上交易所市价表上的标价是騙局,而是以低得很多的价格出卖的。钢铁生产者的同业公約,如所预料,早已破坏,又在竭力进行过剩生产。紡織工业看来也好不了多少;这方面也是以出口为主,如果出口遭到反冲,則两个主要工业部門都将陷于瘫痪,而且瘫痪还要扩大。总之,美国的危机在作为欧洲革命的警钟方面,有比欧洲战争大得多的可能性。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听一听你和馬克思关于我的看法的意見。我希望,在耶穌聖誕节能暫释出獄。

如来信,請不要提这封信的日期,以免使他人受累。

馬克思健康恢复,至为欣慰。我謹向他和杜西致以衷心的問候。魯·梅耶尔在发表洛貝尔图斯的信件和文章的后記中写道:‘很可能,馬克思还能活到用他的体系作尝试的时候。’虽然他写这话只是为了使俾斯麦生气,他說得却可能是对的,那才是好极了。

你們讀到梅耶尔的那些书嗎?我在監獄里讀过了。梅耶尔非常頌揚你們二人并且对于你們所給与的好的招待显然感到非常荣幸;自然这个荣誉你們須与給他以同样尊敬的五个紅衣主教平分。因为馬克思既已常被他的好朋友——那些敌人称为社会主义的教皇,那末他也会容忍这一伙人的。

洛貝尔图斯是我从这些信件和文章中才認識的。他無論如何远远超出我們的所謂国民經济学者的一般水平。这人有判断力,有思想,但作为保守的社会主义者,自己本身有极其严重的矛盾。

他也竟想‘反駁’馬克思的《資本論》;他的遺著却像是不要发表的,这样对他本人倒是最有利的办法。

你的奧·倍倍尔。”

在上述的討論中間，黨的領導人員一般都確信，在一次集會中徹底談談，像我在一月四日給奧艾爾的信里所提倡的那樣，是迫切需要的。在第三十五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通知开会，为的是使黨員同志放心確信对所爭執的問題要作徹底討論。出席會議的是議會黨團，《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部和管理部，奧艾爾和我。會議時間訂為三天，八月十九到二十一日，議程是：关于传单事务的策略、組織、整頓，黨机关报的情况和立場，对德国报刊的态度。这指的是对无色彩的報紙的态度，这些報紙是由黨員同志在各个地区出版的，它們逐漸以牽制作用干預黨的事情，并有国会議員作它們的撰稿人。議程上還有：設置黨的档案处，基金事項，一八八三年春季代表大會的召开，建議和申訴。

這是一個內容很豐富的議程，沒有一個黨的問題沒有接觸到。如果对會議的必要性還有懷疑，則協商的情形也可以把它消除了。因为討論的情形絕不能發表，所以討論時籠罩着一種使人振奮的開誠相見和毫無顧慮的氣氛。人們互相徹底說實話，這一個或那一個把多年存在心里的東西，現在都傾泄出來。所訂的三天時間真正都用在討論上。其作用像是一次使空氣清爽的陣雨。誤會和錯誤都澄清了，各種個人分歧通過坦率的討論都消除了。

會議的作用也尤其表現在下次國會會期中，在這次會期中，議會黨團比以往更加堅決和更加團結地進行鬥爭。

會議的最重要的決議是：明年春天應再在国外舉行一次由一大批地方黨組織建議的黨代表大會；并在蘇黎世建立黨的档案处。 211
當一八八四年施呂特爾遷到蘇黎世以後，他擔任了黨档案处的建

立和领导工作。

一八八二年我們苏黎世的营业情况也改善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党的刊物都在用瑞士协会和人民书店的名义經營的商店里印制，該店以往一直掌握在一个瑞士同志的手里，现在轉为我們的财产了。并且这个商店是由 C. 康采特（他由庫尔迁居苏黎世）领导，牌号是 C. 康采特，瑞士合作印刷社和人民书店。企业的資本是我們通过每个五法郎的无息貸款券筹集起来的，由奥艾尔、迪茨、格利伦貝格、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吁請认购的。

休息的日子

十一月初我又一次进入監獄，这次是在萊比錫，为了服完对我判的徒刑。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萊維尔为了同样目的已在我之先入獄，但我們并没有联系。因为我的刑事事件还上訴到最高法院，沒有处理，該院須在上訴判明后才能对地方法院的判決作出最后判決，所以我还希望在耶穌圣诞节可以暫释。这是又一次幻想。最后判決终于下来了，把我被判的五个月徒刑减为四个月。于是我可以确定在三月初离开監獄了。

萊比錫監獄有一件合人意的事，即准許我妻每星期当着—个官吏的面来探望我一次。当我有一天同她談起我的德累斯頓传单案时，那官員走到一个抽屉那里，拿出一包传单，放在我的面前。212 使我感到驚訝的是，这是我—八八—年十月在德累斯頓被沒收的传单，根据法院判決应已焚毀了。我惊奇地問，这些传单怎么会到了萊比錫，他回答說，这些传单已經游遍全国。这样看来，官吏們因为党员同志沒有散发，所以对这些传单也特別感兴趣。

我的精神产物不只这一次荣获这样奇特的推广。在德累斯顿有一篇計二百册《妇女和社会主义》被沒收了。法院判令銷毀这二百册书，因此应当把这批书放在炉火中处死。但是后来我从最可靠方面听说，遭到烧毁的只有少数几册，其余的都流入法官手里。出版者失掉了所沒收的二百册的价款，作者见这种书在这班人手中，倒很满意，因为若不是沒收，这作品很难达到他們的手里。世界上一切事都是这样有它坏的一面，也有它好的一面。

当我在監獄期間，薩克森政府宣布延长萊比錫和四郊小戒严的理由。主要理由据說是，我們二人（李卜克內西和我）住在紧靠戒严区边界的包斯多尔夫。并且为了把有关地区这个危险情况也在外表标志出来，在包斯多尔夫設上一个宪兵崗哨。一批从柏林来的柏林流亡者，有一天由萊比錫到包斯多尔夫来拜訪我們，他們返回萊比錫后都被搜查了身体。这一切固然是非常可笑，但我們这里有人把这叫做“統治”。

十二月二十二日，恩格斯寄来一封回答我十一月十日的信的复信，其中說道：

“亲爱的倍倍尔！

我希望，你后天能有二十四小时的暫释，这样就能毫无困难地得到这几行字。

我上一封信里你认为牵强的那一段，不过是說，我从一些事件预料将撤消非常法令，或者是革命性质的事件（一个新的打击或者例如在俄国召开国民大会，其反应将立即在德国表现出来）或者毕竟把运动推动起来并为革命作准备的事件（柏林的王位更換，俾斯麦死亡或下台，二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新时代”）。 213

我觉得美国的危机同这里的危机和还没有处处消除的德国工业上的困难一样，并不是真正的危机，而是来自上次危机的生产过剩的余波。德国上次的商业恐慌是由于几十亿的騙局而提早到

来，这里和美国的商业恐慌都是在一八七七年这个正常时候来到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繁荣时期像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七年那样把生产力提高得那末多，由于这种情况，在这里和德国都发生了与一八三七年到一八四二年相似的对于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棉花和铁的慢性压力。市场仍不能消化所有产品；因为美国工业大体上仍从事于保护国内市场，那里在生产产品迅速加多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个地方性的中间危机。但这到最后只有这个作用，就是缩短美国获得出口能力并在世界市场上成为英国的危险竞争者的时间。所以我不相信（马克思具有同样见解）真正的危机会大大早于它应当发生的时候而到来。

我认为一场欧洲战争是个不幸，这次战争将非常严重，到处要燃起多年的沙文主义，因为每一民族都将为生存而斗争。处在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者的整个工作都将变为无用而遭到毁灭；我们的党在德国一时也将为沙文主义的洪流所淹没、所冲毁，在法国也是如此。唯一可能发生的好事是恢复一个小的波兰，但这也是来自革命的结果，而且是自然而来的，如果战争失败，俄国的政体会完全另外的、宁可说是保守的意义，而不是由革命方式获得的意义。一个这样的战争，我相信，将把革命推后十年，不过将来的革命自然是更加彻底。此外，战争又在眼前了。俾斯麦与奥地利的同盟，同一八六七年卢森堡事件中与南德意志的同盟表现得完全一样。至于是否会在春天发生什么事，我们等着瞧吧。

你的关于德意志工业情况的消息，使我们很感兴趣，特别是明确地证实了，钢铁工业家的同业公约破裂了。这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没有最卑鄙的欺诈就不能生活的德国工业家那里，是最不能持久的。梅耶尔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直到现在没有看到，所以你告诉我们的也全是新闻。把马克思形容成有他的红衣主教们陪伴，是在意料中的，如果梅耶尔从红衣主教曼宁那里能直接走向

馬克思，這總是使他感到特別喜悅，于是他永不能保持緘默了。

洛貝爾圖斯在他的《社會信札》里已接近剩餘價值的端緒，但是他不能再走近些。否則，他那如何救濟負債的容克地主的全部願望就會完結了，而這是這個好人不會願意的。但是如你所說，他比那群德國庸俗經濟學者，包括只以拾我們的唾餘為生的讲坛社會主義者在內，要好得多。—— ——

我昨天把小冊子的最後稿子寄到蘇黎世去了，即關於馬爾克制度的一个附錄和德意志農民簡史。因為毛略爾寫得很不好，非常雜亂無章，初讀時很難看出事情的眉目。我一拿到樣張，就把簡史寄給你，它不是僅僅摘錄毛略爾的著作，而且也間接地加以批判，還包含許多新東西。這是我幾年來研究德意志歷史的最初成果，我很高興，能夠不首先把它獻給教師和其他‘學者’，而獻給工人。

現在我必須結束了，否則這封信就趕不及晚班掛號寄出。普魯士好像還沒有到檢查掛號信的程度，直到現在，一切通訊都進行得正常，由於長期的經驗，我這種判斷是相當可靠的。

所附聖誕節賀片，請轉交你的夫人，並代致候。

你的弗·恩格斯。”

人名索引

(按汉字笔划排列。条目后系原书页码，
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二 画

丁台尔(Dinter) I 122.

三 画

马赫尔(Macher) II 79.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 II 9, 232.
马代(Madai) III 66.
马因兰德(Mainländer) III 36.
马容克(Majunke) II 285, 286, 361.
马林克罗特(Mallinckrodt) II 124,
192, 235, 266.
马隆(Malon) III 81, 121.
马尔巴赫(Marbach) I 61.
马奇特森(Marquardsen) II 137.
马尔兴(Marsching) III 105.
马尔顿斯(Martens) I 99.
马克思(Marx) I 60, 66, 68, 110, 117,
126—128, 198, 199, II 10, 18, 23—28,
56, 63, 82, 97, 142, 149, 157, 160, 165,
168, 185, 232, 250, 256, 258, 259, 278,
280—284, 293—295, 339, 343, 350,
III 11, 49—57, 59, 61, 63, 75, 77, 90,
141—143, 148—152, 158, 184, 196,
206, 203, 213, 214.
马克思夫人(Marx Frau) III 149.
马克思·杜西(Marx, Tussy) III 149,
183, 206, 203.

四 画

巴赫姆(Bachem) I 119.
巴考芬(Backofen) III 163.
巴尔, 海尔蒙(Bahr, Hermann) II 248.
巴枯宁(Bakunin) II 244, 250, 282.
巴莱斯特伦(Ballestrem) II 226, 287.
巴赞(Bazaine) II 169.
巴普斯特(Papst) II 109.
巴士基(Paschky) II 360.
比贝施太因, 黑歇尔·冯(Bieberstein,
Marschall v.) III 17.
比得曼(Biedermann) I 61, 98, 154, II
156, 161, 164, 186, 188, 190.
比尔克特(Birkert) III 133.
比恩包姆(Birnbaum) II 216, 360.
比特尔(Bitter) I 88, 90.
比尔格尔(Bürger) I 188, 191, II 89.
比尔克里(Bürkli) I 113, II 339, 340.
韦希特尔, 冯(Wächter, v.) I 102—
107, II 123, 126, 132.
韦尔凯尔(Welcker) I 121, 142.
邓特勒(Dentler) II 347—349.
邓泰, 冯(Denzin v.) II 285.
邓克尔(Duncker) II 123, 174, 175,
212.
夫赖塔格, 伯恩哈特(Freytag, Bern-
hard) II 219, 220.

毛奇(Moltke) II 134, 153, 161, 170,
265, 266, 310.
毛特斯(Mothes) I 61, 62.
文克(Wenck) I 61.
文采尔(Wenzel) I 193.
文克, 冯(Vincke, v.) II 124.
瓦撒(Vaillant) II 165.
瓦兰丁(Valentin) II 264, 265, 303.
瓦格纳(Wagner) II 345, III 171, 201.
瓦盖纳(Wagener) I 69-71, 118, II
33, 40, 46, 124, 140, 176, 181, III 58.
瓦尔迪克(Waldeck) I 88, II 124, 139.
瓦尔特希(Wahlteich) I 59-63, 75-
78, 80, 81, 131, 167, 171, 172, 180, 190,
191, 205, 212, II 203, 216, 229, 234,
236-238, 241, 252, 264-267, 277,
290, 295, 324, 338, 365, III 11, 34, 39,
46, 50, 62, 64, 83, 94, 118, 133, 158,
159, 168, 182, 183.
瓦劳(Wallau) II 132.
瓦尔斯特(Walster) II 167, 234.
瓦尔特(Walther) (拉萨尔蒙) II 277.
瓦尔特(Walther) (进步党人) II 365.
瓦尔蒙堡(Wartenburg) I 168.
瓦茨多尔夫, 冯(Watzdorf, v.) II 137.
贝克(Beck) III 88, 89.
贝克尔, 伯恩哈特(Becker, Bernhard)
I 87, 95, 123, II 10, 29, 35, 36,
295.
贝克尔, 海尔曼(Becker, Hermann) I
88, II 123, 131, 132.
贝克尔, 菲力浦(Becker, Philipp) I 113,
169, 182, 210, II 18, 23, 25, 74, 79,
81-83, 85, III 97, 98.
贝内德梯(Benedetti) II 154, 155.
贝善(Beschan) II 79.
贝塞勒(Beseler) II 358.
贝图苏-胡克(Bethusy-Huc) II 127.

五 画

台麦(Temme) II 222.
台森多尔夫(Tessendorf) I 209, II 270
-272, 322, 323, 330, 333, 335, 340,
341, III 24, 34, 96, 97.
伯恩哈德, 冯(Bernhardi, v.) I 210, 211.
伯恩斯多夫(Bernsdorf) II 39.
布拉克(Brake) I 196, II 51, 53, 55,
65, 69-71, 74, 75, 79, 81, 84, 95-97,
160, 166, 188, 191, 203, 204, 218, 221,
227, 232, 238, 241, 277, 278, 281, 283,
284, 292, 294, 295, 297, 323, 325, 327
-329, 332, 335, 365, 366, III 14, 20,
37-41, 43, 45, 51, 59, 63, 64, 75, 79,
97, 168.
包斯(Boas) I 193, II 213.
包奈(Bohne) I 85.
包塞(Bosse) III 33.
布劳荣尔(Bleuler) I 101.
布洛斯(Blos) II 259, 261, 332, III 28,
45, 62, 144, 145, 175.
布鲁姆, 汉斯(Blum, Hans) I 61, 93,
154, II 136, 137, 144, 217.
布鲁姆, 罗伯特(Blum, Robert) II 144,
317, 319.
布隆赤里(Bluntschli) I 142, 148, II
137.
布拉士(Brasch) II 328.
布拉斯(Brass) I 68, 123.
布劳埃尔(Bräuer) II 65.
布劳恩, 卡尔(Braun, Karl) II 123, 173.
布雷特(Bredt) II 46.
布雷麦尔(Bremer) I 191, II 70, 71,
74.
布略德(Breuer) III 192, 194.
布律埃尔(Breuel) III 197.
布罗克好斯(Brockhaus) I 103-105,

107, 108, II 217.
 布律克曼(Brückmann) I 187.
 布赫尔(Bucher) I 68, II 10, 18, 26, 27, 162, III 11, 58.
 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 I 61, 63.
 布士, 摩利茨(Busch, Moritz) II 174.
 弗兰茨(Franz) I 85, II 101, 324.
 弗雷塞, 尤利乌斯(Fresse, Julius) I 144, II 94.
 弗雷斯勒本(Freisleben) II 137, 138.
 弗莱西奈(Freycinet) II 169.
 弗利克(Frick) II 329, 330.
 弗里德曼(Friedemann) III 166.
 弗里登塔尔(Friedenthal) II 177.
 弗里登兰德(Friedländer) II 213.
 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 Karl) II 123, 162.
 弗里森, 冯(Friesen, v.) II 131, 216, 365.
 弗里茨舍(Fritzsche) I 59—63, 69, 75, 76, 80, 81, 98, 99, 121, 122, 135, 140, 141, 160, 164, 165, 195, 196, 197, 200, 202, II 10, 29, 36, 66, 69, 75, 96, 141, 159, 174, 255, 268, 273, 274, 289, 290, 328, 329, 332, 334—337, 365, III 20, 29, 30, 50, 59, 64, 67, 96, 97, 123, 133, 134, 158, 168.
 卡培尔(Kapell) II 272, 277, 327, 332, 365, III 144, 169.
 卡拉格欧维奇, 彼得(Karageorgewitsch, Peter) III 89.
 卡尔多尔夫, 冯(Kardorff, v.) II 195, III 14, 127, 128, 156.
 卡尔亲王(Karl) I 117.
 司透耳堡(Stolberg) II 356, III 9, 12.
 甘必大(Gambetta) II 169, 307.
 古特曼(Gutmann) III 85.
 吉塞罗夫, 冯(Kusserow, v.) II 47, 113.

加布伦茨(Gablenz) I 137.
 加冈(Gagern) I 116, 117.
 加伦伯爵(Galen) II 334.
 加里波第(Garibaldi) I 117, 153, II 38, 249.
 加尔维(Garve) III 133, 136, 144.
 汉恩(Hahn) III 34.
 汉士(Heinsch) II 272, 347, 349.
 汉森(Heinzen) II 217.
 汉里希斯, 燕妮(Heynrichs, Jenny) I 102.
 尼特哈迈尔(Niethammer) I 187, 190.
 皮尔斯(Pils) I 85.
 石拉德(Schrader) II 65, 74.
 司滔莱(Stolle) I 85, 122, II 234, III 169, 175.
 史特莱特(Streit) I 95, 113, 150, 151.
 史特鲁斯贝格(Strousberg) II 134.
 史特鲁维(Struve) I 142, 147, 148.
 史图特曼(Stuttman) I 99, 191.
 左尔格(Sorge) II 181, III 97.
 石威林-普查尔(Schwerin-Putzar) II 124.
 龙格, 燕妮, 父姓朗克思(Longuet, Jenny, geb. Marx) III 149.

六 画

毕希纳, 路易(Büchner, Louis) I 87, 141, 179.
 安德烈克(Andreack) II 49, 50.
 安格尔施太因(Angerstein) I 120.
 安诺尔德(Arnold) III 85.
 达克, 冯(Daake, v.) II 65.
 达尔曼(Dahlmann) I 116, 117.
 达尔维克(Dalwigk) I 64.
 达麦尔(Dammer) I 61, 76, 80, II 10.
 达斯巴赫(Dasbach) II 260.
 达士诺(Daschner) II 259.

达维 (Dave) III 192, 194.
多布勒 (Döbler) III 112.
多灵格 (Döllinger) II 226.
艾伦贝格, 冯 (Ehrenberg, v.) III 88.
艾尔哈特 (Ehrhart) III 17, 18, 45, 78.
艾希尔斯多夫尔 (Eichelsdörfer) I 89,
92, 96, 97, 114, 147, 166, 180, 191.
艾勒斯 (Ehlers) II 74, 325.
艾希勒 (Eichler) I 69—72, 75, II 9.
艾斯纳 (Eisner) I 125.
艾拉斯 (Eras) I 61, 93, 111, 124.
艾乃尔 (Eynern) I 67.
伊斯拉勃 (Ißleib) I 125, 177.
考茨基 (Kautsky) III 88, 90, 133, 150,
151.
考得尔, 冯 (Keudell, v.) I 74.
考比茨 (Kobitsch) I 191, III 30.
考乃尔 (Kohner) I 80.
考而平 (Kolping) I 40.
曲恩 (Kühn) II 114, 166, 191, 325.
列伯夫 (Lebouef) II 152.
列文 (Lewin) II 348.
米尔克 (Milke) I 193.
米歇尔 (Miquel) I 66, 67, 89, 116, II
124, 129, 131, 132, 140, 176, 193, 300.
西培尔, 冯 (Sybel, v.) II 20, 46, 126.
托马斯 (Thomas) II 324.
托特 (Todt) II 98, 244.
齐希尔诺 (Taschirner) II 98.
齐格勒 (Ziegler) I 139, II 134, 199,
212, 331.
齐委夫斯基 (Zielowsky) I 200, II 215.
伏格特 (Vogt) II 12.
艾希霍夫 (Eichhoff) II 78.
弗罗梅 (Frohme) II 115, 260, 272, 327,
329, III 133, 175.

七 画

伯恩施坦 (Bernstein) I 82, II 97, 244,
259, 276, 277, 337, 339, III 48, 49, 51,
53—55, 57, 62, 65, 88, 90, 133, 146,
148, 150, 151, 169, 196.
伯麦尔特 (Bühmert) II 101, 360.
克劳塞维茨 (Clauswitz) III 34.
克莱麦·冯·都斯 (Crämer von Doos)
I 147, 185.
克雷茨纳赫 (Creuznacher) II 70.
克拉普卡 (Klapka) I 153, 154.
克莱曼 (Kleemann) III 86, 181.
克莱斯 (Klees) II 74.
克莱因 (Klein) I 198.
克莱斯特-瑞曹夫, 冯 (Kleist-Retzow,
v.) III 13, 14.
克劳茨 (Klotz) II 211, III 173.
克尼灵 (Knieling) II 167.
克瑞菲尔 (Knöfel) I 85, 133.
克瑞尔 (Knorr) I 88.
克莱克尔 (Kräcker) III 175.
克莱斯托维尔 (Krahnstöver) III 41,
42.
克劳塞 (Krause) I 191.
克雷布斯 (Krebs) I 168, 169, 193.
克里默 (Kremer) I 110.
克里斯杜派特 (Kristupeit) III 194.
克吕格尔 (Krüger) III 118.
克鲁姆赫 (Krummacher) II 12.
麦耶尔, 古斯塔夫 (Meyer, Gustav) II
33, 52, 117, 122.
麦耶尔, 卡尔 (Mayer, Karl) I 115,
147, II 94, III 107.
狄斯特尔坎布 (Diestelkamp) III 171.
狄特曼 (Dittmann) I 89, 92.
杜埃 (Douai) III 99.
杜林 (Dühring) II 232, 337, 338.
乌特克 (Wuttke) I 61, 81, 82, 121, 140,
141, 161, 165, II 18, 25, 44.

- 亨利希 (Heinrich) III 159, 160, 166.
- 希尔曼 (Hillmann) II 35, 36, 41, III 133.
- 希尔斯, 卡尔 (Hirsch, Karl) I 193, II 65, 167, 186, 203, 216, 229, 230, 288, 326, III 44, 49, 50, 52—55, 60—62, 67—69, 72, 73, 75, 77, 78, 82, 146—148, 150.
- 希尔斯, 麦克斯 (Hirsch, Max) I 98, 99, 104, 107, 113, 114, 150, 168, 169, 196, II 105, 139, 218.
- 希尔塞门采尔 (Hirsemenzel) II 78.
- 希尔采尔 (Hirzel) I 60, 113, 115, II 237.
- 希察格尔 (Hitzinger) II 88.
- 李希登斯太格 (Lichtensteiger) III 192, 194.
- 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I 21, 61, 68, 71, 123—127, 141, 155, 156, 158, 161, 164—166, 169, 170, 176, 178—180, 185, 191—194, 196, 203, 211—213, II 9, 18, 23, 25, 28, 32, 33, 44, 45, 48, 49, 54, 59, 61, 63—65, 67, 70, 81, 89, 92, 94, 95, 97, 105, 107, 109—112, 121, 136—139, 141, 145—149, 156—160, 164, 166—168, 172—174, 176, 178, 181—185, 187, 190, 192, 197, 200, 203, 204, 213, 217—221, 226, 229—231, 233, 234, 236, 241—243, 254, 256—259, 262, 263, 265, 268—270, 272—275, 277, 279, 282—285, 287, 290, 292, 293, 295, 297, 303, 304, 326—330, 332, 336, 338, 339, 354, 357—359, 362, 365, 366, III 20, 21, 28, 35, 39, 40, 46—50, 52, 55, 64, 67, 70, 77—79, 82, 94, 97, 102, 112, 122, 123, 133, 136, 141, 146, 150—152, 158—162, 167, 169, 173, 175, 176, 181, 182, 185, 187—189, 202, 204, 208, 211, 212.
- 李斯克 (Lieske) III 194.
- 李波特 (Lippold) I 85, 114.
- 李希特, 歌仁 (Richter, Eugen) I 88, II 124, 206, 223, 240, 321, 365, III 14, 18, 154.
- 李克特 (Rickert) III 154.
- 李廷豪森 (Rittinghausen) II 332, 352.
- 吕布克尔特 (Lübker) I 200.
- 吕台克 (Lüdecke) II 74.
- 吕塞尔 (Lyser) II 259.
- 吕里希 (Röhrich) I 89.
- 吕伯诺 (Rübner) II 263.
- 吕得尔 (Rüder) I 129, II 215, 260.
- 吕特 (Rüdt) II 95, 96, 259.
- 吕格 (Rüegg) I 101, III 35.
- 迈耶尔 (Meier) II 126.
- 迈耶尔施太因 (Meierstein) II 213.
- 迈斯特 (Meister) II 268.
- 辛孙 (Simson) II 124, 159, 208, 210—212, 264, 302, 303.
- 辛格尔 (Singer) I 193, II 138, 213, III 55, 103, 114, 149, 150.
- 沙保尔 (Sabor) III 18.
- 沙姆特 (Samter) II 345.
- 沙柏里茨 (Schabelitz) III 92.
- 沙夫莱 (Schäffle) II 137—139, 186, 247—249, 345, III 26, 206.
- 沙夫拉特 (Schaffrath) II 98, 123.
- 沙尔麦耶尔 (Schallmeyer) I 200, II 37.
- 孚格尔 (Vogel) I 193, II 52, 65, III 47.
- 沃德 (Wode) II 274, 277.
- 沃尔夫 (Wolf) II 110.
- 沃尔弗 (Wolff) II 348.
- 沃尔菲尔 (Wölfel) III 160.

劳艾尔(Lauer) I 121.

劳夫(Loof) II 324.

貝里(Belli) III 86, 88.

八 画

奈夫(Neff) II 101.

汪比勒尔, 馮(Varnbüler, v.) II 137.

阿柏(Abbe) II 70.

阿伯肯(Abeken) II 155, 218, III 181, 188.

阿克尔曼(Ackermann) I 103.

阿乃尔特(Abnert) II 183.

阿尔伯特(Albert) II 262.

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 I 63.

阿迈尔弥勒(Ammermüller) II 137.

阿姆包斯特(Armborst) II 110.

阿龙斯(Arons) III 140.

迪茨(Dietz) I 177, III 43, 91, 92, 144, 145, 175, 211.

林道, 保尔(Lindau, Paul) II 52, 53.

林德纳(Lindner) I 61.

林格瑞(Lingenau) III 97.

林格诺(Lingner) II 116.

彼尔(Perl) II 41, 50, 65.

波克尔(Peucker) II 304, 305.

法尔克(Falk) I 101, II 356.

法尔肯施太因, 法格尔·馮(Falkenstein, Vogel v.) II 125, 166, 174—176, 325.

法赫尔(Faucher) I 117.

法夫尔(Favre) II 153, 307.

法特尔(Vater) I 200, III 133.

奇菲尔(Kiefer) II 192, III 34.

奇尔巴赫(Kirbach) I 65, 66, II 218.

奇尔希曼, 馮(Kirchmann, v.) II 54, 134.

奇尔希纳(Kirchner) I 188, 191.

拉赫曼(Lachmann) I 99.

拉顿道夫(Ladendorf) I 142, 187,

194, II 83, 88.

拉法格, 劳拉, 父姓马克思(Lafargue, Laura, geb. Marx) III 149.

拉·马尔莫拉(La Marmora) I 137, 152.

拉薩尔(Lasselle) I 61, 69, 71, 83, 86—89, 93—97, 99, 112, 117, 123, 127, 128, 131, 157, 165, 199, 202, 204, II 7, 9, 10, 13, 15—18, 23, 24, 26, 28, 29, 33—36, 40, 43, 44, 57, 58, 60, 68, 69, 75, 76, 102, 119, 142, 257, 258, 274, 279—281, 283, 288, 293, 294, III 11, 12, 58, 205.

拉考夫(Rackow) III 29, 30, 41.

拉考维查, 馮(Rakowicz, v.) II 10.

拉姆(Ramm) II 277, 283, 329.

拉式(Rasch) II 242.

拉斯貝(Raspe) II 65.

門德(Mende) I 165, 201, 204, 212, II 63, 68—71, 74—76, 91, 98, 102, 159, 174.

明歇(Münche) III 166.

弥勒, 摩里茨(Müller, Moritz) I 113, 114, 181.

弥勒, 西格蒙特(Müller, Siegm.) I 136, 149, 150.

弥勒, 奥托(Müller, Otto) III 39.

弥勒, 巴沙万特(Müller Passavant) I 144.

弥勒, 沃尔芬比台尔(Müller, Wolfenbüttel) II 74.

彼得曼(Petermann) II 345.

彼得士(Peters) I 60, 63.

罗根巴赫, 馮(Roggenbach, v.) II 137.

罗洛尔(Roller) II 75.

罗设尔(Roscher) II 142.

罗斯梅斯莱(Rossmässler) I 60—63, 80, 81, 88, 89, 159, 161, 168, II 44,

123.

罗特希尔特, 馮 (Rothschild, v.) II
124, 136, 178.

罗特曼諾 (Rottmann) II 324.

罗素 (Russell) II 30.

舍尔, 馮 (Scheel, v.) II 345.

邵烏, 安德阿斯 (Scheu, Andreas) II
83, 107, 103, 186, 247, 253.

邵烏, 亨利希 (Scheu, Heinrich) II 205.

邵布 (Schob) I 200, II 75.

宗巴式 (Zumbusch) III 168.

宗納曼 (Sonfemänn) I 87, 92, 96, 97,
99, 102, 104,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9, 120, 163, 166, 183, 190, 191,
II 23, 83, 247, 295, 303, 327, 329, 330,
III 18, 19, 107.

欧伦堡 (Eulenburg) II 301, 302, 356—
358, III 12, 94, 171.

欧克尔曼 (Ockelmann) II 75.

欧尔克斯 (Oelkers) I 63.

欧索夫斯基 (Ossowsky) II 270.

舍夫 (Schöpf) I 48—50.

九 画

耶克 (Jaekh) I 110.

哈柏康 (Habernkorn) II 131, 132.

哈德里希 (Hadlich) I 171.

哈尔姆 (Harm) II 201, 252, 260.

哈尔特曼 (Hartmann) I 200, II 268,
277, 292, 328, III 43, 136, 169.

哈同 (Hartung) I 187, II 79, 252,
253.

哈森克莱维尔 (Hasenclever) I 165,
201, 211, II 61, 62, 66, 69, 100, 110,
115, 117, 143, 159, 174, 215, 241, 260,
262, 265—267, 269, 273—277, 279,
283, 284, 289—292, 297, 304, 326,
328, 330, 332, 335, 359, 362, III 28,

31, 37, 64, 83, 117, 121, 123, 133, 136,
152, 159, 160, 162, 169, 171—173,
181, 202, 211.

哈塞尔曼 (Hasselmann) I 201, II 55,
100, 115, 215, 241, 260, 266, 267, 269,
273—277, 279, 283, 284, 290, 296,
301, 328—330, 332, 337, 365, III 19,
20, 84, 94, 96, 97, 127—130, 132, 134
—136, 168.

哈茨费尔德, 伯爵夫人 (Hatzfeldt, Gräfin)
I 71, 96, 165, 201, 204, 212, II
16, 33—35, 42, 68, 71, 74, 91, 258.

哈文尼特 (Havenith) I 193.

胡贝尔 (Huber) I 98.

约瑟夫 (Joseph) I 141.

约塞维茨 (Josewicz) II 206.

科科斯基 (Kokosky) II 238, 239, 259,
270.

科伯尔 (Küber) II 324.

科赫 (Koch) I 98.

科勒 (Köhler) II 167.

科尔布 (Kolb) I 179, II 137, 138, 145.

科尼希 (König) I 114.

科恩 (Korn) I 101.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I 210.

洛贝尔图斯 (Rodbertus) III 209, 214.

保尔 (Paul) III 170, 177, 188, 189.

奎克 (Quick) I 187, II 84.

奎布菜尔 (Keubler) III 111.

施略尔, 馮 (Schlör, v.) I 185.

施吕特 (Schlüter) II 333, 351, 360,
III 88, 133, 134, 211.

施米特, 奥古斯大 (Schmidt, Auguste)
I 101.

施拉姆 (Schramm) III 48, 49, 53, 54,
57, 65.

施拉普斯 (Schraps) I 133, 164, 165, II
122, 123, 132, 174, 187, 190, 195, 235.

施瓦采, 馮 (Schwarze, v.) II 211, 216—222, 285, III 29.
施維舍爾 (Schweichel) I 61, 68, 123, 124, 165, 180, 185, 191, II 197, 213, 263.
施韋澤, 馮 (Schweitzer, v.) I 71, 86, 105, 118, 120, 124, 161, 164, 165, 188, 192, 193, 195—201, 204—206, 211—214, II 7—78, 82—84, 89—92, 94, 98—105, 107—122, 125, 142, 143, 169, 173, 174, 215, 257, 258, 261, 274, 293, III 11.
施塔爾 (Stahl) II 12.
施坦因法特 (Steinfatt) III 86.
施坦因麥茨 (Steinmetz) II 125.
施杜姆 (Stumm) II 140.
圖比阿斯 (Tobias) II 137.
威斯, 基多 (Weiss, Guido) I 88, II 77, 164, 213, 241.
威廉一世 (Wilhelm I.) I 32, 56, II 149, 153—155, III 36.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II 179, III 35, 36, 85.
約納斯 (Jonas) I 193, II 138.
約爾格 (Jörg) II 137, 286.
約爾克 (York) I 200, 208, 211, II 65, 71, 74, 75, 95, 167, 201, 234, 235, 245, 246, 252, 256—259, 270, 276.
柏爾格 (Bürger) II 51, 132.

十 画

涅爾加特 (Neergardt) I 147.
班多 (Bandow) I 98, 99, 104, 105, 107, 113, 114, 119, 121, 163.
班伯格 (Bamberger) II 137, 265, 301, 340, III 12, 14, 156.
倍倍爾, 約翰·哥特洛普 (父) (Bebel, Johann Gottlob) (Vater) I 17, 19—

21.
倍倍爾, 約翰 (祖父) (Bebel, Johann) (Grossvater) I 18.
倍倍爾, 威廉明娜·約翰納, 父姓西蒙 (母) (Bebel, Wilhelmine Johanna, geb. Simon) (Mutter) I 17, 19, 21, 22.
俾斯麥, 馮 (Bismarck, v.) I 58, 64, 66—75, 79, 86, 116, 117, 119, 123, 134—140, 146, 151—157, 159, 178, 191, 209, 210, 213—215, II 9—11, 17—20, 22, 23, 26, 27, 32—46, 46, 49, 51, 53, 54, 61—63, 108, 109, 111, 118, 123, 125, 126, 129—131, 135, 137, 144, 145, 148—150, 153—157, 165, 169, 174, 175, 177, 178, 180, 181, 193, 194, 197, 212, 216, 217, 223, 224, 246, 248—251, 265, 272, 283, 285—287, 300, 302, 303, 309, 322, 329, 333, 340, 342, 345, 346, 349, 352, 354—356, 358, 360, 361, 364—366, III 9, 11—13, 18—22, 33, 34, 58, 59, 62, 93, 95, 96, 99, 113, 115, 119, 142—144, 152, 154, 157, 171, 199, 205, 206, 208, 213.
庫爾第 (Curti) III 35.
愛卡雷斯 (Eccarius) I 187.
埃克哈特 (Eckhardt) I 86, 113, 114, 121, 128.
埃里森 (Ellisen) I 183.
埃爾乃爾 (Ellner) II 74.
埃瓦爾特 (Ewald) II 174.
恩得里斯 (Endres) III 120.
恩格斯 (Engels) I 60, 117, 123, 126—128, 199, II 18, 23—28, 97, 117, 149, 157, 168, 185, 232, 256, 257, 259, 278, 292, 294—296, 329, 337, 339, III 49—57, 59—63, 67—81, 83, 84, 90, 122, 141—143, 146—148, 150—153,

158, 183, 185, 196, 203—203, 212—214.
格克, 阿道夫 (Geck, Adolf) III 85, 86, 174.
格克, 卡尔 (Geck, Karl) III 85, 86.
格夫肯 (Geffken) II 180.
格尔曼 (German) I 129, 184, 185, 191.
格拉特斯台恩 (Glattstern) II 349.
格奈斯特 (Gneist) II 46, 124, 358.
特拉伯特 (Trabert) I 147.
特莱格尔 (Träger) I 174, III 171, 173.
特赖奇克, 冯 (Treitschke, v.) I 154, II 20, 193, 358.
特维斯顿 (Twisten) I 139, II 124.
特耳克 (Tölke) I 201, II 30, 33, 35, 50, 51, 69, 78, 84, 85, 88, 89, 92, 108, 111, 115—118, 252, 260, 273—275, 279, 283, 336.
格拉莱 (Gralle) II 325.
格拉蒙特 (Gramont) II 154.
格兰维尔 (Granville) II 249, 250.
格瑞维尼茨 (Grävenitz) III 34.
格莱尔 (Greil) II 207, 211.
格罗伊里希 (Greulich) I 113, 187, 190, 205, II 83, III 133.
格里伦贝格 (Grillenberger) II 253, 260, 270, 329, 332, 338, III 91, 133, 163, 169, 175, 201, 211.
格罗叔夫 (Groschuff) II 341, 342.
格罗特考 (Gröttkau) I 201.
格隆勃莱希特 (Grumbrecht) II 126.
格伦 (Grun) I 63.
格律恩 (Grün) I 147, 148.
格伦贝格 (Grüneberg) II 353, 354.
格伦齐希 (Grünzig) III 117, 120, 122.
诺比林 (Nobiling) II 354, 355, 359—361, III 193.

哥尔茨 (Goltz) II 169, III 128.
哥弗尼 (Govone) I 138.
海乃尔 (Hänel) II 285, 301.
海尔特尔 (Härtel) I 102, 196.
海格尔 (Heger) I 187.
海特, 冯 (Heidt, v.) II 46.
海因克 (Heinke) I 110.
海尔多尔夫, 冯 (Helldorf, v.) III 10 11.
海尔比希 (Herbig) II 111, 166, 169, 175.
海尔特林, 冯 (Hertling, v.) III 94, 127, 155.
海尔维格 (Herwegh) II 18, 23, 25, 34, 288.
海曼 (Heymann) I 191.
海塞, 保尔 (Heyse, Paul) III 90.
库格曼 (Kugelman) II 97.
库尔曼 (Kullmann) II 287.
拿破仑第三 (Napoleon III) I 10, 71, 137, 153, 159, 211, II 35, 111, 135, 149—154, 156—158, 161—165, 169, 171, 189, 194.
纳特尔斯 (Naters) II 167.
诺代·族·拉本瑙 (Nordeck zur Rabenau) II 302, 303.
诺茨 (Notz) I 191.
朔列麦尔-阿尔斯特, 冯 (Schorremers-Alst, v.) III 20.
徐 (Sy) II 70.
乌佛特 (Ufert) II 259, III 33.
乌莱 (Uhle) III 65, 86, 120.
乌里希 (Uhlig) I 167, 188.
乌尔利希 (Ulrich) I 171.
乌塞多姆, 冯 (Usedom, v.) I 152.
翁鲁, 冯 (Unruh, v.) I 70, II 124.
翁特 (Wundt) I 113.
浩斯迈斯特 (Hausmeister) II 94.

十一画

- 勒维, 路德维希(Löwe, Ludwig) I 76, II 138.
 勒维-卡尔培(Löwe-Calbe) I 161, II 46, 47, 92, III 20.
 勒文施太因(Löwenstein) I 188, 191, II 260, 327, III 133.
 勒菲弗尔(Lefavivre) II 176.
 勒克尔(Rückel) I 65, 66, 88, 147—149, II 244, 288, 317, III 26.
 勒格纳(Rügner) I 150, 181, 188.
 勒丁(Rüthing) I 160.
 毕舍(Buchez) II 281.
 毕洛夫, 汉斯·冯(Bülow, Hans v.) II 16.
 毕星(Büsing) II 207, 214.
 毕台尔(Bütter) I 187.
 康普浩森(Camphausen) II 321, 356, III 154.
 康采特(Conzett) III 211.
 盖布(Geib) I 208, II 56, 65, 75, 81, 84, 85, 95, 111, 157, 160, 166, 170, 241, 260, 262, 266—268, 270, 274, 277, 278, 289, 292, 298, 326, 328, 329, 330, 339, 346, III 22—24, 37, 38, 60, 62, 97, 122, 168.
 盖塞尔(Geiser) II 253, 256, 362, III 175.
 盖耶尔(Geyer) III 181.
 基尔式(Giersch) II 270.
 基色克与德佛林(Giesecke u. Devrient) I 103, 141.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I 98, 99—101, 114, 119, 120, 183, 186.
 麦侯夫(Maihoff) II 332.
 麦塞尔史米特(Messerschmied) III 167, 168.
 麦茨(Metz) I 63, II 137.
 麦茨纳(Metzner) I 193, II 49, 206.
 麦奇, 冯(Metzsch, v.) I 122.
 梅明格(Memminger) II 215, 260.
 梅耶尔, 鲁道尔夫(Meyer, Rudolf) II 117, 119, 342, III 76, 209, 214.
 梅林(Mehring) I 82, 117, II 33, 213.
 曼高尔特, 冯(Mangoldt, v.) III 178—180, 182.
 曼宁(Manning) III 214.
 曼托伊费尔, 冯(Manteuffel, v.) I 137, 146, II 124.
 曼茨(Manz) III 88.
 莫尔, 冯(Mohl, v.) II 137.
 莫尔肯布赫尔(Molkenbuhr) II 326.
 莫尔根施太因(Morgenstein) I 147.
 莫特勒(Motteler) I 85, 113, 122, 163, 168, 172, 185, 191, 205, II 89, 187, 201, 234, 241, 245, 252, 260, 265, 266, 269, 270, 277, 293, 297, 304, 319, 332, 346, 349, 357, III 28, 34, 86—88, 90, 118, 119, 133, 146, 169.
 耶尔敦堡(Oldenburg) III 133.
 培曹尔特(Petzold) II 111.
 曹尔太格(Sauerteig) I 114.
 梯也尔(Thiers) I 21, II 152, 237, 307, 309, 314—316, 318, 320.
 梯特(Tiedt) III 134.
 维开德, 冯(Wickede, v.) II 170.
 维麦尔(Wiemer) II 365, III 34, 50, 64.
 维乃尔(Wiener) III 109.
 维加尔特(Wigard) II 123.
 维格尔斯(Wiggers) II 124.
 维尔克(Wilke) II 65.
 维涅德(Venedey) I 188.
 维尔肖(Virchow) II 91, 192, 355.
 维尔特(Wirth) I 75, 92, 99.

維克爾特(Würkert) I 62.
費采耳(Günzel) I 191.
陶舍爾(Tauscher) II 101, III 88, 133,
169.

十二圖

舒尔采-德里奇(Schulze-Delitzsch) I
63, 75, 76, 87, 90, 94, 117, 118, 132,
145, 167, 179, II 124, 140, 187, 193,
260, 304, 350.

道代尔(Dodel) II 339.

道尔格(Dolge) I 63, 80, 94, 98.

道尔夫斯(Dollfus) III 14.

道特(Taute) I 203.

費利亦(Feilitzsch) III 36, 106.

費尔巴哈(F Feuerbach) II 215.

費舍尔(Fieser) III 85.

費雪尔, 理查(Fischer, Richard) II
363, III 88, 169.

費維希(Viewig) II 74.

菲勒克(Viereck) III 55, 83, 158, 207.

菲因(Finn) II 215.

菲力浦斯(Philipp) III 175.

傅尔肯柏克(Forckenbeck) II 44, 45,
124, 264, 285, 303, 346, 356, III 10, 96.

雅可比, 約翰(Jacoby, Johann) I 190.
II 41, 55, 70, 111, 131, 166, 167, 169,
173—175, 188, 213, 222, 241, 331.

雅可比, 列奧波特(Jacoby, Leopold)
III 26.

凱特勒(Ketteler) II 46.

凱澤爾, 麥克斯(Kayser, Max) II 259,
328, 365, III 11, 28, 33, 34, 37, 44, 45,
50, 57, 62, 64, 68, 69, 72, 73, 76, 94,
136, 175, 180, 201.

萊赫爾(Reyher) I 61, 84.

萊維, 毛爾頓(Levy, Morten) II 213.

萊因克(Reincke) I 165, II 138, 141.

萊邁爾(Reimer) II 241, 266, 273—
275, III 168.

萊克斯(Rex) II 28.

萊欣斯波格(Reichensperger) II 171,
III 10.

蒙森(Mommsen) I 139.

彭齊希(Penzig) III 121.

彭好斯特(Bohnhorst) II 97, 166, 169,
185, 191, 325.

普發佛(Pfeiffer) I 113, 166.

普福爾頓(Pfordten) II 19.

普范古赫(Pfannkuch) I 214, II 100,
188.

普蘭克(Planck) I 211, II 124.

普拉斯特(Praast) II 75, III 144.

普魯斯(Preuss) II 32.

普特卡美爾(Puttammer) III 92, 100,
124, 140, 154, 155, 171.

普特利希(Puttrich) III 39, 51.

隆恩, 馮(Roon, v.) II 124, 155, 161.

舒曼, 路易(Schumann, Louis) I 200,
II 65, 75.

斯台登海姆(Stettenheim) II 197.

斯提爾夫里德(Stillfried) III 193.

斯托克爾(Stücker) II 344, 353, III 12,
58, 171.

斯托非(Stoffel) II 152.

斯特拉赫維茨(Strachwitz) II 18.

斯特拉塞(Strasser) II 79.

斯圖貝爾(Stübel) III 191.

史密斯, 普林士(Smith, Prince) I 210.

斯乃爾(Snell) II 70.

斯巴利希(Sparig) II 199, 304—306,
308—316, 318—321, 353.

斯皮爾(Spier) II 65, 71, 74, 89, 92,
166, 187, 191, 218, 221.

斯賓德勒, 威廉(Spindler, William) II
213, III 26.

斯陶丁格爾 (Staudinger) I 99, 113, 115, 161—163.
斯陶芬堡 (Stauffenberg) II 137, 285, 346, III 191.
斯坦諾 (Steinert) I 141.
斯蒂凡 (Stephan) III 102.
新台法尼 (Stephani) II 138.
斯特爾泰 (Sterzing) II 14.
溫特曼 (Wintermann) I 20.
溫第式格瑞茨 (Windischgrätz) II 317, 320.
溫德荷斯特 (Windthorst) II 124, 132, 175, 178, 192, 212, 264, 285, 302, III 29, 96.
斐爾克 (Völck) I 142, 144, II 137.
魯西烏斯 (Lucius) II 365.
魯克 (Luck) III 112.
魯茨 (Lutz) III 85.
魯道夫 (Rudolph) II 65.
隆普夫 (Rumpf) III 192—195.
羅斯托夫 (Rüstow) II 18, 25, 37.
謝爾 (Scherr) II 309, 310, 314.
謝林 (Schilling) I 59.

十三國

楮格爾 (Kegel) III 67, 133.
位萊爾 (Keller) III 90.
俾爾, 恩斯特 (Keil, Ernst) II 130.
福爾斯台林 (Fürsterling) I 89, 85, 131, 133, 160, 165, 204, 205, II 159.
福萊爾 (Forrer) II 169.
福爾馬爾, 馮 (Vollmar, v.) II 104, 324, 338, 360, III 32—34, 49, 50, 52, 53, 55—57, 60, 65, 67, 72, 82—84, 86, 90, 100, 118, 120, 121, 124, 133, 139, 146, 175, 186, 189, 202—204, 206, 207.
福克斯 (Fox) I 110.

奧艾爾, 伊格納茨 (Auer, Ignaz) II 200, 215, 234, 235, 246, 252, 259—262, 268, 269, 274, 277, 289, 290, 292, 296, 326, 328, 329, 332, 346, 350, III 22, 27, 29, 41, 42, 45, 46, 62, 70, 71, 72, 75, 78, 79, 133, 136, 144, 145, 154, 155, 163, 176, 197, 198, 210, 211.
奧林 (Aurin) II 116.
奧登里特 (Autenriet) III 85, 86.
奧斯特倫 (Oesterlen) II 137—139.
奧利維 (Olivier) II 151, 152.
奧托-彼得士, 路易 (Otto-Peters, Luise) I 60, 101, 102.
奧伯溫特 (Oberwinder) I 144, 187, 191, II 79, 83, 84, 107, 109, 186, 247, 253.
鮑克 (Bock) II 277, 289.
賴頓 (Leeden) II 213.
賴克哈特 (Leickhardt) II 94.
賴恩得克爾 (Leyendecker) III 133.
賴希 (Reich) II 270, 343.
賴曼 (Reimann) II 49.
賴因德斯 (Reinders) II 277, 365, III 20, 37, 168.
賴恩哈特 (Reinhard) I 99.
賴謝 (Reusche) II 18, 23, 25.
雷希貝克 (Rechberg) I 136.
雷爾 (Real) II 55.
雷翁哈特, 馮 (Leonhardt, v.) II 243.
雷克爾 (Röckel) I 65, 66, 88, 147—149, II 244, 288, 317, III 26.
雷格乃爾 (Rögner) I 180, 181, 183.
雷丁 (Röthing) I 160.
路德維希二世 (Ludwig II) II 177, III 36.
塞維克 (Saeweke) II 324.
塞基茨 (Segitz) III 106.
塞浦 (Sepp) II 137.
忒爾德 (Tölde) II 138.
塔弗爾 (Tafel) II 137—139.

十四画

- 裴式曼(Peschmann) III 194.
赫希伯格(Höchberg) II 339, III 24,
48—51, 53—57, 59—62, 65, 67, 70,
72, 75, 78, 80, 81, 119, 123, 124, 125,
147, 197, 198.
赫斯, 摩里茨(Hess, Moritz) II 18,
25, 34, 288.
赫普纳(Hepner) I 125, 176, 194, II
112, 183, 190, 203, 204, 217, 219, 221,
256—259, III 162.
歌格, 阿曼德(Goegg, Amond) I 142,
147, II 281.
歌茨(Götz) I 80.
豪埃森(Haueisen) III 85, 86.
豪格(Haug) III 85.
豪斯曼(Haussmann) I 147.
豪布诺(Haubner) II 98, 244.

十五画

- 莫斯特(Most) II 107, 109, 186, 200,
204, 205, 214, 215, 236, 238, 241, 245,
247, 259, 264, 266, 272, 276, 284, 287,
298, 304, 323, 324, 329, 332, 337, 343,
344, 346, 354, III 41—43, 45—48, 50,
51, 57, 62, 66, 72, 73, 75, 79, 99, 122—
124, 129, 130, 132, 134, 136, 140, 142,
153, 168, 191, 193.
德尔布吕克(Delbrück) II 171, 175,
177, 178, 321, 362.
德利乌斯(Delius) III 34.
德姆勒(Demmler) II 332, 333.
德罗席(Derossi) II 115, 292, 328, III
24, 88, 136.
德累斯巴赫(Dresbach) II 297, 327,
III 115.
蔡特莱尔(Zeidler) II 181, 182.

蔡特金(Zetkin) III 138.

十六画

- 赛菲尔特(Seyferth) I 203.
穆凯, 冯(Mücke, v.) II 218, 222.
穆勒, 冯(Mühler, v.) II 199.
穆尔贝格(Mülberger) II 105.
穆特(Muth) II 259.
霍德尔(Hüdel) II 353—355, 360, 361,
III 193.
霍夫曼(马格德堡)(Hofmann-Magde-
burg) II 74.
霍夫斯台登, 冯(Hofstetten, v.) II
15, 18, 19, 31, 32, 36, 50, 52, 61, 83.
霍亨卢恩侯爵(Hohenlohe, Fürst) I
117, 139, II 137, 211, 285.
霍亨瓦特伯爵(Hohenwart, Graf) II
185, 186, 247, 249.
霍亨索伦侯爵(Hohenzollern, Fürst)
II 153.
霍亨索伦亲王(Hohenzollern, Prinz)
II 153—156.
霍好夫(Hohoff) II 240.
霍尔德(Hülder) I 113, 115.
霍莱本, 冯(Holleben, v.) III 34.
霍尔曼(Hollmann) III 193, 194.
霍尔式(Horsch) III 192—194.
霍维尔柏克, 冯(Hoverbeck, v.) II
134, 143, 212, 223.
霍伯瑞希特(Hobrecht) II 356.
锡菲尔斯(Sievers) II 166.
诺依尔, 维克多(Noir, Victor) II 151.
诺司提茨-瓦尔维茨, 冯(Nostitz-Wal-
witz, v.) I 122, II 98, III 161, 167,
185, 186.

十八画

魏伯尔(斯塔特)(Weber-Stade) II 128.

魏德曼(Weidemann) III 192.
魏斯海莫(Weisheimer) II 16, 17.
魏特曼(Weithmann) I 93, 99.
魏尔纳(Werner) I 85.
魏尔特(Werth) II 106.

魏尔特恩男爵(Werther., Freiherr) II
153.

二十画

賓曹尔(Dotzauer) II 274.

新平社
PDG